

希特勒

我的奮鬥

陳式 譯



文國書局



閱讀名人傳記，是吸取先人經驗的最佳途徑。傳記所記，無一不是事實。他們能够成名成功，決非偶然，他們的思想言行，都有值得取法的地方。吸取成功人的經驗，是自我教育的最佳方法。幾乎每一個成功的人物都是從艱難困苦中磨練出來的，他們的成功完全靠「自己」，並非依賴「命運」，閱讀傳記，會使你掌握「人生」的主動，否定「命運」的空虛。

譯 式 陳

鬥 奮 的 我

局 書 國 文



售價：新台幣陸拾元

出版者：文 國 書 局

發行人：沈 英 士

登記證：局版台業字第二一三四號

地址：台南市崇德三街62巷8號

電話：(〇六)二六七六一五五五

劃撥：三〇六三五六號沈英士帳戶

印刷者：新 奇 星 印 刷 局

經銷處：全 國 各 大 書 局

中華民國七十三年八月初版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缺頁或裝訂錯誤可寄回更換※

序

一九二四年四月一日，慕尼黑法庭判決，我被囚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的監獄裏。

早就想書寫關於我對本黨的計劃和意見，希望給諸位知道一些個中情形的同志們。只因連年公私奔波，一直無暇握筆，現在既然有了這樣一個閒暇機會，便乘此寫下這本共分兩部的小冊子，使大家能從這本小冊子裏窺見本黨發展的經過和目的。

當然，我也知道，要使一種主義獲得人們熱烈信仰和擁護，用文字遠較口頭闡述來得有效，世界許多次運動的成功，大都歸功於一般能幹的演說家，而不是許多有名的著作家。但是爲了想把我的主義揭示得更加詳細，更易令人了解，我覺得非寫下這本小冊子不可。因此，本書也可說是我日後行動的指針，同時也是本黨活動的一個基礎。

著者識於勒奇河畔蘭支爾堡要塞獄中

目錄

序

第1部 奮鬥的回顧

第一章	我的家庭	一
第二章	在維也納苦學	四
第三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一九
第四章	在慕尼黑	四二
第五章	世界大戰	五三
第六章	戰爭宣傳	六〇
第七章	革命	六五
第八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七三

第九章	德國工人黨·····	七八
第十章	舊帝國的崩潰徵兆·····	八二
第十一章	民族與種族·····	九九
第十二章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一〇
第2部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一二一		
第一章	世界觀與政黨·····	一二一
第二章	國家·····	一二五
第三章	公民與國民·····	一四五
第四章	人格與民族國家的觀念·····	一四七
第五章	世界與組織·····	一五二
第六章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一五七
第七章	同共產黨的爭鬥·····	一六四
第八章	強者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一七四
第九章	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一七八

第十章	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九二
第十一章	宣傳與組織·····	二〇一
第十二章	工會問題·····	二〇六
第十三章	德國在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二一〇
第十四章	東方政策·····	二二二
第十五章	緊急的防衛權·····	二三四
附錄一		
希特勒遺囑·····		二四一
附錄二 狂人的狂言		
希特勒及其「我的奮鬥」·····		二四四

第1部 奮鬥的回顧

第1章 我的家庭

我幸運地生長在萊茵河（Rhein）邊岸的普勃諾鎮（Braunau）上，這市鎮太美麗了。而且正是兩個日耳曼國境的交接之處，天生給了我一個奮鬥的機會。

奧地利——這日耳曼民族的支脈，早應該附歸祖國大日耳曼的版圖上。這並非是經濟關係，而是血統關係。縱使二個國家的擁抱於經濟上是蒙受不利，我也可以武斷地說：如果日耳曼的子孫一天不合併統治，便一天得不到安寧。必至日耳曼人民繁殖到人口膨脹時，才伸出手掌去向外掠取領土。那時候大眾爲了麪包和牛油，當然不惜用鋤頭代替了刀劍，去揭開戰爭的序幕。正因爲如此，我生長在邊陲小鎮上，便負有神聖偉大的使命。

「我是日耳曼人。可是爲什麼我們要和其他日耳曼人分裂？我們不是同一種族嗎？」我年輕時代這個嚴重的問題便在我腦海裏打滾，我揮着鐵拳，爲什麼日耳曼人民都不一致投到俾斯麥帝國（Bismarck's Empire）的懷抱裏呢？我一直這樣地憤恨着。

做官的生活，我並不想。根本我不願悶死在文牘的案頭，重蹈我父親所說官場失敗的覆轍，

這是我的決心；任外界如何加給我多大的誘惑，我都不變初衷。

我了解歷史的意義，我是個純粹的民族主義者。

少年時代，我記得在奧地利民族鬥爭運動的範疇裏，早種下了這一顆種子。我曾經拉攏南疆協會（Sudmark）以及學聯會，呈獻黑、紅、黃三色的穀花旗，不唱奧地利的皇歌（Kaiserlied）而獨高喊着德意志優於一切（Deutsch — latd uber alles）的歌曲，即是受到威脅也不畏懼。我們這一代青年原先已受了政治訓練，雖然那時僅僅得一些國語，還不知道啓發「民族性」的責任。總之，我少年時已不是一個頭腦冷靜的人，而是個熱烈的「德意志民族主義」者（Deutschnations）。

我的思想快捷地發展着，十五歲那年，我便能把效忠君王的「愛國主義」和人民立場的「民族主義」分析得很明白。我始終愛好民族主義的觀念。不過千萬料不到會有今日這個黨的組織！奧地利對我們日耳曼人民，是不知忠實愛護的。這一點，我們知道。

在日常生活中，我們也常聽見奧地利赫倍塞軋朝（Habsburhous）過去統治的方略。我們知道身體中已染上了毒素，同時那股毒鋒在奧國南北兩部的天空瀰漫着。瞧！奧京維也納城中，日耳曼人民是到那裏去了啊？

奧國皇家做着捷克化的美夢，但是法蘭西斯·腓第南大公（Archduke Farncis Ferdinand）——這位奧境內日耳曼的敵人，後來終於被槍殺。如果天道不公，怎麼會毀滅了

這個要想使奧國形成捷克斯拉夫化的主要角色呢？

世界未來大戰的第一顆炮彈，也許藏在德奧聯盟後新德意志的一尊炮口裏吧？

總之，大戰和德國崩潰的種子，早已潛伏在這個聯盟中。關於這一問題我在後文自有交待，姑且再說到我的本身。我早認為要保持日耳曼民族的安全，必須先將奧地利摧毀。原因在於「愛國主義」和「民族主義」兩者間政治距離太遠；而赫倍塞軋皇室的存在，又是日耳曼人民的一個障礙。

由於我對這些認識更加清楚，使我非常痛恨着奧國；但是，德奧隱睡上我的家庭，我是多麼的愛護啊！

我從小生長在貧困的環境中。家裏原有的薄產，被我母親一場大病耗用殆盡，因此無法維持生活。我決心在這時候起自食其力，便携了一隻簡陋的衣箱奔到維也納。我希望堅苦地和自己命運搏鬥一場，戰勝之後，就能成爲一個世界傑出人物；但我不將做官看作一生最高的目標！

第2章 在維也納苦學

在維也納城中，貧富的懸殊，真有天壤之別。帝國的人口是五千二百萬，其中民族繁雜，實爲帝國的一大隱憂。我們可於京邑的中區，覘知奧國的命脈。宮廷的煊赫，有如磁石一般。吸取全國各地的財富與智能，而哈布斯堡皇室，又厲行中央集權的政策。以鞏固國內各民族的團結。因此一切的權威，完全集中在首都皇城。

維也納不單是古老的多瑙皇室的政治，文化的中心，而且也是經濟的中心。除了多數的將帥、官吏、藝術家、教授之外，還有更多的工人和貧民，他們和貴族富商共同的生存在其間。失業者徬徨於臨街（Ringstrasse）的宮殿四周，數以千計。而凱旋路（Via triumphalis）上那些無家可歸的人，都麤集於溝渠污穢的中間。

如果要研究社會問題，在德意志的任何城市中，再沒有比維也納更適合的了。不過這種研究，不能僅從表面上去做的，局外人又只能說一些莫不關心的空話，或佯示感慨。猶之未遭毒蛇蟠繞過的人，不能得知毒蛇的毒涎。那些幸運者和自矜成功者，則昧於社會需要；而華裝貴婦，則又徒有慈悲而缺乏才能。我不知道這兩者的爲害，熟淺熟深！後者的罪在於缺乏良知，所以當發現自己盡力於社會事業，而毫無效果所得，並且反而引起強烈的反感而驚詫，以爲這是民衆忘恩的佐證。實則社會事業的不易完成，它的癥結所在，不在施行小惠，而在恢復民衆的權利，所以

，不應希望人們來感德，這是她們所不能了解的。

我覺得這種事情，可循兩種方法來改進：一是對於社會責任應有深摯的情感，方能確立良好的原則，以我們發展的途徑；一是須痛下決心，除去一切不可救藥的贅疣。

上帝並不着重在維持已存的事物，而着重在培養新的生命，使種族得以繼續下去，人類的生活也是如此，我們不應過分重視目前的積弊，這是絕不可能的，我們應即確定一完善的方法，以謀將來的發展。

當我在維也納為生活而奮鬥的時候，我觀察得十分的清楚，知道社會事業決不能着重在公益事業，這種事業是可笑而無用的，應該除去經濟和文化生活組織上的種種錯誤，因為這種錯誤，足以使個人陷入墮落的境地。

奧國因忽視社會的立法，所以他不能剷除社會的積弊。這是有目共觀的事實。

當時最使我駭異的，是為工人的經濟痛苦，還是他們的卑鄙行為，或為精神生活的低下？我實不得而知。

生活困苦的人，說他們只要足以維持生活，則為德意志人或非德意志人都是一樣的，中產階級，聽見了這種話，不是要勃然大怒嗎？他們對於這種「民族自尊心」的缺乏，一定要大聲斥責，表現出他們憎惡的意思。

為什麼中產階級有較優的情緒？真正能夠返躬自問的，究竟有幾人？能夠了解在祖國民族的

文化生活和藝術生活之中，有許多偉大的成就，使他們成爲得天獨厚的民族中一分子的，又有幾人？能夠明白祖國的光榮，在於祖國各方面的偉績的，又有幾人？

到了此刻，以前我所不知道的事，便完全領會了。

欲使民衆「民族化」須得先造成健全的社會環境，然後再教育個人，這是最重要的問題。因爲欲使民衆知道祖國在文化上、經濟上，以及在政治上的種種偉績，而自幸爲此民族的一分子，非從教育着手不可。一個人必須爲他所愛的而奮鬥，而所愛的也必須爲他所敬，然而不是他明白了解的東西，那又怎能對它發生敬意？

我對於社會問題，既發生了興趣，便透徹的研究它們。於是新異的世界，遂出現在我的眼前了。

在一九〇九到一九一〇年之中，我的生活環境漸漸轉好，無須靠做工來維持生活，我靠製圖及畫水彩畫，來維持我獨立的生活。

凡是不徹底和帶有怯弱性的事件，都是爲民衆所不歡迎的。

民衆愛嚴峻的統治者，甚於愛乞憐的人，他們對絕對的主義，較之對不知如何使用的自由，還要覺得滿意，就像婦女的性情，對於受抽象理論的感動，決不能像敬羨一種優越的勢力一樣。他寧願屈服於強者，而不願去支配一個弱者；所以，民衆對精神上所受的威脅，並不覺得可恥，就像他們不覺得他的自由被欺凌，及至逼而反抗就以爲可恥的。他們或許不知遭遇的冤抑，

但見到統治者舉止的果毅，言論的堅厲而終使他們服從到底。

若以一個具有高超真理，而施行方面却是非常殘酷的主義，起而反抗社會民主黨，那麼無論這個鬭爭者怎樣劇烈，這主義必會得到勝利的。

不到兩年，我已了解社會民主黨的學說，和它的專門用途了。

社會民主黨，從它的經驗中，很知道實力的可貴，所以對於該黨認為有實力的人，就攻擊不遺餘力，——實力實是不可多得的东西。而在他方面對於敵方的弱者極力頌揚，起初很小心，後來大膽地實行起來，且看弱者的能力如何而定。他對於無權力無意志者的畏懼，還不若他對於資質平凡，而意志果毅。

他又能夠使人民相信，惟他才和平的秘訣；同時以不動聲色的舉動，乘群眾不注意的時候，潛施壓力或竟大膽地出而攘奪，得寸進尺，以拓展他的地位。

這純粹是利用人類弱點的策略。假如對方不懂得以毒攻毒的戰術，他這種策略是步步勝利的。

我們不得不對弱者告誡說：這是一個存亡的關鍵。

在工場、商店中，或群眾大會，及示威運動時，所用的恫嚇，倘使不碰到相同的勢力，那是常常得到成功的。

工人遲早必定要被貧困所迫，而加入社會民主黨。資產階級，對於人類最合理的要求，亦往

往反對，這不僅是愚昧，也是不道德的，而且對於他們也無一些利益，而工人中就是極守紀律的，但也不得不因此退出工會而參加政治。

在我二十歲的時候，對於保障工人權利，和改進勞工生活的工會，與那階級鬥爭中爲政黨作工具的工會，也已能夠辨別清楚了。

社會民主黨，知道工會運動的極端重要，所以就利用它作爲一種工具，因而獲得了相當的優勢；反過來。資產階級，不能見及於此，所以便失去了政治的地位。他們以爲看輕工會運動，不使它按步的發展，便可以使之消滅；甚至令它走上不通的路途。如果說工會運動和祖國爲敵而有害的話，那實屬荒謬可笑。實在說起來，那是恰恰相反的。倘若工會的目的，是在改善國家基礎中某階級的生活狀況，而能獲得效果，則其行動絕非和祖國爲敵，倒是名正言順的民族運動。這樣，工會運動對於社會思想的形成，有着不少的助力，缺少了它，普遍的民族教育，便也無由去着想了。所以它最大的功績，便是在於除掉社會的流毒，根治身體和心理的病源，因而增加民族的一般福利。

至於說到工會的本質，這便成爲贅述了。

假使在僱主之中，還有不能明白社會的原理。甚至誤解了正義和公理的話，那我們民衆中一部分的勞工，就可以起來反抗個人的貪婪和無理，以之來保護全體的福利，這不但是爲了權利，而且也是爲了義務。因爲保持民衆間的忠實和信仰，乃民族的福利，這正和保持民衆的健康，有

着同樣的功績。

因為待遇的不平，而引起的反抗，如果在合法的司法當局尚未能夠有適當的解決之前，這鬭爭的勝負，祇好由最強有力的一方來裁決了。如果許多的勞工，和資本雄厚的某一僱主發生了抵抗，倘若在開始的時候，就有了不易獲得勝利的希望，那勞工們就得非團結一致不可奏功，這理由是極為明顯的。

在最近的幾十年中，工會運動已經在社會民主黨專家的手中，由保護人類社會權利的工具，一變而為摧殘國民經濟的利器了。那般利用工會為目的的人，完全沒有計及工人的福利。

因為在政治方面，當一方在毫無顧忌的橫行不法，而一方則忍辱含垢只知屈服的時候，那經濟壓迫，往往成為攫奪的良策。

工會運動，在本世紀的開始，早失去其本來的目的了。年復一年，於是工會日益墮入社會民主黨政治的勢力中，後來竟成為階級鬭爭的唯一利器了。

資產階級對這種現象，不但不取攻勢，反而受其壓迫和蹂躪。最後，才採用不大合宜的方法，然而為時未免太晚，不能發生效果，而且因其弱點很多，終於遭到了失敗。因此，不但一切依然如舊，而且不平反較前更甚。

「自由工會」(free trades union)正像駭人的狂風暴雨，竟而降低於政治的水準之下，它威脅着社會的安全，民族的獨立，國家的鞏固，以及個人的自由，可以說是一種最可怕的工

具。尤其厲害，它會嘲笑著民主觀念。玷辱自由，譏諷博愛；說是：「你如果不從我，我便把你的頭顱打破。」

我略略懂得了一些「人類的友情」，爲時既久，我的見解，也就日益廣大而深刻，因此也就無法來把它改變。

我既洞悉了納粹黨的外表，於是便想進一步探究其學說中的要旨。可是黨當局所發表的文字，於我毫無裨益。在討論經濟問題的時候，其立言和辯證都不大正確；而說到政治方面時，更是難圓其說。因此，我對於那些瑣辯詭飾的文字，憎厭達於極點。

最後我才知道這種殘賊的學說，是和那某種種族特性有關的，這是我以前所不知道的。

明白猶太人，便是明白納粹黨內部真相的惟一關鍵。明白了這民族，便是揭穿了對於這黨的目的和意義上一切錯誤的觀念，並且更暴露了馬克斯主義濫用社會主義的美妙文辭欺世。

「猶太」這一個名詞，在什麼時候才開始對我發生了特殊的意義？這個回答，縱非不可能，但也是很難的。我現在已不能追憶到我父親在世的時候，曾於家中聽過了這名詞否。即使他老人家曾經說及這名詞，我想大概也是在指一種遼古的文化而言。我的父親生平略具世界公民的觀念，而且具有強烈的民族意識。這在我所受的影響是很大的。

我在學校的時候，也不曾有過其他足以更易了解我居家時所受的印象。在實科學校中的時候，我曾經認識了一個猶太兒童，他很被我們所重視；因爲各種的經驗，得悉其人是一個沉默寡言

的人，因此我們便不很信任他了。

當我在十四五歲的時候，常於言談中聽到「猶太」這一個名詞。這時我對之未免稍有不悅；至於討論宗教的歧異時，那我便感到更覺不安了。

那時我對於這問題尚無他方面的觀察。林茲（Linz）的猶太人很少，經過了數百年之後，他們業已貌似歐洲人了，而我仍視之爲日耳曼人。當時我還不知道這種觀念的錯誤，因據我所見，猶太人和其他民族的區別，就在其特異的宗教上面。我既以他們因宗教之故而受到虐待，故對於不利他們的評議，常常鄙視而加以痛嫉。至於對猶太人的仇視，我尚未懷有這種意思。

以後我就到了維也納。

奧京的建築，十分壯麗，使我感到了目眩神迷，這時候我正被困難所壓迫，所以我對此大都會中人民的成分，不大曉得。雖然，在維也納二百萬的人口之中，約有二十萬的猶太人，但我竟不曾感到。在最初的數星期中，心目所觸及的一切，令我應接不暇。而後我的心神略定。對此新世界才得了一個較深刻的觀察，而猶太問題亦就因之而起了。

我和猶太人的相識，一無洽意的地方。我仍認猶太教是一種宗教，因而本著人類互相寬恕的意念，極不想就宗教上來對他們加以攻擊。我因此以爲維也納反對猶太人的報紙，所持的論調，極不合一個偉大民族的文明慣例。我又想到中世紀發生的某些事件，心中很爲不快，極不願見其再於今日重演。但是，這類報紙大都沒有什麼地位，——我當時也不知道所以然——我認爲是偏

激的論調，而非正直的言論。

在當時確有權威的報紙，對於此種攻擊，大都作着莊嚴的答辯，或者竟置之不顧；這種態度，頗可令人敬服，所以我的意見，也就因之而益堅。

我很勤於閱讀那些所謂世界報，像新自由報（*Neue Freie Presse*）維也納日報（*Wiener Tagblatt*）等，但很不滿意其對於宮廷的諂媚那種卑污態度。宮廷之中一有事件發生，莫不以歡欣謳歌醉人的語調來爲之刊佈，這種愚蠢的行爲，施之於最賢明的君主，也無異於「山雞」交尾時的行爲。

我深以爲這是自由民主政治（*Liberaler Demokratie*）的污點。

我住在維也納，仍是很熱心注意於德國的一切事件，不論是政治問題或文化問題。我以德國的興隆，和奧國的衰替相比較，不禁爲德國人慶幸。德國人的外交事件，雖然差堪慰藉，但是內政方面不免叫人失望而感到不快。對於抨擊威廉二世的運動，我是不贊成的。我不但認威廉爲德國的皇帝，且還尊之爲德意志海軍的創始人。所以對國會不許皇帝演說一事，使我不勝憤怒，因爲在我看來，國會是不配發出禁令的。這些混蛋，在一次會議時所發狂妄的謬論，較之歷朝皇帝——甚至最沒有用的——於幾百年中所發表無聊的謬論尤多。

在一國之中，任何的愚夫，都有着批評的權利，而且都有入國會爲立法的資格，現在身居帝位的人，反受這最荒謬的機關所譴責，這實使我憤怒不已。

更使我憤怒的，就是維也納的報紙，從前對於宮廷的卑污諂媚，現在則用虛偽的關切，來發表它反對德皇的言論，它們竟顯示出不可遮掩的仇恨來了。

這是我所不得不承認的，在反對猶太人的報紙之中，有一種叫做德意志民衆報（*Deutsches Volksblatt*）的，關於這論題的態度，比較是適當的。

那些較有勢力的報紙，對於法蘭西的詔諛的醜態，那也令我十分不悅。當一個人看到讚揚他們所謂「偉大文明民族」的歌頌時，不能不羞於做一個日耳曼人了。這種向法蘭西求歡的卑污醜態，使我把這種世界報憤而丟棄已非一次了。我看到民衆報，對於這種事件所持的見解，雖然稍爲狹隘，然而實較純潔。我本來不贊許反對猶太人的苛論，但是，當我在看其辯論的時候，足以使我發生一種深思。

總之，我因此而慢慢地知道了當時決定維也納命運的人，及其運動的主持者是卡爾呂格勒博士（*Dr. Karl Lueger*）和基督教社會黨（*Christian Socialist Party*）。

當我抵達維也納的時候，卡爾·呂格勒博士和基督教社會黨都是我所仇視的。在我看來，這人和他的運動在在都是反動。

有一天，我行經內城，忽然碰到一位穿着長衫的土耳其人，和兩邊有着黑捲髮的人，我便私忖着：「這是猶太人嗎？」然而在林茲城中的猶太人並不這樣。我便密察這個人的相貌，後來，我腦中的問題變爲：「這是一個日耳曼人嗎？」。

平時，我碰到這種情形，均靠書籍來釋疑。我第一次用幾個「赫勒」去買了幾本反對猶太人的小冊子。想不到這書中所論的，都以爲讀者對於猶太問題是略有所知，或是相當瞭解的。這些小冊子的論調，竟又使我疑團叢生；因爲其中所說的，都是極淺薄而不合科學的論證。

這一個論題，既是這樣的擴大，而想研究又是這樣的茫然不着邊際，我惟恐有失公平，所以又惶然而不敢自信了。

然而，他們實在不是信奉他種宗教的日耳曼人，而是另一民族，我在這裏已不能再有所疑。我既着手研究這問題而注意猶太人，那在我眼中的維也納自然兩樣了。

於是，我就隨處見到猶太人了。所見愈多，而所異於他人的地方也愈顯明。而內城和多瑙河（Danube Canal）的北部，尤群居着一種和日耳曼人不同的人民。

我的心中，雖然還是仍有所疑，但是，我的躊躇，也就爲一部分猶太人的態度所消釋了。這時在維也納城中，猶太人發生着一種大運動，以發揚猶太主義民族性爲目的的，那就是所謂猶太聖會主義（Zionism）。粗看起來，彷彿贊許此舉僅僅是一小部分的猶太人，而咀咒和反對的必居多數；然而細察起來，此種現象，便就化成了理論的氛霧，純爲便宜而設，實在都是詭詞。所謂自由派的猶太人，他們不承認持聖會主義之徒的原因，並不是爲了他們不是猶太人，祇以他們的教義不切實用，或且有害於自由派所持的猶太主義。

然而，他們內部的團結，却沒有什麼變更，所以，這樣聖會主義者和自由派猶太人的外表佯

作不睦，這使我是十分討厭的。因為他們的虛偽詭辭，和他們所常誇耀的德高行潔，是十分不合的。

當我知道猶太主義在新聞、藝術、文學、及戲劇各方面活動的時候，在我的心目之中，猶太主義就遭到巨大的挫折。用了飾詞來強辯，已經毫無用處了。我們祇須閱讀他們的宣傳品，並研究他們惡劣的電影和戲劇作家的姓名，便已可以了。這是一種瘟疫，是一種精神上的瘟疫，它對於國民的毒害，比較黑死病尤為厲害。

在藝術中，既有這樣卑劣的作品顯露在大眾之前，所以我也就不得不細細研究一下作者的姓名了。研究的結果，使我對猶太人所採取的態度更壞。我的情感雖然時時和我的態度背馳，但我的理智，終不得不有着自己的論斷。

於是我開始用相同的觀點，來考察我所喜歡的世界報，便發現了這報自由的傾向；在我看起來，這報對於攻擊者的鄭重答辯，以及對於攻擊置之不理的態度，完全是一種狡猾卑鄙的詭計；他們那種堂皇的劇評，常常捧猶太的作家，把不良的評論，則都施之於德國人；尤其對威廉二世的譏諷，和盛稱法國的學術文明，都足以顯示着他們的方略一致。總而言之，他們的輕視德國人怎麼能說他出於無意呢？

因此我有了深切的認識，社會民主黨的主腦是猶太人；因此猶太人便被我所鄙視，而且平日在我腦海中交戰着的問題，現在就也得到了了解。

慢慢地，讓我知道社會民主黨的報紙，大都被猶太人所操縱着，這點我本來並不重視，因為其他各報，確也都是如此的。可是，很使人注意的，就是凡和猶太人有關係的報紙，無一可以看到具有真實的民族觀念，就如同我的教育和見解所昭示於我的。

我強制抑壓着我厭惡的心理，嘗試着去閱讀報紙中所載馬克斯派的囑語，但是我的厭惡，竟是愈讀愈見厲害。我會和說囑語的編者去交談，可是，從主筆以下，大多都是猶太人。

我又竭力搜集一切關於社會民主黨的表冊，而來研究作者的姓名，——沒有別的，竟完全是猶太人。我再細察一切領袖人物的姓名，又泰半都是些「選民」。(Chosen People)且不問他是國最的議員，或是工會的書記，或是各團體的主席，或是街市中的煽動者，他們表現在外貌上的一種奸惡像貌，是沒有不同的。奧斯特里次(Austerlitz)、大衛(David)、阿德勒(Adler)、和愛倫波根(Eilenbogen)等，叫我如何能夠忘掉呢！

有一件事，我已慢慢地明瞭了，就是這黨的領導權——該黨次要的贊助人、已經和我奮鬥了幾個月——差不多全在外族的手中，而我足以自慰的就是到底知道了猶太人並不是日耳曼人。

從此以後，我便確切知道敗壞我民族的是什麼人了。

我和猶太人的爭議愈多，便愈益明瞭其辯論的方法。在起初，他們利用着對方的愚蠢，如果不得勝利，則再假裝出一種愚蠢來；要是還不勝利，則便拒絕討論或竟很快的轉入別的問題，談人所盡知的真理，使人家同意以後，再攀到那絕不相類的事件上去。於是，再回到原來的立場，

且故示軟弱，假裝不知。所以不論在什麼地方，凡是攻擊此等聖徒的人，幾乎沒有不陷入於泥濘中去的。如果現在有人於猶人廣衆之前，對某一猶太人加以痛斥，他便自承屈服；但是，如果痛斥者以爲自己至少有着進一步的勝利，那他到明天必大表驚訝；這是因爲猶太人已經完全忘掉昨天所說的，而又再申述其無恥的舊說，好像不曾經過什麼事的樣子。他憤怒驚愕，假裝着完全忘掉了舊事，以爲過去的辨論，已證明他所堅持的真理。

我好幾次弄得瞠目結舌，不知道什麼最是使人嘆異的地方，——是利齒？還是狡猾？——因此，我就慢慢地懷恨猶太人了。

但是，這也是有利的。當我一見到社會民主黨中宣傳者，我愛護國家的情緒，便也油然而生了。

因爲我平日經驗的誘導，於是就搜討馬克斯主義的本源。這主義的作用怎樣？在單獨的事例之中，我已十分明白。我日見其成功，祇要略加想像，便能預測它的結果。不過還有一個問題，就是不知道提倡的人，是否在其新創之中獲得了效果呢？還是他被謬誤所犧牲而不自知覺？

因此我想認識這主義的提倡者，以便研究其運動的原則。爲達到我目的的迅速，竟是出於我希望之外，這實在是得力於我對於猶太問題得到相當的知識，不過這種知識，這時還沒有深刻的研究罷了。惟有這種知識，才能使我把社會民主黨的實情和他們黨徒的理論來作一比較，因此，我已經曉得猶太人措辭的方法，乃在陰藏或文飾他們意見，所以他們的真正目的，不能求之於文

字，因為深藏在字裏行間的緣故。

在這時候，我的內心已引起了一個最鉅大的變化，就是從一個淡漠的世界公民，驟然成爲一個狂熱的反對猶太人了。

當我在研究猶太民族影響及於人類長期歷史的時候。我的心中便突然產生了一個悲慘的問題：就是那不可測的天和，安知不已許這小民族以最後的勝利呢？

馬克斯主義的猶太學說，擯棄着自然界中含有貴族的原理，而以群眾的人數，來代替了勢和力兩者的永久特權。所以他們的學說，否認在群眾之中的個人價值，攻擊國族和種族的重要，用以完全剝奪人類的生存和文化的意義。如果這主義成爲一種宇宙的定律，則人類所共守的一切秩序，勢必到了滅絕程度，如果這原則行之於宇宙之間，那麼宇宙必定大亂；行之於地球之上，那麼人類必然同歸於盡。

要是猶太人靠了馬克斯教義的力量，戰勝了世界各民族，那麼，這皇冠便將成爲人類送葬的花圈了，地球又將空無人類而農行於以太之中，和數百萬年前原始生活一樣。

永存的自然，凡是逾越其命令者（*Ubertretung ihrer Crebieter*）勢必將與以嚴厲的懲罰。

所以，我發自內心，謹遵奉造物的意旨；和猶太人奮鬥，這就是我在爲上帝行事。

第3章 在維也納所得的政見

在舊多瑙河帝國（Danube Monarchy）中，一般的政治思想，比較同時代的德國本部（普魯士、漢堡及北海沿岸不在此例）的思想，較為豁達大度，我現在所稱的「奧地利」，就是大哈布斯堡帝國（Habsburg Empire）中的一部分；因為那裏是日耳曼人殖居的結果，不獨在各方面能夠表現其創造奧國的永久力量；而且還能夠表現其力量於民間，對這政局机隍的國家，延續其內在的文化生命竟達數百年。時代越是向前進展，奧國的命運，也越是擊之於日耳曼人，而獲得繼續生存；因為日耳曼人，實在是帝國的生命細胞。

由多種民族混合而成的「奧地利」，終將免不了崩潰，這絕不可認作舊東馬克（Ostmark）的德國沒有政治能力；因為這是要用一千萬人的力量，永遠支持着五千萬異族同居的國家，要是不及早確定原則，那是實在不能維持，而崩潰是必然的。

一個日耳曼奧地利人，他常慣居於一個大帝國的境內，而且永不會忘掉在這境內一切的義務。

他的視線雖然狹小得祇在奧國的境內，但是，他仍能望及帝國的邊界。他雖然不幸而受到脫離祖國的命運，但他仍能努力負起這偉大事業，為德國保存其祖先在長期奮鬥中從東方所得來的權利。目前我們須知道力量雖然已經分散，但是事業的成功，仍屬可能的。因為優秀的人士，對

於共同的祖國，永遠表示着同情的，他們的祖國國土，完全是屬於他們的。

日耳曼奧地利人的眼界，實較帝國中其他種族的眼界爲廣。他們經濟的關係，差不多包括了整個帝國的全部。一切真正的偉大企業，差不多完全在其掌握之中。凡是主要的技術專家和職員，多是屬於他們的。以前，商業勢力尚未被猶太人所奪取時，國外的貿易，完全是由他們所經營。

日耳曼奧地利的補充隊，也可加入德國的軍隊之中，這種軍隊，可駐於黑爾茲哥維那（Herzegovina），與在維也納和加里西亞（Galicia）一樣。軍官團仍舊是日耳曼人，高級軍官更屬如此。藝術和科學完全是屬於日耳曼人的，除了晚近所發展的藝術（這或許是黑人的產物）之外，凡是具有真正的藝術思想以及傳播者，都是日耳曼人，而且只有日耳曼人。至於音樂、建築、雕刻和繪畫方面，維也納的聯合帝國（Dual Monarch Doppelmonarchie），好像是有無盡的源泉，永不會有涸竭之日。

最後，全部外交政策的責任，也是完全由日耳曼人來擔負；不過偶然或有少數的匈牙利人在內罷了。

但是，想維持這帝國的任何企圖，因爲缺乏重要的原素緣故，所以完全歸於無效。

在這個人種複雜的奧地利帝國中，惟有一法，能夠把各民族分離的趨勢克服，就是國家必須中央集權，他的內部組織，也須照此目的而進行。

居於最高地位的奧王，在頭腦清醒的時候，也能見及於此，不過他旋即忘懷罷了；這或者是因其困難，而不克實行集權政策的緣故。

德國的統一，因其人民是由一種單純的人種所組成，而且常以一種共同的文化爲根基，所以問題祇是在政治上傳統利弊的改革。至於奧地利，他的情形恰恰和這相反，他們各邦之中，除去匈牙利之外，大都是沒有偉大史跡的；即使有，也是隨着時代而消滅了。總之：大都是暗淡無光的。然而在各邦之中，民衆的勢力，則日有發展，在這王國的邊境，「民族國家」開始形成的時候，尤其是難於羈馴的；因爲這種人民和奧國國內的各族。或是血統相近，或是種族相同，他的吸引力實在比較日耳曼的奧地利人爲大。

這種鬭爭，就是在維也納，也遭到了失敗。

自從布達佩斯（Budapest）發展而成爲一個重要的城市，維也納也就首次遇到了勁敵，這勁敵的事業，並不重要在聯合整個的王國，而是重要在鞏固王國中的一部分。不久，卡拉克（Prague）也仿效了布達佩斯的先例：於是來姆貝格（Lemberg）、萊白哈（Leibach）、以及其他城市，亦都隨之而興起了。

自從約瑟夫二世（Joseph II）逝世（一七九〇）之後，這個事業的進程，便能夠很明白地尋找了出來。他的速度是依多種的因素而定的。這種因素，一部分鞏固在帝國的本身；但是，還有其他方面，那便是帝國在各時期對外政治地位的結果。

如果要維持這國家的鞏固，堅持到底，那惟有堅決地行使着一貫的中央集權制，這才能見到功效。但是形式上的統一，必須在原則上，先要確定一種統一的言語來表現的；而完成這事業的專門工具，又必須操之於行政機關；倘使沒有統一的言語，那麼，統一的國家，便不能持久。要使統一而持久的國家觀念產生，唯一的方法，惟有用學校和教育。但是，這事業並不是一二十年所能成功的，我們必須要有數百年的計劃，因為這正和一切的殖民問題相同，目的的堅定，較一時的努力，尤為重要。

奧地利帝國，並不是由一種民族組織而成的，其維繫的關鍵，不在共同的血統，而在共同的武力。所以領袖者的無能，未必就能引起國家的不振，反而可以因為人種的不同而激發起各民族的本能；倘使某種的意志超越而上的時候，那麼，這種本能，勢必被阻碍而難於發展的。

哈普斯堡皇室，不能看清楚這一點，這也許就是他的可悲罪惡吧！

曾經於某一時期，命運之神，又高攀了火炬，而照射到這塊土地上來；但是，很可惜的，這火炬旋即永遠的熄滅了。統轄日耳曼國家的約瑟夫二世，十分憂慮着皇室偏安於帝國的極邊，倘使不能及時彌補其先人的缺點，那勢必要陷於人種複雜的漩渦之中。這一位「人類良友」的約瑟夫，他用了一種超人的精力，去補救前君疏忽的地方，並且想在十年之內，努力去恢復數百年所失落的工作。所可惜的，就是他繼承人的思想和能力，都不能夠擔負這一個重大的責任。

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不論在什麼地方，都是階級鬭爭；可是在奧地利，則是民族間一種新鬭

爭的發軔。日耳曼人對於這一點，或是因為健忘，或是因為認識不清，反而去從事革命運動，其結果，因而就判定了他自身的命運。他們曾經努力的喚起了世界民主政治的精神這種精神，把他本身生存所具備的要素，在短期之中便被毀滅了。

在不曾先定下一個共同的言語原則之前，而先來成立一個國會，這便是使日耳曼人種的勢力宣告終止的一個緣由。從此，國家將有顛覆之慮，結果便是使歷史上減少了一個帝國。

我很不願詳細的述說瑣事，因為這並不是我敘述本書的目的。我僅願搜集種種的事實，來作縝密的考慮，因為這種事實，常是民族和國家的衰敗原因，在現代，這是很有意義的，而且對於我決定政治思想的原則，也有着不少的幫助。

國家的正在崩潰，已經由各種制度昭示給一般國民了；這些，即非明眼人也能見得到的，他的主要點便是國會，在奧地利或稱帝國議會，（Reichsrat）而這國會，便是依恃了力量而作為根本的要素的。

顯然的，這種團體，係依舉着民主政治策源地的英國國會。這個制度，全部由英國而移植於維也納，中間更改的地方極少。

英國兩院制新生命，便又重見於貴族院（Abgeordnetenhans）和下議院（Herrenhaus）中了。但是，兩院的本身，稍稍有着不同。當巴雷（Bary）在泰晤士河（Watersof Thames）畔建造議會的時候，他便取材於「不列顛世界帝國」（British World Empire Britis

ches Weltreich) 的歷史，以作這所華廈中一千二百壁龕、托架。以及支柱的裝飾，這富麗堂皇的貴族院和下議院，便成為民族光榮的建築了。

這是維也納的第一個難關。因為當丹麥人哈森(Hansen)完成他大理石宮最後的尖頂時，便想到用一些古代的材料來為之裝點。於是把希臘羅馬的政治家以及哲學家的肖像，都裝飾在這「西方民主政治」劇場式的建築上了。更有一譏諷的象徵，就是屋頂的四角趨向於四方，這是完全表示着他的內部分離之勢的。像奧地利的歷史，因為這項的建築而獲得了光榮，那各民族將認這一種是侮辱和挑釁；正像在德意志帝國，一直等到世界大戰爆發，才開始敢把「獻給日耳曼人民」(To the German People dem deutschen Volke zu weien)的題詞，鐫刻在柏林城中保羅華勞脫(Paul Wallot)的帝國議院的建築之上。

在奧地利境內日耳曼民族的命運，完全是依靠着國會的勢力而定，直到普選制和不記名投票制，未曾採行的時候，日耳曼人仍舊在國會中佔着多數。但是因為社會民主黨行為的不可靠，使那時的情形，便成了不堪聞問；因為這黨常出來反對日耳曼民族的利益重要問題，使他們黨內其他民族的黨員發生異心。就是在當時，社會民主黨已不能視為日耳曼人的政黨。直至採行了普選制之後，日耳曼人的優勢，便不能再在數字上佔得多數了。到了這時候，國中排斥日耳曼化的進行，已到達無法可以阻止的地步了。

因為我當時抱着民族自決的決心，所以很不滿意於代議制；因為這種制度，不但不能代表日

耳曼民族，而且常常欺騙而出賣日耳曼民族。這種罪惡，正和其他的罪惡同樣不可歸咎於事件的本身，而當歸咎於奧地利國的。過去，我還以為日耳曼人如果能夠在國會中重佔多數，那麼，舊國家繼續存在，在原則上，我並沒有反對的餘地。但是，為時不久，那可憐的喜劇，就展開在我的眼前，這便使我怒不可遏了。

現在西方的民主主義，就是馬克斯主義的前驅；如果沒有民主主義，那馬克斯主義就無從產生的，所以民主主義，實在是馬克斯主義的根源。民主主義的外形——議會制度——它像是「一種糞土和火中的怒物」，可惜這火的燃燒太快了。

這真是幸運，我有機會居住在維也納，因而能夠考察這個問題。假使當時我在德國的話，這問題的解答，恐怕就不能這樣的輕易。倘若我在柏林的時候，便得知了這一種所謂「國會」的荒謬，我或許會陷於極端的反對，而且不惜目的，和那些為人類和時代的敵對者，聯成一氣。

這種事，在奧地利實是不可能的。因為這並不像由這一個錯誤，轉移到另一個錯誤上去的那樣容易。假使說國會是毫無價值的東西，那麼哈普斯堡族是無價值了。

由國會來決定國事，所得的結果很是不利，但是，決不是一人所能負責的，而且也沒有一人能夠說明它的原故。一個政府做錯了不少的事，因而引退了，但這政府豈能說這是負責改變政黨，或是解散國會，這國豈能說是負責？因為多數人既時常在更動，又怎麼能夠叫他負責呢？不是責任觀念和人格有着密切的關係嗎？但是，如果政府的各種措施；須得顧到多數人的意向和喜怒哀

，那麼，事實上又豈能對那領袖人物提起公訴呢？

一個做領袖的政治家，他的事業並不重在有獨創的思想和計劃，而竟着重在使他提議能爲一群愚人所能了解，以求得他最後同意的技術嗎？政治家的標準，豈是專門在游說方面，而不在對重要的行爲和決議，具有當機立斷的政治手腕嗎？

世界的進步，不是出於個人的腦力，而是出於多數人集合的智力，這是我們可以相信的嗎？我們豈能懸想將來的文化，不是由這觀念而來的嗎？反之，個人的腦力，不是現在較之往昔更爲需要嗎？

國會取決於多數的原則，是在否認個人的權力，而代以到會的多數議員，這實在是違反了貴族政治的基本原則的。貴族政治中所謂上等階級，這並不是我國今日腐敗的上流社會。

讀猶太人報紙的人，如果不知道自己去加以思考，那必定不容易聯想到近代國會制度的流弊。這就是有着不學無術的人，充斥在政界中的主要原因。因爲真正的領袖，他既脫離了這種不重創造和生產，而以賄賂獲取多數贊助的政治活動，那麼，政治的活動必定和低能者發生妥協，而且這是低能者所極喜歡的。

多數，絕對不能代替「人」，這是我們必須牢記的。多數，常是愚蠢政策，和懦弱的政策辯護者，會合着一百個愚夫，亦不能成爲一個聰明人。所以英武的決斷，決不能從一百個懦夫中得到。

民主政治的結果，就使國內重要的職位，有着極速的更動，這種事，無論在那一種情形中都是很不利；而且易於發生十分惡劣的影響。因為不僅是庸碌無能的愚蠢者，因此得到了犧牲，便是那僥倖在位的真正領袖，也要受到更大的犧牲。

這結果，便是領袖階級，愈加感到了精神的頹喪；而國家的前途，那是不論什麼人都可以想見得到的。

普通我們對於「輿論」兩字的概念，僅有一小部分是根據了我們本身的經驗和知識，至於主要的部份，還是根據著我們的聽聞，常常由「啓迪」的形式來鄭重地詔示著我們的。民衆的政治眼光，僅能覺察到靈魂和智力苦悶的結果。

在政治「教育」（這裏可以稱之爲「宣傳」）中。最有效的方法便是報紙，因爲報紙是從事於「啓迪文明」的工作，對於成人，竟不啻是一種學校。這種教育，不操之政府手中，而竟爲卑劣的勢力把持着。我在少年時代，住居在維也納，得有絕好的機會。認識了這民衆教育機關的主辦人和計劃人。最初我很詫異，他們竟能在短時期中用欺騙的手段，來轉變公衆真正的志願和意見，而爲國內的惡勢力造成一種確定的輿論。但是，幾天之後，這種謬論，竟成爲國內的重要法令，同時，一切重要問題，反而竟無人去過問，或竟不再受民衆的記憶和注意了。

他們往往在幾星期之內，在無聲無息中一躍而成爲名人。在一般人的心裏，而且還對之抱着無窮的希望；他們竟享有真正的偉人畢生所不能得到的盛名，但他們在一月以前還是默默無聞的。至於那些政界中老成可靠，而能力傑出的人物，他們都鞠躬盡瘁地死了；或者遭受人家的毀謠。

，他的姓名幾變爲不齒於人們的口中了。猶太人的手段，常如念咒的人，能同時從數方面毀謗好人的名譽，我們必須先來研究這一種無恥的方法，因此我們可以知道這些敗類，他們在報紙上所有的危害性，是如何的嚴重。

如果我們把民主政治的議會制，和真正日耳曼的民主主義來比較一下，我們立刻可以明瞭；人類這一種無意識，而且具有危險的錯誤。

民主議會制，最顯著的一點，就是選出若干人——就算是五百人吧——來決定一切事件。所以他們在實際上就是政府，縱令從他們這些人中選出一個內閣來，爲國家處理一切的政事，這也不過是一個傀儡內閣而已。在事實上，這個所謂政府者，事先不是經過了議會的同意，不能施行任何的政事。這種政府，任何事都不能負責任，這是因爲最後的決定權，並不操在政府手中，而操之在議會多數黨手中的緣故。政府的存在，僅僅是執行多數的意旨而已。

在今日，民主議會的目的，並不是在組成一種好人會議，而是在集合一群卑鄙無用的人；他們的智力有限，所以是易於驅使的。惟其如此，才能運用今日不健全的政黨政治。而且，使暗中操縱着特權的後台老闆，也更能安然度日，不必擔負個人的責任。因爲一種決議，無論它怎樣的有害於國家，都不能歸咎於衆目共觀的任何一個奸徒，而可把責任卸在全體的身上。

這樣，在實際上竟可以說是無所謂責任；因爲責任是祇能由一個人擔負，而不能歸之於只會空談的國會身上。這種制度，祇有那些可以取悅他們，或是有益於他們暗中操縱的那些奸徒；至

於那些負責的人看來，那是實堪痛恨的。這種民主的方式，便是爲某種種族的工具，該種族爲了要促進他本身的目的，所以在現在和未來，便不得不避去光明而再在黑暗中了。只有猶太人，才能重視這種制度，因爲他們的齷齪和虛偽，實在和他是相仿的。

和前面所說相反的，那就是真正的日耳曼的民主政治。日耳曼的領袖，是自由選舉出來的，他對於所有一切直接的行爲，完全負着責任的。在這種制度之中，個別的問題，並不取決於多數的投票，而完全取決於一人，而且他把自己的生命財產，來爲這取決的問題做保障。如果想求得一個自願致身於這種危險事業的人，那是恐怕不可能的，如果有人要來反對他的決斷，那我們惟一的答語，是：「感謝上帝，日耳曼民主政治的要點，便是在使那些卑劣的閒人，和狡猾的醜類，不能陰圖倖進，上台去統治他的同胞；而那些庸懦無用的人，也將因爲這個責任的重大，而對之畏避了。』

近年來，在國會的統治之下，舊哈普斯堡帝國，已經日趨衰弱了。日耳曼人的優勢，既因國會而遭受沉墜，於是便發生了一種使民族互相攻訐的制度，這制度是指向日耳曼民族加以攻訐的。尤其在法蘭西斯·斐狄南大公（Archduke Ferdinand）即位以後，他的勢力擴大了，遂即發生了一種增加捷克（Czechs）勢力的計劃，這本是他們居於在位者的政策。這位奧匈聯合帝國的未來統治人物，他對於破壞日耳曼民族化的進行，在他勢力之下，努力鼓勵而且親爲贊助，至少是加以保護。純粹的日耳曼鄉村，便被政府用了迂迴的間接方法變成了語言複雜的危險地帶

了。在低部的奧地利（Lower Austria），這情形進步日見甚速，而且許多捷克人，竟把維也納當作了他們的首都。

這位新哈普斯堡皇胄（他的家庭中說着捷克語，而且大公的妻子是一位捷克的貴婦人，她生長在仇視日耳曼民族的環境中，太子與她結婚，本屬屈就的。）的主要思想，是依嚴格的天主教，而逐漸在中歐建起一個斯拉夫國家，和那信奉正教的俄國作對抗。因為情形是這樣，因而宗教又供純粹的政治思想所利用，這正是哈普斯堡皇室所常有的事。如果由日耳曼人來觀察，那麼，這實是一種為害最大的思想。

從各方面看起來，實有着更厲害的悲慘結果。因為哈普斯堡皇室和天主教會都不能獲得像他們所希望的利益。

哈普斯堡皇室既失去了帝位的寶座，羅馬因而失掉了一個大國。

奧皇靠了宗教的勢力，以達到政治的目的，竟然能夠喚起一種意想不到的精神。這種精神，起初沒有人看作是不可能的。他極力設法來消滅舊帝國日耳曼民族的特性，而這反響，實為奧地利的汎日耳曼運動。

世界大戰之後，哈普斯堡皇室，已經具備了最後的決心，逐漸來剷除危險的日耳曼民族——這確實是一種親斯拉夫政策的目的——於是全國便起而革命，決意抵抗到底，這是近代日耳曼史上未曾有過的先例。

這樣具有愛國思想的熱心者，便一變而爲亂黨了——這些亂黨，他並不背叛國家的本身，背叛一種政府制度；因爲他們深信這種制度，必定會毀滅民族特性的。

在晚近的日耳曼的歷史中，能夠判別出對於皇朝的忠誠，以及對於祖國和民族的愛護，這還是第一次。

我們必須知道的，人類生存的最高目的，並不在維持一個國家或是一個政府，而是在保存其民族的特性。

人類的權利，實在高於國家的權利。一個民族，假如因爲人類的權利而起來奮鬥，即使遭遇了失敗，以致不能立足於世界，這是他命運不佳的緣故。要是一個人不能爲他自己的生命作奮鬥，那麼，公正的上帝，早已注定了他的末日。

怯懦民族，在這世界上是不配生存的。

凡是有關於汎日耳曼運動的興起和衰落，以及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驚人猛進，這都是我研究的目標，而且對我是具有深切的意義的。

我首先對兩個人作研究，這兩個人可以說是這兩種運動的首創者和領袖，就是喬治薛耐雷（Georg Von Schoenerer）和卡爾·西格勒博士（Dr. Karl Lueger）。

這兩個人都是超出了會中一般議員之上的。雖然他們處在惡濁的政界中，然而他們的生活，依然能夠保持着清白而不起腐化。起初，我雖然也同情汎日耳曼派的喬治薛耐雷；但是後來便

慢慢地同情基督教社會主義黨的領袖了。

我常把他們兩人的能力，來加以比較，覺得薛氏對於基本問題方面，似乎是一個比較優良堅定的思想家，他斷定奧國的結局，實在比任何人更為清楚正確。他對於哈普斯堡皇室的警告，假如被採納的話，那麼，德意志和全歐對抗的慘禍，當然不致發生了。

這類問題的內部，薛氏是認識清楚的；但是對於人類本質的見解，那就有着謬誤的見解了。這一層，便是呂氏的優點。呂氏的識人本領，實是罕見的。他的觀察，也不致有着過分的損失。所以他深悉人生中，是實際可能的事。薛氏對於這點，就了解得很淺。一切汎日耳曼的運動者他們的理想，在理論上大都正確的，但是缺乏了力量和理解。所以傳播其理論上的知識，不能應用一定的方式，使民衆易於明白，因為民衆的了解力是有限的。爲了這個緣故，一切的知識，便成爲一種先知者的智慧，絕無實現的可能了。

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十分有限的，可惜薛氏對於這一點不大明白。因爲資產階級爲了他自己經濟地位的緣故，每個人都深恐蒙受到一種損失，所以他們的行動，相當的受到了阻礙。

薛氏對於下層社會的重要性，缺乏深的了解，這實在是他對於社會問題的見識淺陋緣故。

在呂氏，這恰好和薛氏相反。他十分明白，現在上層的資產階級的奮鬥力，是極薄弱的，在一個偉大的新運動之中，是決難獲得勝利。因此他就準備利用一切現有的力量，聯絡強大的現存組織，使他能運動，從這種舊有的力量去獲取最大的利益。

呂氏的新黨，最初是把行將崩潰的中等階級作爲基礎，因此他就獲得了一般極難動搖的黨徒

，他們既能受極大的犧牲，又能作堅決的奮鬥。他又善於聯絡天主教會，他這種聰明的舉動，終於獲得青年牧師的對他贊助。於是舊教士黨（Clerical Party）祇得被迫而退出競爭的政治舞台，其中比較明達的，或許竟也來加入新黨，以期慢慢地再恢復他的地位。

如果我們把上面的所述，認為是呂氏的惟一優點，這對於他的判斷就失去公平。因為他不僅具有一個偉大的軍事家特長，而且還是一個真正奮發有為的偉大改革家，不過他能夠十分明白事機的可能性，以及和他自己的本身力量，所以能夠有所限制。

呂氏所抱的目的十分切實。他想抓住王國的心腹——維也納。然後再把殘餘的生命，由這心腹而侵入行將滅亡的衰老帝國去。如果心臟是健全的，那麼，身體的各部，自然能夠復原的。這種觀念，在原則上是很正確的，但是，要見之於實行，那就受到了限制。

這些，確實是呂氏的弱點。他做市長時的業績，無疑地可以永垂不朽，然而，為時太晚，他已不能挽救這個王國了。

他的政敵薛耐雷，對於這一點，是比他看得清楚的。

總說一句，凡是呂氏所做的事，大都獲得了異常的成功；但是他所希望的事，便完全成了泡影。

薛氏對於他的志願，完全不能實行；而且不幸得很，凡是他所恐懼的，大都又在這可怕的狀態之中，一一實現了。

因此，他們兩人不能達到他們的遠大目的。呂氏並不能夠拯救奧地利，但薛氏也未能防止了日耳曼民族的衰頹。

我們現在來研究這兩黨的失敗的原因，是能夠給予我們很多益處的；因為照今日的情形看來，和當時有許多地方頗相類似，可以給我們做借鏡，不再去蹈呂薛兩氏的覆轍。

汎日耳曼運動所遭遇的厄運，就是由於開始的時候，不知道獲得民衆的依附信仰。這運動慢慢地趨向於資產階級化了；在表面上仍是很尊嚴，但內中仍屬很激烈的。

當汎日耳曼運動最初興起的時候，日耳曼民族，在奧國的地位，已經是陷在絕境之中。後來，年復一年，對於逐漸消滅日耳曼民族的政策，國會愈加默認了。現在，我們想要挽救，惟一的希望，旨在取消國會，然而這事的希望又是很少的。

汎日耳曼運動者，也曾加入過國會，可是，大都失敗而退出了。他們在國會中的發言，不但不能日見重要，反而竟日見不重要了。因為，他們的演說，僅能及於蒞場的聽衆，或是在報紙上接受他們的言論一小部分的人。

但是，最大的場所，給聽衆最爲直接接觸的，並不是國會的議事廳，而是群眾大會，因為在群眾大會之中，到會的人常以千計，而且都是聞聽而來的。反之，出席國會議事廳的人，不過區區的數百人而已。而且這區區的數百人之中，多半是爲領議員薪金而來的，並不是要一聽人民代表的高論。

在這種場所演講，枉費工夫，毫無成效，可說是對牛彈琴，這是已往的事實。汎日耳曼派的議員，雖然力竭聲嘶的演說，可是聽者藐藐，仍無微效。報章上對於這種演說，或是全然置之不理，或大為刪改其文氣——甚至其意義，也被顛倒錯置，或竟完全消失了。這種新運動的目的，僅僅使民衆得到一個最不良的印象罷了。各議員言論的重要點，並不在言論的本身；而在言論對於讀者所發生的印象。現在演詞既被割裂，那讀者所得，僅僅是其中的一片段，（他們的用意就是如此），祇能產生出一種毫無意義的印象。所以，祇要看一下他們所曾演說的地方，不過只有區區的五百個聽衆，我們僅憑這點便可明白了。但是，還有更糟的在後面呢！

倘使汎日耳曼運動，能夠一開始就認清了這種問題，不是在組織一個新黨，而是在形成一種人生觀，那麼這是可以有勝利希望的。因為只有這種人生觀，才能喚起內在的力量，實行奮鬥到底。要達到這個目的，只有最優秀最勇敢的人始能有望。

倘使爲一種世界制度而努力奮鬥，指導者不能英雄地犧牲一切，那麼，在短時期內，要想覺得一般敢死的戰士，這實在是不可能。因為僅僅爲了他個人而奮鬥，便不會再有餘力去顧到大衆了。

汎日耳曼運動，和天主教會的衝突，很明顯的，實在是由於不了解人民心理的緣故。這可以說是衝突唯一的解釋。

把捷克人委派到各區去當牧師，這便是使奧地利變爲斯拉夫國家的方法一種。這方法就是委

派捷克人做牧師，他們視捷克民族的利益，在教會利益之上，所以他們就成為破壞日耳曼民族化運動的核心了。

在這種情況之下，日耳曼人的牧師，便完全受到了失敗。他們不但不能為日耳曼的民族而奮鬥，並且還不能抵抗對方的攻擊，這樣，日耳曼民族，一方因為教權的濫用，一方面為抵抗力的薄弱，於是便慢慢地屈服了。

薛耐雷作事，他一向是虎頭蛇尾有始無終的，他們實行和教育奮鬥，深信惟有這種的奮鬥，才可以拯救日耳曼的民族。「脫離羅馬教會」的運動，好像是最困難，但又最有力的攻擊方式，其結果勢必把敵人的堡寨予以破毀。假使能夠成功的話，那麼，日耳曼民族不幸的宗教分裂，便可永遠解決了。這樣的一種勝利，對於帝國及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實力，是有着巨大的利益的。可惜，他對於這個奮鬥的主張和推論，大都是不正確的。

毫無疑問的，對於影響日耳曼民族的一切問題，日耳曼人的天主教牧師，他們的抵抗力，實在不及非日耳曼人的牧師，尤其不及捷克人。捷克的牧師，以主觀來對待他們自己的民族，而以客觀來對待教會；日耳曼牧師的熱心於教會，實在是主觀的，但是，對待日耳曼民族，却反屬客觀了。

現在試把我國官吏階級，對於一個民族復興運動所取的態度，與任何其他民族的官吏，在同樣情形下所取的態度，來比較一下。我們怎能夠設想世界上任何的官吏，能用「國家的威權」一

句話，來排斥民族的要求，像我國在五年前所發生的嗎？而這事竟還被視為極自然，而極有勞動的呢！

當我把汎日耳曼運動，羅馬的鬭爭，加以研究之後，得到了下面的兩個結論：這種運動，因為它對於社會問題的意義不明白，所以失去民衆的奮鬥力量。這是第一點：因為加入國會，所以失掉了推進的力量，並且爲國會的弱點所牽累，這是第二點。他們反對教會的鬭爭，致使失掉大部下層以及中等階級的信任，並且再失掉大多數可稱作有民族性的優秀分子。

奧地利國內的「文化鬭爭」(Kulturkampf)的結果，實際上簡直是等於零。

倘使政黨並不想摧殘民族的道德，那就不應該和宗教問題發生任何的關係；同樣。宗教也不應該混入政黨的陰謀中去。

如果教會中的長老，他們利用宗教的制度和教義，去損害他們自己的民族，那他們便不能得到人們的信從；他們不應該以自己的矛，來攻自己的盾。

一個政治的領袖，他如果具有改革家的優點，是絕不該去干涉人民的教義和組織的；否則。他就不應該去做一個政治家，而宜去做一個宗教改革家了。

其他無論什麼態度，都要引起大禍來的，尤其是在德國。

基督教新教(Protestantism)自能促進德國內在純潔民族的愛國心，或是維護日耳曼於族的生存、語言以及自由，因為這些都是新教的根本要點；但是要從惡敵的手中去把民族救出來

，這一個企圖，在新教是極端仇視的。因為他對猶太教的態度，差不多已經成爲一個信條了。這個問題，新教對之，仍是抱着遲疑不決的態度——如果這問題不能得到解決，那麼，復興日耳曼的一切企圖，大都缺乏意義，或者沒有成功的希望了。

我們現在的兩種教義，對於猶太問題所取的態度，不是和民族的重要，以及宗教的需求，都不相合嗎？試把猶太的牧師，對於一切有關於猶太人的問題所取的態度，來和我國的牧師（這兩教派的大多數牧師現在業已停職！）的態度兩相比較一下，那就可以明白了。這一些，在我們形成抽象觀念的時候，所常有的一種現象。凡是「國家權威」、「民主主義」、「國際團結」等等的觀念，我們常使之變爲一種固定而純粹的理論，以後凡是碰到有民族確要的事件，就可以一概由這個觀點來給予判斷了。

凡是在汎日耳曼運動失敗的各處，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因爲都看得十分明白，所以處置起來，都很妥善而有計劃的。

基督教社會黨，對於民衆的重要性，有着很深切的了解，所以一開始便明白宣佈其社會性，以便吸引一部分的民衆。自從他真正收納了下層中等階級工人階級之後，便獲得忠實而有犧牲精神的黨徒。這黨爲了要避免和任何的宗教團體發生衝突，因此便被有勢力的教會與以擁護。這黨很深切的知道大規模的宣傳價值，並且從心理上影響一般民衆的本能。

這黨一心想救援奧國而遭遇了失敗，他失敗的原因，便是在方法的錯誤，（這錯誤有着兩方

方面），和目標的糊塗。它的反猶太主義，是依據了宗教觀念，而不是以種族為基礎的。這種錯誤的由來，正與造成第二錯誤的原因相似。它的創始人，以為如果基督教社會主義黨，要救援奧國，那就不應該根據了種族的原則；因為假使是如此，那麼，奧地利在不論何種情形之下，全國必定解體。這黨的領袖，以為在奧地利現狀下的維也納，必須盡力避免分裂的趨勢，而應該擁護促成統一的觀點。

在那個時候，捷克分子，大量的侵入維也納，所以除了對於一切種族問題，大都作着極端的容忍外，竟也無法可以使這些分子不反對日耳曼民族。假使要救援奧地利，那麼，這種分子，也是少不了的，所以該黨的領袖，竭力排斥曼徹斯特（Manchester）的自由思想派，以謀聯絡維也納城中的大多數捷克小商人；他們想靠這點作根據，為反猶太主義增加一個口號，並且想藉此而化除舊奧地利國內一切人種的紛爭。

這是十分明顯的，根據宗教而起來的爭鬭，對於猶太人不會感覺到多大痛苦的。假使情形到了無可奈何的時候，祇要有一滴聖水，便可以解救他們的危難，而且還可以保存着他們的猶太教。

因為這種不徹底的辦法，就使基督教會主義黨反對猶太人的主張，失掉了真實價值。

這種虛假的反猶太主義，比無論做什麼都壞，所以與其有，實質上還不如無，因為人民已被催眠而入於昏迷的狀態了。自己以為已經執住了敵人的耳朵，那知道他的自身反被人牽住了鼻子。

呢！

呂格兒博士假使是生在德國的話，他便可以做我們的民族偉人之一；不幸，他這個人和他的事業，都發生在無能的奧地利。當他死的時候，巴爾幹的微弱火燄，已經慢慢地日見擴大了，所以慈悲的上帝，特地奪去了他的生命，因為不忍使他目覩到他自信能夠防止的事變。

關於日耳曼民族復興的目的和理論，汎日耳曼運動都是十分正確的，可是，在他所選擇的方法，是不大恰當的。這種運動，是有着他固有的民族性，但是因為缺少社會性的緣故，他因此而不能得到民衆的同情，這是很可惜的！他的反猶太主義，是基於種族問題的重要，而不是基於宗教的原理。還有，他反對一種確定的教義，那是在事實和策略上完全是屬於謬誤的。

基督教社會主義黨，對於運動復興日耳曼民族，他的目標過於含混不清，不過在他的這個政黨而言，他的方法實在是對的。因為這黨能夠認識清楚社會問題的重要，但是，反對猶太人的鬭爭方法，不免是錯誤的，而且還把民族觀念的重要性忽略了。

在當時，我極不滿意地失望了，而且我知道了奧地利的空虛，我愈感到要拯救奧地利是無望了。我深深地感覺到：奧地利代表日耳曼民族的不幸；我於是憎恨着維也納人種的多難。我更憎恨着捷克人、荷蘭人、匈牙利人、羅沙尼亞人（Ruthenians）、塞爾維亞人（Serbs）、克羅特人（Croats）的蜉蝣集在一處，最討厭而憎恨的，便是到處都可遇見寄生的猶太人。

我毫無一些愛護奧地利的心意；但是，對於德意志帝國是永矢弗忘的。所以我看到奧地利帝

國的崩潰，便是日耳曼民族得救的開始。因此，我想回到我情感所寄託的德國的心念愈切，因為我在幼年時代已私心嚮往了。我希望我將來做一個著名的建築家，不論命運是怎樣，我必專門為民族效勞。我希望我能夠享受我應有的幸運，並且要在他那裏參加國事，我最熱烈的志願，終將實現在那裏，這便是我所愛好的家鄉。能夠和祖國——德意志帝國——聯合而成為一個國家。

在我的一生之中，維也納實給予我最艱苦，而又最完備的訓練；到了現在，我才開始能夠完全認識這幾年中的訓練價值。我對於這時期與以詳盡的論述，就是因為在這時期中，我明瞭與我黨主義有關問題極多的緣故。我黨在創始的時候，規模很小，僅僅五年（本書寫於一九二四年），便成了一個偉大的民衆運動。倘使命運不是早早給我這種經驗，使我的政見有了確切的基礎。那麼，我將不知道用什麼態度去對猶太教，社會民主黨，馬克斯主義，以及其他所包括的一切社會問題了。

第4章 在慕尼黑

一九一二年的春天，我到慕尼黑（Munchen）去。

這真是一個處處和維也納不同的德國城市！當我想到維也納那種各民族雜處的情形，心裏感到十分不快。慕尼黑的語言，差不多和我的語言相同，使我回想到青年時代在下巴維利亞（

Lower Bavaria）的那種情況。此地在各方面都和我有一種親密之感，我和這地方關係的深切，實在遠超於世界其他各地；因為，這地方和我的發展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

聯盟的贊成者，在奧地利僅僅只有哈普斯堡的皇冑，以及日耳曼人而已。因為哈普斯堡皇冑的贊成，係出於強迫和計劃；日耳曼人的贊成，是因輕信和不明白政治的緣故。由於輕信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想藉三國聯盟（Triple Alliance）來謀求日耳曼帝國的強盛和穩固；由於不明白政治而贊成者，就是因為他們的想像和事實不符，他們的所為，實在不過是使日耳曼帝國附著在一個國家的殭屍而已。所以，結果必使他們墮入深淵而不能自拔；況且聯盟能夠使奧地利慢慢地脫離日耳曼的民族性。因為哈普斯堡皇冑既是相信和帝國聯盟之後，便可不受帝國的干涉——不幸，這一點真是見到的很對——所以他們不難把日耳曼人在國內的勢力逐漸消滅，不會發生什麼危險，而且也無須顧慮到德國政府所提出的任何抗議，這是因為德國政府的觀點，素來是以「客觀」態度著名的，他們對付奧地利的日耳曼人，也是常常可以憑藉聯盟來抑制反對，無

任何堅決的呼籲，凡斯拉夫人加以特別可恥的袒護而引起的，都可以用那聯盟的口實而予以制止。

假如我們對於歷史以及日耳曼的民族心理，有過精密的研究，那麼，決不會有人能夠相信義大利和奧地利，會站在同一戰線上，作共同的奮鬥。假如不論那一個政府竟敢爲其所痛恨的哈普斯堡派遣一兵一卒（除非是和奧國爲敵），那麼，義大利必定立即震怒而將如火山一樣地爆發了。當我在維也納的時候，常常見到義大利人，對於奧國有着強烈的輕視，和無限的仇視。將百年來，哈普斯堡皇室爲反對義大利的自由和獨立，所作的重大罪孽，義大利是永不能忘掉的，即使想要忘掉，實在也不可能，何況義大利的人民或是政府，大都是無意於忘掉呢！所以，爲義大利的利害計，對付奧地利，惟有兩條路，這兩條路，便是聯盟或是開戰。

義大利人很從容的擇取了前者，自然可以安然準備後者了。

德國的聯盟政策，是既無意義而又多危險的，況且奧俄的關係，又是正日趨於用武力來解決的時候。到底爲了什麼而要締結同盟呢？這不過是趁國家尚能有着自主締約機會的時候，來保障國家的前途而已。所謂國家的前途，又不過是使日耳曼民族繼續生存的問題而已。

德國的人口，每年要增加九十萬人，養活這些新增人口的困難，自然是與年俱增的。除非我們未雨綢繆，先來找取方法，而加以防止，那麼，結果是必定會罹其禍殃的。

要替這些繁殖的人口，來找工作和麪包，不外是兩條路，就是開拓領土和採取殖民貿易政策。這兩條路，都曾有過種種的考慮、研究、建議及辯論。但是，都被各種理由加以推翻了。最後

才決定採取第二條路。這兩條路比較起來，當然是第一條比較健全些。因為獲得新領土以及容納過剩的人口，這利益是無可限量的，尤其是在將來更為深遠。

現在領土政策唯一的希望，祇是限於歐洲一地，不能擴充於喀麥隆（Camerouns）等的地方去。我國東陲的兩處邊界及領土的範圍，都是由奮鬪而來的，所以我們對這為生存而奮鬪的決心，那是不得不感謝的。我們所以能夠生存到現在的緣故，也是完全靠着這一個決心而成功的。

這種解決的方法，所以正確而合理。還有另外的理由存在：現在歐洲的許多國家，大都像倒置着的金字塔，因為他們在歐洲的基礎，比他們對殖民地和國外貿易的各種負擔，直像頭重腳輕的樣子，簡直可笑之至！我們可以說，上至歐洲，而下則散至世界各地，和亞美利加合衆國奠基於本洲，而上和地球各處相接觸的情形顯然相反。所以，美國內在的資源非常雄厚，而歐洲諸殖初地的國家則大都比較衰弱的樣子。

這種顯明的例子，就是英國也不能作為反證，因為我們常易忘却那盎格魯撒克遜世界和不列顛帝國關係中的真實性質。英國僅因他的語言文化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相同，所以英國不能和歐洲的其他各國相提並論。

德國要想實現健全的領土政策，惟一希望，就是在歐洲本部能夠獲取新的領土，假使殖民地不適宜大批的歐洲人，那麼殖民地對於我們也是毫無用處的。在十九世紀，要想用和平的方法去獲得殖民地，已屬不可能了。所以，要想實現這種殖民政策，祇有出之於堅苦奮鬪的一條路；但

是，這種奮鬥，是在謀取大陸和本國鄰近的領土，而並不是歐洲以外土地，那是更爲適當的。

這一個政策，想要使他實現，在歐洲，惟一可能的聯盟，只有一個英國。如果我們德國再來實行侵略，只有英國才是能夠做我們的後盾。我們有權來實行行爲，實在不遜於我們的祖先。我們的和平主義者，坐享着東方的產物而不稍躊躇，不知道最初開闢東方的工具，竟是刀和劍呢！我們應該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去獲取英國的好感。所謂犧牲，便是放棄殖民地 and 海上霸權，並且再避免因爲我們的商業競爭，而妨礙到英國的實業。

英國有一時期，希望我們能夠有這種表示，因爲：英國也很明白德國爲了人口的膨脹，必須謀得一個解決，這解決的方法，或是借助於英國在歐洲謀求解決；或是無須英國的幫助，在別處地方自己去謀解決。

十九世紀末，英國希望和德國親善，實在就是出於這種感情。但是，德國人大都以爲此舉是徒供英國的利用，所以均感不安，像是一朝締結聯盟，不必用互惠來作基礎的！實在，基於互惠的原則，德國對英的交涉，可以得到順利的進行。我們必須要知道，英國的外交政策，很是機巧，假使我們不把實惠來給他，他是決不能加惠於我們的。

我們姑且試想，倘使德國能用靈敏的外交政策；去完成德英聯盟，像一九〇四年日本的所爲，那麼，他影響於德國的，我們很難加以估計了。

也許世界大戰不致爆發了。

但是，這種政策竟沒有被採行。

然而，發展工業和世界貿易，擴張海權及殖民地，這些仍是可能的。如果要實行在歐洲開拓土地的政策，那惟有「聯英反抗」；反之，要想實行殖民地及世界貿易，那惟有「聯俄反英」。德國處在這種情形之下，應該當機立斷，決定和奧國絕交。而他們採用「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政策，勢必把他們前此所行使的武力政策，永遠的破壞了。當許多意外的威脅，不時從英國來的時候，他們也許還莫名其妙哩！最後，他們雖然決心建造一個艦隊，但是，他們的目的不在攻擊英國而在保障「世界和平」，以及「在經濟上和平的征服世界。」所以，他們不僅對於戰艦的噸位有想限制，就是艦位的噸數及其軍備，也是限制着最低的限度，藉以表明着他們的最後目的，還是在於「和平」。

「在經濟上和平征服世界」的要素，就是國家政策中唯一的主要原則，這實在是愚笨不過的事，然而，他們竟援引英國來證明實行這種原則的可能，這實在真是愚不可及了。我國的大學教授，他們講授歷史和理論所留下的害處，是沒法可以補救的，這適足證明讀歷史的人，祇讀而不能了解，真是叫做「食而不化」，這情形是隨處都是的。這種理論，就是在英國方面，也已遭受了駁斥；這是他們所不能不承認的。然而，在世界各國，他們預備以武力作經濟的後盾，而在征服之後，再以殘酷的手段，來爲之維持這種行爲的行使者，實在莫過於英國。英國向來的政策，不是用政治的勢力去獲得經濟的利益，即是再立刻使經濟的利益一變而爲政治的勢力嗎？所以

，如果說英國太怯懦，不敢爲了保障他們的經濟政策而去流血，那是完全錯誤的。英國沒有國民軍的事實，這也不足爲反證；因爲一國的主要點，並不在兵力的形式，而在善用一國所有勢力的意志和決心。英國時時具有他所必需的軍備。英國在戰爭時候，帶用一切必需的利器來獲取勝利。如在征兵有用的時候，英國便以征兵來應戰；但是，如果碰到必須有重大的犧牲，方能獲得勝利的時候，英國也就不惜用他全國最優秀的分子來應戰；他們在戰爭的決心和毅力，以及其百折不撓的作戰行爲，那是無所不具備其極的。

在德國，常把學校、刊物，以及滑稽報紙等，來做宣傳，宣傳着謬誤英國人的生活及其帝國，使德國人養成一種觀念，而陷入自欺的心理，竟使德國人對於英國人，加以輕視，這種謬誤的觀念，深深地印入人心，於是德國人的心目之中，大家都認爲英國人是一個狡詐而怯懦的商人。要知道一個龐大的英國，決不是徒靠詭譎卑劣的手段所能團結而維繫的，但是，我國的那些滑頭教授，他們從不曾了解到這一點。這種錯誤的觀念，有少數人對之糾正而予以警告，然而，對這少數警告的人，不是予以漠視，便是遭受抑制。當英德兩軍對壘於法蘭德斯（Flanders）的時候，我們武裝同志那種驚惶失措的狀態，我至今仍是歷歷在目的。交戰不到數日，國人便立刻覺悟到蘇格蘭人，確實不像國內滑稽報章及報告中所描的形態了。

我在這個時候，於是對宣傳及其最有效的方式加以注意了。

那般宣傳的人，對於前面所說的荒謬觀念，自然有着便利的地方，他們可以援引實例——不

管這例子的錯誤是怎樣——來證明「世界的經濟征服」是正當的。凡是英國人所能夠成功的，我們德國人自然也必能成功；因為我們的誠實——不像英國人那樣缺乏信義——又可認為是我們的特長。我們所希望的，就是把德國人的誠實，去使小國歸附而大國信賴。

三國聯盟的價值，就心理方面來說，那是毫不重要的事情，因為聯盟愈是着重在現狀的維持，那麼，他的維繫力也就愈弱。反之；假使同盟各國的勢力，如果愈能希望達到其確定而真實的擴張目的，那麼，這勢力也就愈強；因為這種同盟，他的力量不在於防禦方面，而在於進攻的緣故。

各處的人士，對於這一點，大家都能認識清楚的，唯獨那般所謂「專家」，竟是不知。當時做參謀本部上校的盧登都夫（Ludendorff），曾在一九一二年，他的備忘錄中，指出了這種弱點。自然，對於這事，「政治家」是不肯來承認他的價值和重要的。

一九一四年，歐洲的大戰，由奧地利間接爆發了，哈普斯堡皇室，因此也就不得不加入戰爭，這真是德國的大幸，要是這歐戰首先發難於德國，德意志勢必孤立而無援。

德奧間的關係，使德國喪失同盟能給予最好的希望。不但如此，就是德國和俄國，甚至德國和義大利的局勢，也反而日趨緊張了。羅馬用了他的情感來袒護德國，這已成爲普遍的現象，然而反奧的情緒，却又深入於各國人的心中，不時會爆發出來。

我在常常敘會的小團體中，明言並且深信我方和一個必遭毀滅的國家來簽訂不幸的盟約，這

種盟約，如果不及時取消，勢必使德國陷於崩潰。除非德國設法來及時解除。當大戰正十分劇烈，而又人心沸騰的時候，合理的思想已屬極不可能，就是居高位，以冷靜的頭腦來考慮事實的人，也不免為熱情所激盪，但我抱着這個信念，堅如金石，不敢有片刻的隨便。就是我在前線的時候，祇要碰到討論這個問題的時候，必定要發抒我的意見。我的意思，為日耳曼的民族計，對於盟約的取消，能夠愈快愈好，如果能夠因此而減少了敵人的數目。那麼把哈普斯堡王朝犧牲了，德國也並不損失。因為數百萬戴着鋼盔的勇士，他們的目的，就是在極救日耳曼的民族，並不是在維持一個衰老的王朝。

在歐洲之前的一個時期，至少有一部份的將士，對於這個正在進行的聯盟政策是否妥善，已經多少引起了一些懷疑。而德國的保守派方面，也常常警告當局，不要過於信賴聯盟；但是，終於忠言逆耳，把這警告置之不理，他們自己相信：他們已經走進了征服世界的路，成功是未可限量的，而且又不須作任何的犧牲。

在這時候，一般所謂「專家」的人，恰如哈梅（Hamel）地方的捕鼠者，誘導着無辜的民族直趨於滅亡，而那般「非專家」者，又復不聞不問，袖手旁觀，而毫無結果。

德國的專門技術，以及在工業上很快的進展，還有德國在貿易上也獲得了勝利，遂使他們忘却了一件事，就是不明白這情形的所以然，便是國家強盛，才能達至。但是許多人士，反進而宣佈其信念，以為國家的根本是一種經濟組織，所以國家的生命，實在是有賴於工商業的發達，必

須要用經濟學的法則去加以管理，俾使商業成爲國家生存的基礎，而且視這商業成爲一切條件中最健全和最自然的。

然而，國家對於任何具體的經濟概念，或是經濟發展，實在是毫不相關的。國家並不是一個商業的代表團，而是一個社會組織，它在某一時期，謀求實現各種經濟的目標；所以它是具有共同性質和情感的社會組織，藉以增進並保持這特殊的社會，以實現上天爲人類所指定的命運。這就是一個國家的意義和目的。

從空間方面來說，猶太國家是沒有界限的，但是，他的種族觀念是有限制的，所以這一民族，常在某一個國家之內自成一國。這一個國家，以「宗教」信仰作爲標榜，借此而獲得亞利安人對於一切宗教信仰的寬待，這實在是一種發明出來的最狹狹手段，摩西宗教的目的，便是一種用以保存猶太種族的一種教義。所以，凡是和該教發生關係的知識，不論其爲社會、政治、經濟，差不多完全納入這教義中去。

德國每在政治勢力有着進展的時候，商業也就有了起色；反之，如果商人們只知惟利是圖，在道德淪亡的時候，那麼，國家必定再度陷於崩潰，商業因此也跟着衰敗了。

假使我們自己來問一下自己，建設和維持國家的勢力在那裏？乾脆的說，就是犧牲個人去爲社會謀福利的能力和決心而已。這種美德，顯然是和經濟毫無關係的；因爲世人甘心爲理想而去犧牲是有的，但是甘心爲商業而去犧牲的，那就從來沒有聽到過。英吉利人在實現一種民族鬭爭

的理想時候，最能表現出他們心靈的過人地方。如此，我們才知道爲了麪包而每天奮鬥，但是英國人便爲「自由」而去奮鬥。他們所說的自由，並不是英國人本身的自由，而是爲那些弱小民族的自由。這些德國人大都以爲這是可恥的，因而便生出了憤怒。由此，就可以證明在大戰之前，德國的所謂「政略」者，其經率愚鈍是怎樣了。我們引國人，對於使民衆甘心爲奮鬥而肯犧牲的力量，可說是毫無所悉。

在一九一四年，德國人確實自信他們是爲了理想而戰爭，所以常可立於不敗之地；迨至他們後來有一天能明白的知道這戰爭是爲麪包而戰的時候，他們也自甘屈服而停止戰爭了。

然而，他們的聰明「政治家」，對於民情的轉變，也會表示着十分的驚異。在戰前，他們以爲靠了貿易和殖民地政策的和平手段，便可以操縱世界，或是進而征服世界，這種信仰，已經成爲幻想；這很可以見到一個國家所賴以建設，而維持的真實美德，以及其他一切顯明易見的意志力，和建樹事業的決心，大都已經喪失無餘了。根據自然法則而直接產生的結果，便是這次世界大戰以及和大戰而來的各種影響。

我現在第一次把上述的諸問題，就我對於一九一二年——一四年德國聯盟政策所抱的見解和立場來加以評論，我覺得這一個謎團的解決，是由某一勢力在爲之作轉移的，而這勢力，便是我在維也納的時候，曾由另一觀點所認識的，便是馬克斯主義的理論和世界觀，以及它的組織效力。我在這時候，就開始加以考慮，究竟要採取那一種手段，才能克服這種世界的流行病。我曾

經把畢士麥特種立法的目的，奮鬥和成功加以研究。這種研究，使我的自信力慢慢地日趨堅定，因此，我對於這些問題的意見，便不想有所變更了。然而，我對馬克斯主義和猶太教的關係，也曾加以深切的研究。

一九一三年——一四年，我曾經把這種信念公之於各團體——其中有一部分人士，現在還是忠心於民族社會主義（National Socialist）運動的。我確信要使日耳曼民族的前途發展，必須要把馬克斯主義徹底剷除才行。

德國民族內部的衰微，並不是始於現在，不過因為對於危害他們生存的禍首，他們好像是對於人身上的病源，不會深加瞭解；他們雖然也會對這病源，施以治療，但是因為常常把病徵誤認為病源。德人因為大都不能了解，或是不想了解這件事，所以若對馬克斯主義的鬭爭，就成為等於庸醫把藥物亂投了。

第5章 世界大戰

當我在年青氣盛的時候，最使我憂鬱和不快的，便是在這沒落的時代，受着萬民崇拜的人物，祇有商人和國家的官吏而已。政潮像是已經波平浪靜，世界的前途，像是已經進入於「國際的和平競爭」了。換句話說：就是彼此間互相用欺詐的手段，而避免着一切激烈的方法。各國的政府，開始注意於互相傾軋的企業，以及互相奪取主顧和契約，他們不惜用千方百計，大家互相利用，於是一片喧囂的聲音，便充滿於全世界了。這種發展，不但繼續進行而永無休止，並且好像已經得到了世界一致的贊許，將一舉而把世界改造成一個極大的貨棧似的。在這宏大的貨棧的通廓中，凡是最狹獠的奸商，和那最怯懦的職員，都有他們半身的肖像以垂永久。

爲什麼我不早百年而生？不生於解放戰爭（War of Liberation）的前後呢？因爲在當時的人，除了從事於「商業」之外，還有一些相當的價值可言。

當法蘭西斯·斐迪南大公被刺的消息，傳到了慕尼黑的時候（那時我正在室內，對於這事變的情節，僅有一些模糊的聽聞），起初我以爲這次的暗殺事件，或許是德國的學生所做的。因爲他們深恨奧太子有意偏袒斯拉夫人，要借此來剷除日耳曼民族的仇敵緣故。事變的結果怎樣呢？那我可以立刻想像得到，就是再加重對於日耳曼人的虐待而已。當時還可以把這種虐待的理由公然向全世界解釋，而求得全世界的諒解呢！不久，知道了兇手的姓名，係是一個塞爾維亞人，我

乃對於這不可測的命運報復，感覺到悚然而懼了。

斯拉夫人的摯友，在斯拉夫民族瘋狂者的槍下，已經做了犧牲者。

對於維也納政府所發出的最後通牒形式和內容，在現在，世人還是有着許多的責難，這是殊欠公允的。世界上任何的國家，處在同樣的境地，沒有不是這樣來舉動一下的。在奧地利的南方，有一個不共戴天的仇敵，時時對奧國的皇室，放出了挑釁的態度，待時機一到，必須要使這奧地利帝國傾覆而後快。一般人士的心目中，惟恐老皇一死，這件慘禍必要實現，這是很合理的。而且奧地利帝國或許不會有真實抵抗的能力。近年來奧國的安危。完全繫之於老皇法蘭西斯。約瑟（Francis Joseph）的身上，所以由民衆的眼光來觀察，老皇的死，實等於國家自身的覆滅。

世人大都以爲這次大戰，或許是可以避免的，所以把戰禍的發生歸咎於維也納政府，這實在不是公平的論調。因爲這次的戰爭終不可避免，至多延緩了一兩年而已，所恨的就是德奧兩國的外交政策，他們對於無可避免的一天，還是常常想多方延緩，迫到最後的關頭，被迫而不得不戰，那時的時機已屬不利了。如果想勉力去維持和平，那麼，戰爭一起，時機更將陷於不利，這是我們可以斷言的。

已經有多少年了，德國的社會民主黨，用了最卑鄙的手段，鼓動着德俄的開戰，而黨中央因爲宗教的緣故，所以對於國家大計，大抵以奧匈帝國爲轉移。現在，大錯已經鑄成，所以結果也

不得不忍受。禍變的來臨，勢在必然，這是無法可以避免的。德國政府的錯誤，就是在於祇知道維持世界的和平，因此坐失開戰的良機，而且再為維持世界和平的聯盟所牽制，最後終於成為世界協約國的犧牲品了。名義上雖稱為世界協約國，實際是反對保持世界和平而決心造成大亂的。

一九一四年的戰爭，並不是強迫民衆去參加的，實在是全國上下所切望的，國人急急地要使全世界的不安告一個段落。這就是德國二百萬以上的成人和青年，所以欣然去從軍，甘心作壯烈的爭鬥，而且在國旗之下，甘願灑出最後的一滴血，來捍衛自己的祖國。

這一個爭自由的戰爭爆發了，規模之大，實在是空前未有的。

在慕尼黑方面剛剛聽到這暗殺的消息，我們腦海裏立即發生了兩種感想；一是戰爭無法避免；二是哈普斯堡皇朝必須維持聯盟。因為我所最怕的，便是德國爲了聯盟的緣故，也許會有一天被捲入衝突的漩渦，這衝突的直接原因，也許並不在奧國，奧國因爲內部的政治關係，竟無法來實行援助同盟國的充分決心。對於戰爭，不論這個老大的帝國願不願意，然而已經到了非戰不可的時候了。

這次衝突的態度，我個人對之十分明白，我以為這個衝突，並不是奧地利爲懲罰塞爾維亞而戰，實在是德意志爲著生存而戰，換句話說，就是日耳曼民族爲了它的生存死亡和自由前途而戰。德國人必須步着畢士麥的後塵，現在的少年德國，對於過去的祖先，他們把英雄的血，在威森堡（Weissen burg）到西丹（Sedan），及巴黎的戰爭中所獲得的勝利，仍舊應該努力保持着。倘使這戰爭而獲得勝利的話，那我日耳曼人能夠靠了自己的勢力，而再在列強間佔有一個

席位，因為日耳曼帝國要不是節衣縮食來一戰，那是決不能做和平的保障者的。

八月三日，我就呈請國王路特威三世（Ludwig III）准許我服役於波維利亞的軍隊中。那時候內閣的國務，非常忙碌，然而我的呈論，第二天就批准了，這是十分快慰的。

我平生最大而最難忘的時期，便在這時期開始了，這是和其他的德國人一樣的。過去的一切事變，如果和這次激烈的鬭爭相較，那就微不足道了。回首到當年我民族勇猛戰爭最初的幾星期，我不禁悲喜交集，我深為仁慈的神，能夠使我來參加這次的戰役為幸。

戰爭年復一年的繼續着，戰爭的陰雲，也就一變而為恐怖了。大家愛國的熱忱慢慢地冷卻下來，光榮的幻想已經沉沒在死亡的苦痛之中。這時，每一個人的心中，大都有「自存」和「效忠」的兩件事在衝突。一九一五——一六冬季，這種衝突，在我已成爲過去。我的意志終於獲得了最後的勝利。起初，我在衝鋒陷陣的時候，常常與高采烈呼喚歡笑，現在一變而為沈靜堅決了；一直到戰爭結束的時候我都是這樣。

青年的志願兵，已經變成老練的戰士。這種變化，整個的軍隊都是一樣的；因為我軍經過長星的戰鬭，已經老練堅強，凡是在這次戰役中，不能抵抗的，已經早被淘汰了。

到了這時候，軍隊的優劣，始能加以判斷。在兩三年一仗接一仗的不斷戰爭，我們以寡敵衆，以弱敵強，備嘗着饑渴勞頓，——要估量我軍的優點，就在這個時候。

雖然在幾千年之後，談起勇敢的英雄主義，就不能不念及大戰中的德國軍隊。德國的灰色鋼

盔，不畏縮，不規避，將成爲歷史上永垂不朽的紀念品。我日耳曼人苟有一天存在，當會想念到這些軍人，曾爲國家的健兒。

在那個時候，我對於政治並不注意，可是有關於影響全民族，尤其是涉及我們軍人的事，那就不能不表示我的意見了。

馬克斯主義的被人認爲正確，這些，我對之十分憤慨。馬克斯主義的最後目的，是在毀滅一切不是猶太民族的國家，然而，到了一九一四年七月，馬克斯主義多方誘惑的德國勢動階級，居然覺悟了，他們效勞於祖國的風起雲湧，這正是馬克斯主義痛心疾首的時候。在幾天之內，卑劣的國家叛徒，他們欺騙民族的烟幕，都已烟消霧散；而那些猶太領袖，立刻感覺到孤立無援，六十年來流毒人羣的愚妄痕跡，完全化爲烏有了。這實在是欺詐德國勞工者最不利的时候。這些叛徒的領袖，一旦察覺到他們處境的危險，他們也立刻遮掩了他們虛偽的醜形，居然老着面皮，一同高喊民族抵抗的口號了。

這正是對於毒害我國民族整個猶太團體大加攻擊的時候了，德國的工人既重新發現復興民族的路，政府應該在這時候絲毫不加寬假，急極地想法剷除這反抗民族主義的鼓吹者。優秀分子既已到前線捐軀去了，國人至少也應該在後方把國賊肅清才對。可是德皇並不如此，反而親給那些叛徒予以援手，並且給他們予以保護，使他們繼續維持着他們的組織。

每一種世界觀（Weltanschauung），不論其性質是政治的，或是宗教的，（兩者的界限極

不容易說的。）都在其本身理論的積極建樹，而在對方理論的消極摧毀。換一句話說，就是世界觀的鬭爭，在進攻而不在退守。所以目的的確定，便是有利於理論的本身，因為這種目的，便是思想的勝利，而攻破對方理論的消極目的。什麼時候可以達到，那就不易說了。所以，凡是一種世界觀，其計劃愈是明白確定，那麼在進攻之中也必強而有力；因為最後的勝利，是在進攻而不在退守了。

用武力來抵制的世界觀，如果不採取攻勢以擁護一種新理論，結果是必定遭受失敗的。祇有兩種世界觀在同一的條件下鬭爭的時候，始能用堅決嚴酷的武力來決定勝負，而使勝利屬於武力的擁護的一方。過去，反馬克斯主義運動的失敗，完全是由於這一個緣故。畢士麥關於社會主義的立法失敗，也是由於這一個緣故。因為這種措施，實在缺乏一種新世界觀的基礎，所以無法樹立起鬭爭的目的來。祇有那些素稱為高明的達官要人，他們才會幻想着用「國家權威」或「移序和安寧，」就足以激勵人們甘心去為鬭爭而犧牲。

在一九一四年的時候，反社會民主政治的鬭爭，已經是十分的明顯；但是，這種鬭爭，因為缺乏實際的代替物，所以究竟能夠支持到什麼時候，殊難豫定，因為這事實在有嚴重的缺點存在。

在大戰之前，我就有這種意思，所以當時不能決定去參加任何的黨派。後來，戰事延續，我的信念也就愈強，因為當時不以議會為限的運動還沒有，所以要想從事反社會民主黨的徹底鬭爭

，顯然是不可能的。

我常把這種意見，向知己的朋友談及。我在將來要做一個活動政治家的意念，也是在這時候發生的。我所以屢屢向少數的知己朋友說及，就是因戰後我除了固有事業之外，再願意作一個演說家的緣故。

第6章 戰爭宣傳

當我注意於政治上一切事件的時候，常使我感到極大的興趣的，便是宣傳事業。依我看來馬克斯社會主義黨，他們所最擅長，而又能充分運用的工具，就是宣傳，我立刻覺悟到如果把宣傳運用得法，那確也是一種正當的技術。這種技術，實在是在那般中產階級各黨所不知道的。祇有基督敎社會主義運動（尤以呂格勒時代爲然），用一種賞鑑藝術性質來運用這種工具，而且他們大部分的成功，實在是得力於此。

我們有過什麼宣傳嗎？

唉！我僅能回答一句：「沒有」。我們對於這方面一切努力，一開始便欠妥，而且方針錯誤，因之不但毫無成故，並且有時還反足爲害。我們如果對德國的戰爭宣傳，作一個有系統的考察，就可以確信他外表的虛弱，與內在的謬誤了。

宣傳究竟是手段還是目的？這一個基本問題，甚至至於我們還不能弄得清楚。

宣傳是一種手段，而且必須根據其所宣傳的目的而評判的。這一種手段，必須要妥爲規劃，使目的獲得適當的效果。目的的重要，既要看一般的需要而變動，所以宣傳的要素，也就隨之而變動，以期和目的相調和，這是十分顯然的。大戰正當十分緊張的時候，我們所奮鬥的目的，便是人類想像中極尊貴而又極迫切的。這便是我民族的自由和獨立，以及將來生存的保障和民族的

光榮。

至於說到人道問題，毛奇（Moltke）曾經說過：「戰爭，最要緊的，便是在使戰事早些結束；而最能達到這種目的的，便是最殘酷的方法。」

在戰爭中的宣傳，便是達到目的的一種手段，而這一次的大戰，就是日耳曼民族爲了求生存而所作的奮鬥；所以宣傳僅能根據有利於這個目的的原則。就是最殘酷的武器，如果使用可以早獲得勝利，那麼，對於人類的原則，仍是不悖的。

我們對於這種生死的戰鬪中，對於戰爭宣傳的問題，所採取的態度，不過是如此而已。

如果那些居高位的人，能夠明白上述各點，對於這種武器的方式和運用，當然不致躊躇不決，莫衷一是；因爲宣傳不過爲一種武器而已。——若是這種武器落在一個善用這種武器人的手中，這武器真是一種可怕的武器呢！

一切的宣傳，都應該求其通俗，並且還須在宣傳的人羣中，顧到知識最低人的接受能力。所以，我們要使接受宣傳的人數愈多，那麼宣傳的知識標準，也就愈宜降低，要是我們宣傳的目的，是在使全國都受到影響——例如要使戰事實徹到底的宣傳——就應當極端的當心，必須要避免陳義的過高。

羣衆對於宣傳的接受力，極爲有限，而且理解力也很薄弱；他們又是大都健忘的。這樣，一切有效的宣傳，必須限於數點，而用標語的形引來宣傳，務期每個人都能知道任何標語的命意。

要是牽涉過多，而且不顧此項的原則，那麼宣傳的效力，反而易於渙散；因為人民對於所宣傳的事，實在不能去融會或是記憶的緣故。而且它本身的力量，最後也因微弱而消失了。

比方，把敵人盡量給以滑稽的描寫，像德奧滑稽報紙所用的一種宣傳方法，實在是根本錯誤的。因為我軍有一天實行和敵人肉搏的時候，那麼他們所獲得的印象，必定完全相反，因此自己會遭受到一種慘報；德國的軍士，觀描到敵人抵抗力的時候，他們覺悟到被那些虛構事實的人所欺騙了，這不特不能增強，而且不能保持其敵愾同仇的心理，結果是德國的士兵，就在這錯誤的宣傳之下慘敗了。

反過來，英美各國，對於戰爭的宣傳，在心理上說是正確的。他們各向其人民暴露德國人是一個野蠻民族，而且使每一個士兵，對於戰爭的恐怖，早已具有準備，所以臨陣而不會沮喪，他們在前線所碰到的最可怕武器，不過是證明了他們所聽到的不錯而已，因而益信他們本國政府的言論是正確的，同時也增加其對於敵人的憤恨。

他們的宣傳是這樣，所以英國的士兵，對於從本國所傳到的消息，從不感覺到虛妄，而德國的士兵，竟把國內的消息，看作純屬虛妄而不再信仰了。

所以當討論到戰爭發生的責任問題的時候，說德國對於戰禍的爆發，也應該負一部分責任，這實在是根本錯察的，而正當的辦法，就是應該把大戰責任，完全加到敵人的身上去；即使和事實不大符合，也要把它當做真實的情形來看待。因為，敵我兩方違反行動的界緒，並不是一般羣

衆所能辨別的。

大多數的國民，他們的性質和見解，尤其女性；他們的思想和行動，受到情感的支配者，實多於受到理性的支配者。但是，這種情感，並不複雜，而且是很單純的。他們的變化不多：不是積極便是消極，不是愛便是恨，不是真理便是謊言，永遠不會是非各半的。英國的宣傳，便是善於利用這種事實。所以在英國，絕沒有模稜兩可，而引人誤會的措辭。

英國對於羣衆情感的幼稚，已經能有徹底的瞭解了，所以他們對於戰爭恐怖的宣傳，十分投合戰事情形的，而且巧妙毒辣，使前線士兵，就是在慘敗的時候，也仍能保持着他們作戰的勇氣；再宣傳說德國人是大戰的唯一戎首，這種卑污無恥的謊語，以及他們宣傳的方法，實在早已計及到羣衆天賦的情感和極端性，所以終能夠獲得了國民的信任。

方法的改變，不應該去改變宣傳所要實現的要點，它的目的，應始終如一。標語固不妨從多方面來加以解釋，但是無論怎樣解釋，應該和標準的本意一致。要使宣傳的功效，得到切實一致，這是唯一的方法。

不論是商業上或是政治上的廣告，其能獲得成功，都是因為具有持久性和一致性的原由。敵人的宣傳方法，便是一個很好的例證。敵人的宣傳，限於很少的幾點，而以民衆爲惟一的對象，並且還堅持而不懈的進行着。在大戰的全期之中，他都應用其最初認爲正確的基本觀念和表現方式，而絲毫未有更改。起初看來，好像是強詞奪理，謬妄無稽；繼接着是令人有不快之感，結果

是令人深信不疑。四年半的大戰終止了，德國爆發了革命，而革命的口號，實在是發源於敵人的戰爭宣傳。

還有一件事，是英國人所明白的，就是這種鬭智的工具，如能多多利用，才能獲得成功，苟若獲得了成功，那便能獲得厚大的報酬。

宣傳，在他們看來，實在是一種無上的武器，可是在我們看來，這實在是失意政客謀生的末路，以及無名英雄棲身的微職。

總之！我們的宣傳，成效簡直是等於零。

第7章 革命

一九一五年的夏天，敵人的傳單，開始由空中而傳入我們手中，雖然它的措詞各不相同，但是它的內容，差不多是千篇一律，不外說德國的困苦有增無已，大戰將永無休止的時候，而勝利的希望則日漸減少，國內的人民，大家都切望和平，但是「軍國主義」和凱薩（Kaiser）（指德皇）則不允許，全世界對於這件事十分明瞭的，並不是爲反對日耳曼民族而戰，純粹是爲反抗那唯一負責的德皇一人而戰；所以如果不把人類和平的蟲賊除去，大戰是不會休止的。大戰能夠終了，「普魯士軍國主義」能夠一旦消滅，世界和平是決定可能的，和平實現之後，那麼，自由的民主國家，也必會歡迎德國加入永久世界和平的聯盟中的。

這種宣傳之中，有一點應該加以注意的，就是在前線的各部，凡是有巴維利亞士兵的地方，便對普魯士盡情的加以攻擊，不單說普魯士是這次大戰的罪魁，而且說協約國中，並沒有對巴維利亞有一些仇恨，但是巴維利亞如果始終給普魯士軍國主義盡力，那麼協約國將要愛莫能助了。這種宣傳，在一九一五年就開始有了一些效力，軍隊中反對普魯士的情緒，慢慢地增高了起來，——但是當局不會來設法加以阻止。

到了一九一六年，前線兵士們所接到的家信，大都申訴著不平；顯然的，已經對於士兵生出了一種直接影響，這時已經不需勞動敵人再用傳單向前線去散播了。德國婦女所寫的愚蠢而毫無

見識的家書，後來竟葬送了幾十萬人的生命在前線。

那時已經發現了不良的現象，前線的士兵，大家都咀咒憤懣，怨聲載道；——這種怨聲有時候也很合理的。在前線的士兵，他們飢寒交迫；他們的家人；也在國內日坐愁城而別人則飽暖淫樂，甚至在火線上的士兵，他們也有這種不應有的現象。

在這時候，危機四伏，大有一觸即發之勢，但是，這不過是「國內」的事。大多數的士兵。雖然在怨恨不平，但是，轉瞬之間，他們又不聲不響地盡忠他們的職守。好像是十分自然的。有一部分軍隊，雖然心裏有著無限的苦悶，可是對於必須防守的戰壕，他們仍是死守不退，好像德國的命運，完全維繫在這幾百米戰壕上的樣子。從這地方，我們可以見到前線戰士們，他們仍舊不失是光榮的英雄。

我在一九一六年十月七日受了傷，於是欣然離開前線，乘坐傷兵車返回德國，我離家已經有兩年了，處在這個亂世，真是有些度日如年。我進入了柏林附近的一所醫院。環境真是變遷得分惡劣！

唉！從另外方面看起來，這個世界確是一個新世界。在前線的軍隊中的精神，這裏根本是沒有的。我竟第一次碰到在前線所沒有聽聞的事，竟有人自己把懦弱向人誇耀。

我的傷勢，經醫治而能夠行動了，我得到許可到柏林去走動一下。一種困苦的慘狀，觸目皆是。全城幾百萬人民，大家都站立在飢餓線上，怨憤異常。有幾家是士兵所到過的，他們的語調

，竟然和醫院中的語調完全一樣。人們每以爲那些士兵們，好像專門尋覓這種地方發洩他們胸中的積怨似的。

在慕尼黑黑的情形，當我恢復了健康，而出院的時候，就被派到後備隊中去，我重到這個城市，幾乎有些不認識了——不論在什麼地方，充滿著憤怨不平 and 咀咒。從前線歸來的士兵，因爲在前線服役的緣故，所以每有種種的特性，這是爲後方的老年軍官所不能了解的；但是，新從前方歸來的軍官，就能明白了。人民對於這類軍官的尊敬，和對於後方軍官的尊敬，是絕然不同的。除此以外，一般的精神，却是十分地消沉。凡是逃避責任的人，大家都視爲識時務著爲俊傑，而忠於職守的人，反目爲庸碌的獸子。在官廳之中，充滿着猶太人。差不多每一個書記，都是猶太人，而每一個猶太人，也都是書記。使我十分驚異，這種獨得天寵的人民，何以這裏特別多，而在前線者反而特別少？

。在商界方面，那是更厲害了，猶太民族，實已成爲「少不了」的分子。

一九一七年，兵工廠的工人罷工，不能產生出所希望的結果來，而使前線感受到軍器缺乏的恐慌。這種罷工的目的，本來是在使軍火缺乏，但是，因爲它的本身失敗得太快了，所以還不能使軍隊陷入失敗中去。然而這已經是夠使精神上受到一個巨大而可恥的影響了。

第一，倘使後方的民族，不想得到勝利，那麼，前線的軍隊，爲了什麼而去作戰？戰士們受這樣重大的犧牲和苦難，到底是爲了誰呢？士兵們爲了勝利而戰，後方的民衆，竟用罷工來加以

反對，這是什麼道理？

第二，這件罷工的事，對於敵人的影響又將怎樣？

一九一七——一八年的冬天，協約國已被愁雲慘霧所籠罩。因為，他們所希望於俄羅斯的一切，現在已經得到了失望。俄國曾經爲了協約國的共同利益，不惜作最大的流血犧牲，現在已是精疲力竭，只好讓敵人來加以無情的宰割了。他們被盲目的信仰所支配了的士兵，現在大都垂頭喪氣，大家深怕明春的來到，因為他們鑑於德國僅有一部分兵士防守著西線的時候，他們尚且不能把這條戰線攻破，現在德國厚集勇士，用全力來準備向西線進攻的時候，他們怎麼還能獲得勝利呢？

德軍各師正當奉到最後總攻命令的時候，總罷工竟也在德國爆發了。這一個舉動，起初是舉世驚愕的，後來敵方攫獲了這一個最後的機會，重作宣傳，於是協約國渙散的軍心，因此重新振作起來，以爲今後是可以重操勝算的。對於未來事態的恐怖和失望，竟一轉而爲堅決和自信了。英法美諸國的報紙，便開始把這種信念散佈在讀者的心中；同時，又用了極巧妙的宣傳，來鼓動前線的軍隊。

「德國將要革命了！協約國必定能夠獲得勝利！」此種口號，是使正在動搖中的英法士兵，復得立定脚跟的最佳一貼興奮劑。

這些，都是兵工廠罷工的結果。這罷工恢復了敵國的人民對於勝利的希望，並且再驅散了協

約國前線士兵之頑爽精神。結果使幾萬德國士兵犧牲了他們的血肉。但是，鼓動這次最卑鄙無恥的罷工人物，便是希望乘德國革命的機會，而去獨得政府中最高位置的人。

我真幸運，獲得了參加最初兩次，以及最後一次的進攻。最後一次的進攻，使我終身獲得了一個最驚人的印象，可驚的，是在最後的戰爭，也像一九一四年時一樣的，由守勢而轉為進攻。

一九一八年的夏天，前線到處都是異常的悶熱，而國內則爭論紛起。所爭的究屬什麼事？各部隊之中，也有著很多的謠言。好像是說大戰已經毫無希望，祇有馱子才作我方勝利的好夢。要繼續戰爭者，並不是日耳曼的民族，而是資本家和皇室。這就是從國內傳來，而且為前線所討論的消息。

前線的士兵，對於這個革命的消息，起初也沒有什麼反應。「普及選舉權」對於我們有些什麼關係？我四年來的苦戰，究竟是為了這一點嗎？

前線的士兵，素來是極穩定的，對於哀伯特（Ebert）施德曼（Scheidemann）巴特（Bath）李波克尼希特（Liebknecht）等人的新戰爭目的，完全置之不理。我們百思不解的，便是那些避戰的人，為什麼竟敢攪權秉政。

我個人的政治觀念，很早已確定。我深惡而痛絕那些賣國欺民的黨棍，我早已洞悉這般黨徒，他們並不把民族的福利作前提，而把飽入私囊為唯一的目的。實在，他們為謀取他們的私利計，不惜把整個的民族來犧牲，遇到必要的時候，即使德國滅亡了，也是不妨的。我恨不得能夠親

自見到這些人，一個個縊死在我的面前。爲了要顧及他們的願望，就不妨去犧牲勞動階級的利益，來充實那竊盜的囊橐，我們如果不要德國滅亡。那就不能坐視著他們的枉所欲爲。軍隊中多數士兵懷抱的思想，仍然是和我相同的。這一年的八九兩月。雖然敵方進攻猛烈，並不能和我方在過去防禦的勇猛相比較，然而，衰頹的現象，竟是一天地厲害一天。比較起來，索美（Somme）和法蘭德斯（Flanders）之戰，已經成爲過去的歷史，簡直是一種可怕的回憶吧了。

九月末，我軍第三次到達我們當青年義勇團的時候所攻克的各地。那真是往事已經不堪回首了。

一九一八年的秋天，軍心已經大變；大家常把政治問題來加以討論。從國內傳來的消息在各地的軍隊中，開始發生了影響。新徵來的青年軍，全部受到了麻醉，——因爲他們是從國內一直來的緣故。

在十月十三日的晚上，英國開始向伊伯爾（Ypres）前方南線投放毒瓦斯彈。十月十三日的晚上，我們尚在威麥克（Wervick）南的小山上，繼續受著轟擊，時猛時緩，終夜不斷。將近夜半的時候，我隊支持不住了，倒地陣亡的已有不少人。到了清晨，我就感覺到一種苦痛，每隔十五分鐘，痛勢愈加厲害，在七點多鐘的時候，我的兩眼感覺到熱得有些焦灼，因此後退報告一切，而我的參戰，也以這次爲最後一次。幾小時之後，我的兩眼，刺痛得像火焚燒，一些東西也不能見到了，於是我就被送到波美拉尼亞（Pomerania）的帕士瓦爾克（Pasewalk）的地

方醫院中，我就在該地遇見了革命。

壞消息不斷地由海軍方面傳來，說海軍也將醞釀起事，但是，我以為這種謠言，不過是少數神經過敏青年的猜測，未必是一種影響多數人的不幸事件。在醫院中，每個人都在談論戰事的結束，並且還希望早日見到實現，但是，沒有一個人以為戰事立刻可以結束。在這時候，我還不能閱讀報紙！

到了十一月，羣情更是激昂，忽然有一天大禍降臨了，事先，我們是毫無所知的。海員們乘坐運貨車前來，他們鼓動著民衆奮起革命，在這個為我民族求「自由、優美、和尊嚴」的鬭爭之中，以少數的猶太青年做領袖，而他們也不曾有過一人到過前線去作戰的。

此後的幾天，是我有生以來最不幸的時期。一切的謠言，愈說愈確了，我向來認為這是地方事件的。現在已經顯然是一個全國的革命了。此外，再由前線傳來的，更有不幸的謠言，說他們都願投降了。呵，——這事果真能夠實現嗎？

十一月十日，有一位老牧師，來到醫院作簡短的講演，我們因此而知道了一切。當時我也在場，我深深地受到了感動。這位良善的老牧師說：霍亨佐倫皇室（House of Hohenzollern）已不得再戴德國的皇冠——我們的祖國，已經改為共和國了——說的時候好像有些在發抖。

於是，一切都成為泡影了。我們所有的一切犧牲和困苦，完全等於虛擲，幾個月來的忍飢耐渴，完全等於虛擲，我們出生入死，所費的時光，完全等於虛擲，兩百萬人的頭顱，也完全等於

虛擲了！

我們的國家怎樣呢？

但是，我們所應忍受的犧牲，就到此而完結嗎？過去的德意志，不值得我們懷念嗎？德意志對於固有的歷史，就無任何的責任嗎？我們配享德意志的過去光榮嗎？這種舉動，我們對於後世的子孫，又將用什麼來自解呢？

我輩人真是卑劣的罪人！

當時我愈想要了解這種驚人的事變，愈覺得羞忿交集。我兩眼所受的痛苦，和這種禍難來互相比較那又算得什麼呢？

此後我日夜感到不安。我知道一切都化為烏有了。深夜沉思，我對這事件的主動人就切齒痛恨了。

在德皇之中，對馬克斯主義的領袖，表示親善的，以威廉二世為第一人，他從不知道他們就是毫無信義的愚棍，因為當他們和德皇握手親善的時候，另一隻手已經在暗中採取利刃了！

對於猶太人是沒有什麼條件可講的，決定誓不兩立。
我決心要做一個政治家。

第8章 政治生活的開始

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末，我回到慕尼黑，從新再進我那一團的後備隊，但是，該隊被「軍人會議」（Soldiers Council）所把持著。我對這一點深為不滿，所以決意立刻脫離。我和戰爭時的一位忠實同志史密特·愛倫斯特（Schmiedt Ernst）同赴特老恩斯坦因（Traunstein）去居住，在那裏一直至軍隊解散。一九一九年三月，我們再返回慕尼黑。

在當時的情況，實在不大好，革命擴大，已有不可遏止的情勢。愛士諾（Eisner）的死，恰好是如快這一個情勢的進展，最後竟造成由會議操縱的形勢，這或者可以稱為猶太人過度期間的統治，更為恰當些，這便是首倡革命者的最初目的。在這期間，我的腦海中的計劃有了不少。當新革命在進行的時候，我最初的行動，引起了中央會議（Central Council）對我發生惡感。一九一九年三月二十七日清晨，我差一點兒就遭被捕，那三位來逮捕我的青年，當我舉槍相向的時候，他們勇氣頓失，驚惶地循著舊路而跑了。

在慕尼黑解嚴以後幾天，我便奉命出席於委員會，調查第二步兵團革命事變的經過。這是我參加近乎純粹政治的第一次。

過了幾星期之後，我又奉命出席於為國防軍官佐而設的特別班。該班的根本目的，就是在授軍人以一定的主義，使他們去指導一國國民的思想。這特別班對於我個人的價值，便是使我因此

認識和我思想相同的一部分同志，我們可以互相暢論當時的局勢。我們都確信德國的崩潰，已經迫在眉睫。他們十一月的罪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實在不能救出德國的危亡。就是所謂「資產階級國民黨」，雖然他們的用意很好，但也不能補救既成的創傷。

我們中有少數的人，就討論新黨的組織了。我們所擬的基本原則，和後來所實現的德國工人黨（German Workers Party）的原則相同。這一個新運動的名稱，一開始便就表示深入民間的可能性；因為如果缺乏了這個特質，那全部的工作，似乎都沒有什麼意義，徒然多此一舉了。因此，我們便決計定名為「社會革命黨」（Social Revolutionary Party）因為這個新建的社會觀念，實在是含有革命意義的緣故。

再者，尚有著一層更深的理由。我在早年，便致力於經濟問題的研究，這使我對於社會問題所發生的思想多所限制。這研究的範圍，等到後來我研究了德國的聯盟政策，始行擴大。德國所以採取這種聯盟政策的緣故，泰半由於把國內的經濟估計錯誤，以及對於將來德國食物供給的基本原則不明白所致的。這種理想，是根據了一種假定，就是把資本純粹作為勞動的產物，而且和勞動同為改正一切足以促進或限制人類活動的因素基礎。這就是資本對於民族的意義，因為資本的自身，完全依賴於國家（state）——就是民族（nation）——的偉大、自由和勢力，所以兩者的聯合，必定要使國家和民族，因了資本的維持和增加，而向前進展。資本和自由獨立的國家，有著十分深切的相互關係。所以資本勢必把民族的自由和強大做目的。

因此，國家對於資本的責任是十分簡單而明瞭的。國家祇要注意著使資本供國家使用，而不要使資本操縱著民族，那就好了。國家既堅持著這種態度，那麼便可以定下兩個目的來：一方面維持著有效率的國民獨立經濟；另一方面，是再維持工人的社會福利。

我對於資本，純由勞動所產生的，和純由投機而獲得的，以前是未能明白分別。對這問題，我不知道應該怎樣應付。這個問題，就是在當時由上述的特別班講師中的一人來加以極詳盡的討論——這人就是古特里德·費德（Gottfried Feder）。

在我第一次聽了費德的演講以後，腦海中立刻發生了一種觀念，就是我自己已經發現我們組織新黨的一個重要原則。

我立刻知道了這個問題，在理論上是具有真理的，對於德國前途的關係是很大的。票據交易所的資本，和國民經濟的絕對劃分，使我們對於德國財政行政的國際化，有著可能的抗爭性；同時又不致因為和資本鬭爭的緣故，而危及民族獨立生存的原則。我對德意志發展的途徑，認識得十分清楚，所以我們最堅苦的奮鬥，並不在對付敵國，而在對付國際資本主義。費德的講演，實在給我將來奮鬥的一種絕好口號。

從這事件的後來發展，來加以觀察，也就可以證明我們當時的見解，是怎樣的正確了。我們不再為我國資產階級的狡黠政客所嘲弄了。到了現在，要是他們並不說謊的話，那他們也應該知道國際資本不單是煽動大戰的最有力者；就是在大戰終止了的現在，它仍在極力使和平的世界，

不惜變成地獄。

我個人以及其他一切真正的民族社會黨人，僅有一個信條，就是民族和祖國。

我們所以必須奮鬥的原因，就是在保障我種族的繁殖，我國的人民及其子孫的教養，血統的純潔，祖國的自由和獨立，並且使我民族能夠完成上帝所付給我們的使命。

我又重新加以研究猶太人馬克斯學說和目的，到了現在，我才了解資本論及社會民主主義，反對國民經濟的鬭爭；並且明白了他的目的，乃是要準備一切，使金融業和交易所的眞正國際資本，能夠來統制德國。

在另一方面，這個特別班的課程，也曾產生出巨大的結果。有一天，我宣佈我有演說的意思。同班中有一人要替猶太人作爭辯，因此，他就作了長篇的辯論來袒護猶太人。這就引起了我的反駁。我的主張，當時在場的人中，贊成者竟佔大多數，這結果在幾天之後，我便奉命以「教官」名義，去加入慕尼黑的軍團。

在當時，軍隊的紀待不大好，這是因爲軍人會議時代的遺毒還存在。軍隊因此便受到了影響。要使「同意」的服從——這句妙語是他們形容柯爾特·愛士納（Kurt Eisner）下的豬圈的——變成整飭的軍紀，如果不是小心翼翼，慢慢地做著是不會有效的。而要使軍隊能夠自覺他是民族和祖國的一分子，也是同樣的。我的新活動，就在這裏。我用了充分的愛國熱情，和聰敏的感覺，來開始活動。我可以說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功；聽我的演說而尊崇祖國，和德國民族的同志

，竟不知有了多少人，我使德軍「民族化」而且使一般的紀律加嚴。再者，我結識軍隊中和我同情的同志很多，後來，這些同志，就和我聯合，因此而奠定了新運動的基礎。

第9章 德國工人黨

有一天，我接到了總部的一個命令，要我去調查一個社團的情形，這個社團，顯然是有政治作用的，在幾在之內，他們將要用「德國工人黨」的名義來舉行會議；而且費德還將前去演說。我必須去赴會，察看羣情而做一個報告。

現在，軍隊對於政黨所發生的好奇心，已經充分地明白了。自從革命之後，軍人已經獲得了政治上活動的權利，就是毫無經驗的軍人，也充分地來利用這種權利。但是，中央黨和社會民主黨，他們發覺軍人對於革命黨的同情，已在慢慢地喪失而傾向於民族復興運動，因而十分後悔，才知道應該撤回軍隊中的選舉權，並且還應禁止他們參加政治。

衰弱了的資產階級，以為軍隊必須回復過去的情形，而為德國國防的一部分，但是中央黨和馬克斯主義者的意見，差不多把民族主義看作是一顆毒瘤，必須要把它來拔除的，但是，沒有民族主義，那麼，軍隊僅僅成爲一種永久維持治安的警察而已，不再是抵抗敵人的一種力量。以後幾年的事實，就是一個明證。

所以，我對於上述的工黨，雖然是毫無所知，然而也決定去參加他們的集會。

費德的演講完畢了，我很是高興。我觀看已足，準備出場的時候，忽來宣佈說，現在人人都可發言，因此我就站定了不去。起初所見所聞的，一些也沒有值得注意的地方，後來，忽然有一

位「教授」，站立起來說話了，他對於費德的議論，發生了疑問，待到費德對他作了滿意的答覆之後，他又突然把「事實的根據」作為要素，毅然地建議著，說這個新興的青年黨，是最適於使巴維利亞脫離普魯士的壓迫而奮鬥的。這位先生真是厚臉，他還說這事如果能夠實現，那麼，日耳曼奧地利必定會立即和巴維利亞聯合，德國的和平也就有了希望，以及其他類此無意義的妄言。在這時候，我乃不得不請求主席，准許發言，我也來發表一些意見。我因此把這位「學者」的狂言，痛加駁斥，我的言論，也就獲得了很大的勝利。我的話尚未說完，他已經像喪家之犬一般地狼狽而逃了。

在那時，我會把這件事反覆的加以思想，並且也預備置之不論了。可是，這真使我發生驚奇的，就是不到一星期，忽然我接到了一張郵片，說是已經准許我做德國工人黨的黨員；並且請我去參加下星期三該黨的委員會。

他們這種徵求會員的方法，真使我驚詫得不知所以，叫人恨既不對，愛也不是。我想自己來樹立一個黨，我絕無參加現成黨派的心意。真的，實在不曾有過參加他黨的夢想。

我正擬動手寫信答復該黨的時候，忽然我生出了一種好奇心，決意在那天我自己到會，趁此機會來親自解釋著我的理由。

星期三到了。忽然，有人來告訴我，說是全國工黨的首領，將要親自出席。這一個消息，使我聽了很有一些驚奇。我的理由，也只好慢慢來聲明了。居然，他真的準時出場了。他就是費德

講演時的重要發言人。

這件事，更使我詫異了，我決計靜待著，看他有些什麼事件產生。無論怎樣他們的大名，我是已經知道了。該黨全國的首領，是叫赫勒先生（Herr Harer）基尼黑的主席便是安頓德來克斯勒（Anton Drexler）。

開會了，首先是宣讀上一次會議紀錄，並再對演說的人表示謝意。接著便是新黨員的選舉，——就是通過我入黨的問題。

我就開始向他們發問。我方才知道該黨除少數重要的原則外，毫無所有，其他是什麼也沒有了，沒有黨綱，沒有小冊了，沒有印刷品，甚至一個區區的橡皮圖章，也沒有置備；然而，他們却有著極大的信仰，和良好的意志。

我不想對他們來加以嘲笑了，我很知他們所研究的是些什麼事了，他們實渴望着一種新的運動，這種運動，實在是比一般稱做黨的範圍還要大。於是，我就碰到了有生以來最困難的問題了。我對於這個黨，究竟是加入呢，還是不加入呢？

命運似乎在向我示意。我絕不應該加入當時的任何現成大政黨，我將更詳細地來說明我的理由。據我看來，這可笑而人數很少的團體，尚未成爲一個堅強的「組織」並且還能容個人活動的餘地，這對我實在是一件有利的事。該黨尙有待於整頓，這個運動的範圍愈小，那麼，這個運動適當的表現也愈快。該黨的性質、目的和方法，還可以重行決定，這在現存的各大黨中是絕不

可能的。

我對於這件事，愈是反覆的思索，我就愈是堅信這種小規模的運動，可以作為復興民族的先聲，這在現在議會中各政黨，是絕不可能的；因為現在的政黨，僅僅知道牢記著陳腐的觀念，或是因為有利可圖的緣故，而來擁護一種新制度。現在，這裏所待提倡的，乃是一個新的世界觀，並不是一種新的選舉口號。

我經過了兩天的苦思悶想，最後，才決心進行著我所取的步驟。因為這是我一生最重要的關鍵，這時候，我後退是不可能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的。

這就是我實行加入德國工人黨的經過，他們給了我一個第七號的臨時黨證。

第10章 舊帝國的崩潰徵兆

德意志國家的民族，受到了這個非常重大的創痛，正像患了頭暈的病症，他們的感覺和思想像是都喪失了。把過去的光榮和偉大，來與現在的艱難和不幸比較，真像是隔了一世，不堪回首！這無怪無論什麼人，都要炫惑於帝國的偉大，尚不知道他的崩潰徵兆，已經發生了。

這種徵兆，已經顯然的可以見到，不過，只有極少的人，能夠得到明確的教訓。這種教訓，在目前，比過去尤為必要。

現在，多數的德國人民，他們僅從國內經濟上的貧困與其結果，窺見德國的崩潰。因為凡屬德國人，差不多每個人都受到影響的，所以每個人都知道了這種大災。但是，全國人民，不知道這種崩潰和政治、文化、道德有著關係而已。

一般民衆的認識是這樣，那也不要說了；便是社會中的知識分子，他們也以德國的崩潰，就是「經濟災害」唯一的原因，而且以為要復興德國，須從經濟方面著手才對，這就是我國直到現在，所以不能找出挽救方法的重要原因。倘使我們能夠知道德國崩潰的主要原因，第一還是在道德和種族方面，而經濟還在其次，這樣才可算明白目前的困苦原因，而且也能發現救濟的方法。

我們的災難，以及目前的腐敗原因，這是由於歐戰失利的緣故。這一點，便是最易為一般人

所公認的。這種毫無意識的話，確信的固不乏其人，但是，明知他是不對，而偏又故意這樣來說的人，爲數更多。這般人，便是麀集而仰賴政府來豢養的人。

世界和平的宣傳者，不是如此說嗎？德國的戰敗，僅是破壞了「軍國主義」德國的人民，且將慶祝其光榮的復興呢。整個革命所用的口號，說革命固然使德國不能遽然得到其所期望的勝利；但是，德國的民族，不是這樣，不能在國內外獲得充分的自由。這樣的話，不是你們這般欺世的小人所說的嗎？

把德國崩潰的原因，完全推在軍事的失敗上面去，這是猶太人的無恥特點。而賣國的總機關報，就是柏林的前進報（Vorwärts），還說此際不允許德國民族揭旗凱旋！現在，我們是否可以認爲這是德國崩潰的原因？

把戰敗當作德國崩潰的原因，我們可以用下面那樣的答覆：

自然，歐戰的失敗，對於我國的命運，確實有著可怕的影響，然而，戰敗並不是原因，而是各種原因的結果。這種生死存亡的鬭爭，到底不會有好結果，這是有知識和懷善意的人士都十分明白的。然而，不幸有許多人碰到緊要關頭，而失掉了推理的能力，對於真理，必得加以駁斥和否認，而那些明白這真理的人，又從而加以附和。這些人實在是使我國崩潰的罪魁，他們現在忽然說戰敗是崩潰的原因，豈非大謬。因爲戰敗祇是他們行動的結果，而不是像他們現在所說的，是由於「領袖不良」要知道敵人並不是懦夫；他們也知道爲國効死的。當戰端初啓的時候，敵方的

人數，就多過德國的軍隊，而且就專門的軍備而論，他們是有全世界在做著後盾。但是德國仍能在全世界對抗，苦戰四年，而且常獲勝利，這除了德國人的勇武和嚴密的組織之外，完全因為他有著良好的領袖，事實俱在，不容抹殺的。德國軍隊的組織和指揮，實在是古今世界各國所不及的。而其失敗的原因，實在是因為人類抵抗力所限制的緣故。

這樣的軍隊崩潰，並不是我們現在的不幸原因，而是別種罪惡的結果；這個結果，再會引起後來的崩潰，而且比較前此的崩潰，尤烈。

民族的覆亡，事實上祇因一次的戰敗而沒有其他的緣故嗎？這問題現在可作下面的簡單解答。

如果一個民族的軍事失敗，是由於懶惰、怯懦及平庸——總之是該民族的卑劣無能，——那麼，這個是常有的事實；不然，那軍事的失敗，反而足以激起未來更為偉大的復興，這並不是民族覆亡的標記。

歷史上有著無數的實例。足以證明此說是正確而不謬的。

德國軍事的失敗，並非出於偶然，是古今因果報應的當然懲罰，還嫌其過輕呢！

假使前線真的因為孤軍無援而撤退了，民族的不幸，真的是由於軍事的失利，那麼，德國民族的失敗，必定是另有一種精神在。他們對於戰敗後的一切痛苦，必定會得咬緊牙跟來忍受的。對於敵人的僥倖獲勝，必定會憤怒填膺，德國人決不會有幸災樂禍的事件發生；而且也不敢以怯

懦和失敗向人矜誇，戰士也不致遭人揄揶，軍族也不致被人污辱，尤其是不致發生失去體面的事，遭受英國雷平頓上校（Colonel Repington）譏諷「三個德國人中必定有一個賣國賊」了。

軍事崩潰的本身，實在是由於種種不健全的現象，以及促成這種不健全現象的人所造成的。他們在和平的時候，已經流毒遍於全國，他們道德的敗壞，自衛意志的薄弱，以及醞釀多年有害於民族和國本的種種議論，造成了這一個災難，所以軍事的失敗，不過是第一種有形的惡果而已。

猶太人陰險狡詐的全副精神，和馬克主義的鬭爭機關，把這種災難的直接責任去加在盧登都夫的身上，這是自然的。實在，盧登都夫預先知道了災禍的來臨，乃想用非常的意志和能力，來使之轉變拯救民族於沉痛屈辱的時候，他們使他負起戰敗的責任，這是因為要奪去他從道德上從事辯白的武器，使惟一能揭發賣國賊的人束手無策而已。

這件事無異是一種慢性的病，已經到達成熟的時期，恰好在大難中忽然被可怕的情形把病症制止了，這一點，我們可以看作是德國民族的大幸；不然民族將慢慢地趨於滅亡，好像入骨的痼疾，更難挽救了。幸而這災難，至少是大多數人所共見的。人類對於瘟疫的克服，實在比肺癆更為容易，這是因為瘟疫的泛濫，其勢很凶，死亡枕藉，使人驚心動魄；而肺癆的來，其勢和緩；瘟疫使人恐怖，而肺癆却使人疏忽。我們碰到了瘟疫，就盡力來加以抵抗；碰到了肺癆，使用迂緩的方法，來加以遏阻人類能夠克服瘟疫，而反為肺癆所克服，便是為了這緣故。政治團體的疾

病，也是如此的。

在大戰之前，有着長久的和平日子，某種的禍患，已經在這時期中發生，牠的原因，雖然沒有人加以注意（除了少數的幾種例外），但是，其成爲禍患，那是已經認識了的。這裏所說的例外，第一便是民族經濟生活中的現象，因爲這個使人感覺到切膚之痛，實在較其他方面的禍患尤甚。

許多崩潰的徵兆，能夠激發人猛省的地方很多。

大戰以前，德國的人口激增，因而使主要食料的供給問題，在一切政治、經濟的思想和行動上，日益成爲重要。但是，不幸他們以爲這種嚴重的問題，可以依靠簡便的方法，就能達到目的，因此就不能用堅決的心，逕自去獲取一個正確的解決。德國放棄了擴張新領土的觀念，而代以經濟侵略的妄想，因之使工業生產漫無限制，而弊害百出。這最不幸的結果，第一便是促成農業階級的衰頹。農業階級愈是衰頹，那無產階級的蟬集於都市者也愈來愈多，終於使社會的均衡完全消失了。

現在已經使貧富懸殊，更是顯然了。富者和貧者，他們比鄰而居，這勢必要形成悲慘的結果。人民既開始受著貧窮和大量失業的痛苦，所以接踵而至者，便是不平和怨恨。

民族經濟破壞而所生的不良現象，還有比這更壞的。因爲商業宰制了全國，所以金錢也就變成爲萬能了，舉國上下，每個人都成爲拜金主義的奴隸，風紀敗壞到了這樣的地步。當時德國民

族，正在危急存亡的時候，最需要的，便是激發人民最壯烈的情緒，而突然遭遇到這種變化，其禍害必更爲厲害。依照事理來說，德國應該依靠，「經濟上的和平工作」，來維持其生存，而以武器作爲後盾。

不幸，現在對於金錢勢力應極端反對的人，竟也默認了。尤其不幸的，便是德皇勸貴族也加入金融資本界去。但是德皇的此舉，情有可原，因爲畢士麥尙且不能覺察這一危險，事實上，這件事使理想的美德，居於金錢之後，所以此風一開，勇武的貴族，立刻退居財閥之後，這是十分明顯的。

在大戰以前，德國的商業，因爲發行股票已經趨於國際化。一部分德國工業，固曾努力於防制這種危險，但是，終於還是犧牲在資本聯合攻擊之下，有密切關係的馬克斯主義運動，也是爲虎作倀的。

反對德國「重工業」的持久戰，便是國際化的發端。當時國際化，正靠着馬克斯主義的之助而力圖實現，要想完成這項工作，那麼，在革命中馬克斯主義，是得不到勝利是不成的。當我執筆寫述這本書的時候，他們對於德國國有鐵路的總攻擊，正獲得了勝利，這種鐵路，就要落在國際資本家的手中了，因此，「國際」社會民主黨，又達到了其它的一個主要目的。

德國工業化進行，得到成功的最好確證，就是在大戰後，德國一位工商界要人發表的意見，說商業是使德國復興的唯一力量，這便是德國工業化成功的明證。史旦尼斯（Stinnes）的這句

話，引起了極大的糾紛；但是仍被採納，而且在轉瞬之間便成爲一切欺人者及空談家的格言；自革命以來，毀壞德國國運的，便是這班冒牌的「政治家！」

在戰前，德國衰頹的唯一徵兆，就是國人一天一天的精神萎靡，作事不力。這是他們臨事不能決斷，遇事畏縮的結果。這種缺點，實在是出於教育制度的不良所致。

德國的教育，在戰前缺點極多。他的制度，僅注意於知識方面，而忽略了實際能力的培植。對於人格的養成，以及責任心的激勵，更少注意；至於意志力，和果斷力的培養，那就完全漠視了。所以，這種教育所養成的人才，大都不是強毅的壯士，而是懦怯的書蛀。戰前，世人大都這樣看德國人，因此而被人推崇。德國人之所以受人歡迎，這是因爲他們是有用的人緣故。然而，意志不堅，那就並不見重於人。他們脫離國籍，背棄祖國，所以比較他國的人民爲容易，就是爲了這個緣故。「有禮貌的人，可以周遊世界，」這句名諺，可說形容的淋漓盡致。

這種柔順的態度，是接近君主的惟一方式，然而引起的災患匪淺。依照此種方式，人民祇能唯唯諾諾，奉命唯謹。然而，要知道，自由人的尊嚴是最重要的，否則這種的阿諛態度，終必要把帝國顛覆而後已。

專門阿諛的人，他們可以安於現狀，而毫不知恥，可是國內的優秀人士，就是所謂正人君子者，他們眼見著這種無意味的事態而受人擁護，勢必感到萬分的厭惡。在他們看起來，歷史是歷史，真理是真理，決不容混爲一談的，就是講到君王的事也是一樣的。世界各國，要得到成爲偉

人的君主。這是不容易碰到的。假使可憐的命運，能夠使其免於暴君的虐政，那也就應該知足了。

所以，君主觀念的價值和意義，不能專賴於君主的個人，除非借著上天的好意，恰好把皇冠加於英武的腓特力（Frederick）大帝和明哲的威廉一世（William I）的頭上。不過這不是常有的事，數百年之中或許偶然有一次而已。君主政體的觀念，應該比較君主個人為重要，這觀念的意義，就是專門以制度的本身作為基礎，使君主祇為這種制度的奉行人而已。

這種不良的錯誤教育觀念，還有一種結果，就是畏縮而不肯擔負責任，因此對於解決重要問題的能力，也就缺乏了。

我所想到的例子很多，現在略舉幾個如下：

新聞界，常把報紙看作是國內一種偉大的勢力。報紙的重要性，實在毫無可疑，它的價值，也不是我們所能估計的；因為它的工作，確能延續成人的教育。

國家和民族，所要注意的，就是在使人民不要墮入惡劣的、無知的、或是懷有惡意的掌握中去。因此，國家的責任，須監督人民的教育，並且防止其誤入歧途。報紙的言論，國家尤其應該加以注意。因報紙對於人民影響最大，也最深刻。它的活動，不限於一時，而且含有繼續的永久性質。報紙的重要性，就是在能以一致而堅定的重復方法來施教。報紙上的言論，應該趨於一致的目的，不被「出版自由」的謬說所惑，不因誘惑而疏忽了職責，以至不供給保持民族健康的養料，這是國家必須加以注意的。國家須以不屈不撓的決心，來控制這種通俗教育上的工具，並且

使其爲國家和民族服務。

在大戰之前，那些所謂自由報章的行爲，無非是葬送德國的民族和國家。我們姑且不必去提那慣於造謠的馬克斯派報紙，因爲它們把造謠認爲是一件要事，好像貓的不能不去捕老鼠一樣，他們唯一目的，便是摧毀國家和人民的抵抗力，使他們成爲國際資本及其主人——就是猶太人——的奴隸。

這種毒害民族的行爲，國家對之，也曾設法去加以抵制嗎？這是絕對沒有的事；祇有幾次溫和的警告，以及實在說不過去的重罪罰金而已。

在那個時候，報紙多被猶太人所操縱，他們慢慢地使民族腐化，政府既沒有妥切的辦法去給予取締，而且也沒有取締的決心；尤其厲害的，就是沒有固定的目的。官吏的智力幼稚，不知道取締的重要、方法的選擇、以及定下一個明確的計劃。他們對於報紙所用的糾正方法很是拙劣；他們萬一到了無法忍耐住的時候，那也不過把新聞界的敗類，加以幾星期、或是幾個月的輕微的懲罰，但是，他們不會知道根本剷除禍源的計劃。

從那些不會受過完全教育，學識淺薄的讀者看起來，法蘭克福特報（Frankfurter Zeitung）是一份最有價值的報紙；因爲此報從來不會用過粗俗的言辭，而且也從來不會反對過暴力；他的言論，時常贊成用「知識的武器」來鬭爭，這種論調，竟會獲得那些最沒有知識的人去贊同，那真是極爲可怪的。

猶太人所創辦的所謂知識階級的報紙，他的用意，是在迎合我國那些一知半解的知識階級，法蘭克福特報和柏林日報（Berliner Tageblatt）的論調，便是在投合這輩人的嗜好，而受其麻醉的，也便是這輩人。這種報紙，他們十分小心的閃避粗野言辭，用了他種方法來荼毒讀者的心志。他們用了美麗的甘言蜜語，使讀者心神迷醉，深信行爲的動機，是純粹知識和道德上的真理，而不知道這種極狡猾的手段，實在就是在偷竊人家攻擊報紙武器的一種奸計。

作事而不求徹底，這就是內部墮落的表現，內部一經墮落，那國家遲早也要隨之而崩潰的。我相信，我們這一代的人，如果能夠受著良好的指導，走對了方向，那麼，挽回這個危局，當然十分容易的。現在的人，已經有了種種的經驗，知道這種經驗的意義，能使那些還未完全昏迷的人，精神振作起來。如果現在禁止那些報紙，以控制猶太人，並且使這種教育工具轉爲國家所用，而不再旁落於外人和敵人的手中，那麼猶太人勢必會利用其報紙來大聲狂吠了。但是，我深信這種事，由我輩青年來處置，必定較我們的前輩容易。因爲一枝三十生米突小小爆裂彈炸的聲音，常常會勝過無數的猶太新聞界敗類的呼號聲音，所以聽他們去呼號好了！

我們應該對於教育體系有著全部的計劃，必須養成兒童在暇時專作有益身體的事。在這一時期，兒童不得游蕩在街上以及電影院中。日常的工作做完了，就應當去鍛鍊身體，俾投身走進社會的時候，不致怯懦而無能了。青年教育的任務，是在他們預備投身社會，並不是僅僅灌注一些知識就算了。我們應該立刻剷除那身體的鍛鍊係屬私人事的一種觀念，我們決不能不許任何

人任意地貽害著他的子孫（種族）。

要防制精神墮落，須得和鍛鍊身體同時進行。現在我們一切的公衆生活，好像是兩性觀念和誘惑的泉源。我們試看那電影院、戲院以及其他劇場所揭示的節目，我們便難於否認牠不是正當的娛樂，而且尤其不是青年人正當的娛樂。一切的招貼和廣告，都用著最鄙俗的方法去引起公衆的注意。這種事件生出來的流弊極大，凡是對於青年的心理，能夠明白的人大都能夠知道的。

人民的生活，不但要不爲性慾所麻醉，而且還得排除苟且畏葸的心理，凡是一切行爲的目的。個人的自由權，實在比較起來次於維持種族的義務。

在藝術和文化的各方面中，也都可以看到同樣不健全的狀態，在許多所謂「藝術場所」，他們大都毫不知恥的揭示著「只許成人入內參觀」的警告（在一切新奇事物展覽室的前面，也是大都如此的），不許青年去參觀，這便是證實我們內部衰微的惡兆。

在此種場所，理當首先作爲培育青年的材料，不該徒供頹廢的成人去娛樂的。然而此種場所，竟乃出此防範青年入內的手段，說起來真是令人可嘆！請問古往今來大戲劇家對於這種警告，和造成這種警告的原因，有什麼話可說？我們試想席勒（Schiller）對此將作怎樣的憤慨；哥德（Goethe）對此也不會忿然而起嗎？

但是，我們把席勒哥德或是莎士比亞（Shakespeare）來和德國的新詩人互相比較一下，究竟又當怎樣呢？前者都是陳腐老朽而不合時宜的人物。因爲在這一時代的特徵，那些新的藝術

家，不僅產生了一些卑劣的作品，而且還誣詆了過去一切真正偉大的傑作。

在大戰之前，我民族文化上有一件十分痛心的事，就是我們對於藝術，和一般的文化上，不但沒有絲毫的創造力；而且心懷嫉恨，竟沾污並埋沒偉大的過去。在十九世紀末葉，德國人在藝術上——尤其是在戲劇和文學上——的創作，大都是卑劣至微不足道的，而對於以往的全盛時代，反而加以詆毀，斥之爲老朽陳腐，好像現在的時代，似乎就可把他們的劣點完全遮蓋了的。

我們再來研究一下戰前的宗教情形，便可以知道一切事大都趨於分崩破裂的狀況。甚至在宗教的領域之中，多數人士，大都已失去了堅強宏偉的信仰心。他們公然反對教會的雖然不多，但是，漠視教會的實也不少。在亞洲和非洲，新舊兩教都有著教會，以便吸引信徒來對他們信仰（這種努力的結果，比較回教的進展，那就差得多了。）然而，兩教在歐洲方面所失去的信徒，爲數已達數百萬了。他們之中，有的全然厭棄宗教的生活；有的是各行其是而已。從道德的立場上來考察，這實在是一種不良的結果。

對於各種武斷教條的反對，情形日見劇烈；然而，倘使沒有教條，那麼實際上人類的宗教信仰，也就無從發生。一國的民衆，並不都是哲學家，但是，信仰便是人生道德觀念的唯一基礎。世人常想探求宗教的代替物；來替代宗教，可是始終未能獲得良好的代替，要是宗教的教條和信仰，如果真能支配民衆的話，那這種信仰的絕對權威，可作宗教信仰的整個的基礎。宗教有信條，就好像人們生活有習慣，國家有法律，沒有習慣，那麼少數的優秀份子，確是能夠維持著他們

合理而良好的生活，但是，在其餘的多數人便不能了。只有信條，才能去制服那無定而又爭辯不已的見解，造成了宗教上不可少的形式。否則，玄學的人生觀（就是哲學的見解）永遠不會產生的，所以攻擊教會的信條，正像反對國家的法律；攻擊教會的信條，必然地流於無可挽救的宗教虛無主義，恰像反對國家的法律，必定使全國完全陷於無政府的狀態中。

一個政治家，必須衡量宗教的價值，可是，一面在衡量，一面也不必過問宗教上固有的缺點，而應該顧到代替宗教的東西，有些什麼特別的利益。如果在不會有那一種代替物之前，毅然地便把現存宗教來加以破壞，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在大戰之前，德國人有很多不喜歡宗教生活的，這一點。實在應該由所謂「基督教」黨的濫用宗教來負責。而且他們還厚著臉要把天主教和政黨混而為一。這種不幸的錯誤，恰好替議會中許多不良分子，造出了機會，在教會反而受到損失的。

然而，受到禍害的，仍是整個民族，因為這種情形的結果，只有使宗教生活一天散漫一天，這時，也正是萬百事件，在開始廢棄和變動，道德和行為上的傳統原則，也一步一步地在崩潰。如果我們民族組織上的裂痕，沒有特別的事故，那危險還不致發生，倘使一朝而事變突起，那麼，民族內部的團結，必定成為最嚴重的問題時，這種裂痕，也必釀成了禍亂。

在政治方面，明眼人也能看出種下的禍患，已經在萌動，而這種禍患，如果不去趁早消弭，那麼帝國一切的外交內政，勢必因之而崩潰瓦解了。

在當時，許多憂國的人士，大都爲這衰微的徵兆，而心中有所警惕，大都因爲當時帝國政策的沒有計劃，和主張，而非難他們洞悉了帝國內部的衰微和空虛，然而，他們並非政界中人。官場中用了他們素來莫不相關的態度，來忽視著像張伯倫（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一類的人直覺地天才。這般官僚，他們既愚昧得不能爲自己打算，但又驕矜不屑去依附他人。

我們常常聽到人家說國會制度，說是：「從革命以來已早失敗，」這實在是一種毫無思索的話。這種話極易引起一般人的誤會，以爲現在的國會制度，已經不同於革命之前了。實在國會制度的結果，僅有破壞的效用而已，當時大多數的人，自願戴上了眼罩，竟而一些東西也看不見，或者是不想看見什麼東西。德國的顛覆，國會制度實在應該負著大部份的責任。我們不論從那一方面來看，凡是國會所做的東西，沒有一件不是半途而廢的。

帝國的聯盟政策，是一種懦弱而不徹底的手段，他的用意本來在維持和平，但是結果仍不能避免戰爭。

對波蘭的政策，也是一種不徹底的手段，他們徒然激怒了波蘭人，然而實際上對於自己是毫無補益的。結果，德國既不能獲得勝利，又不能和波蘭人恢復邦交；反而和俄羅斯結下了仇恨。

亞爾薩斯和羅連（Alsace Lorraine）問題的解決，也是不徹底的，因爲既不能對狠毒的法國加以迎頭痛擊，使他一蹶不振；又不能以同等的權利，去給亞爾薩斯人。這兩條路他們都不去走，這就可以見到當時的人們，實在太無能爲力了，因爲主要的賣國賊，在當時還在各政黨中

佔據著重要的位置，如中央黨（Centre Party）的韋泰來（Wetterle）就是其中的一個。

同時，猶太人利用了馬克斯主義，以及民主黨的報紙，向全世界作詆毀德國「軍國主義」的宣傳，圖謀中傷德國，同時馬克斯主義和民主黨，又不肯設法充實德國的軍隊。

德國的民族，為著爭取自由獨立而遭到失敗，這原因實在是由於平時的態度鎮靜，苟且猶豫，不急急地集合全力來捍衛祖國的緣故。

君主制度，對於人民有著一種不良的影響，那便是慢慢地使大多數的人，迷信政治是一種君主獨裁之事，用不到人民去過問。如果政府是良好，或者還存有一些望治之心，這是差強人意的。可是一個勵精圖治的舊政府，有一天被那不負責任的新政府所取代，那麼消極的服從，和幼稚的信仰，便成為萬惡的淵藪了。

但是除去了上面的，以及其他的缺點外，君主政體，確也有著它本身的價值。

第一，君主制度，能夠使國家的領導權穩固，使國內所有的各機關，完全置於國家之下，那便可以免掉貪污的政客乘機搗亂。第二，君主制度，具有本來的尊嚴，和因此而產生的權威；在這種制度的下面，官員及軍隊的地位可以提高，但是，可以不受政黨的影響。做君主的人，以一人而為一國的元首，他所肩負的責任，應比國會中偶然成立的多數黨更為重大了。德國的政治，所以被人素來稱為純潔的緣故，實在完全由於這一點。最後，君主對於德國國民的文化，有著極多的貢獻，而且還能夠去掉一切的流弊。德國各邦的都會，向來是藝術情緒所陶冶的地方，這種

情緒，在現時物質文明的時代，已經慢慢地消滅了。在十九世紀，德國的君主，對於藝術和科學的建樹很多，現在比較起來，那真差得太多了。

從事於其他職業的人，他們醉心於貪婪和唯物主義的時候，軍隊却以最高尚的理想和犧牲的精神來互相勸勉，主張民族統一，反對階級分化。但是，軍隊的唯一的缺點，便是一年的志願兵制度，因為這種制度，破壞了絕對平等的原則，使知識分子脫離了一般的軍事團體；如果把這種制度反其道而行，那是必定有利的。德國的上流人士，他們自成一個階級，他們和平民的隔閡一天深似一天。如果所謂知識分子的人，能夠參與在軍隊之中，那真是一件美事。可惜並不如此。所以是一個缺點；但是，世界上的一切制度，試問有那一種是毫無缺點的？況且，德國的軍隊，雖然有此弊病，但是，優點極多，所以這種小疵，比那一般人類制度的缺點，那就微不足道了。

舊帝國軍隊的最大功績，便是在世人重多數，而輕個人的時候，他們獨能重個人而輕多數的猶太人的民主思想，加以反對，而信仰個人的人格，他們能夠啓示我們對於以後最急切的需要。在舉國萎靡不振的時候，在軍隊的行伍中，獨能每年造成三十五萬健兒來。他們經過兩年的訓練，把青年的柔弱病態，完全洗去，而養成強健得像鋼鐵樣的體格。有的經過兩年服從的青年，他們才知道怎樣發號旋令。我們祇要看看他們的步伐，就可知道他們是曾經受過相當訓練的軍人。軍隊，就是德國民族的訓練學校，那些猜忌貪婪的東西，他們想要使國家沒有實力，人民沒

有武器，因此大都集中其怨恨於軍隊，這並不是沒有原因的。

舊帝國除了政府和軍隊之外，還有優良無比的官吏。德國政府的組織完善，以及行政優良，在世界上可以稱爲第一。雖然有人說德國的官吏，乃極拘泥的官僚，然而，他國的官吏，非但優良不能超過了德國的官吏，而且還不及甚遠呢！他國的官場，在組織上沒有像德國的嚴密，而且也沒有清正良好的官吏。比方，人格卑污，知識淺陋，能力薄弱，即使其人明達而趨時，那還不如拘泥而忠誠的爲好。

德國的官吏，和行政機關的特色，就是在不受政府變動的影響；凡政府暫時的政見，並不能影響德國政府官吏的地位。革命以後，這事已經有了根本改變，政府任用官吏，不問其能力和資歷，而以黨派關係爲根據；於是正直不阿的性格，不僅不是優點，反而成爲一個大缺點。

團體、軍隊和官吏，此三件便是舊帝國所以強大的理由了。

第11章 民族與種族

如果亞利安民族（Aryan）的血統，和其他劣等民族血統相混合的時候，那麼，支持文化的種族，必定要趨於沒落，從過去的歷史看來，一些也不會錯誤的。北美的人口，大部分是日耳曼種族，極少和劣等的有色民族相混雜；中美和南美的移民，大半是拉丁人，他們常和土著混雜，因此，他們的國民性和文化便和北美大不相同。就拿這一個例子來引證種族混雜所產生的影響，那是顯而易見的。美洲大陸上的日耳曼人，凡能維持純粹的血統，而不和其他人種相混合的，他們已經能夠崛起，而為美洲的主人，假使他們能夠長期守着沒有混亂血統的羞恥，那將永遠維持着他們主人的地位。

如果強有力者，能夠早日把世界完全征服了，成為全世界的唯一主宰，那麼，在這局面之下，和平仁愛或許還不失為一種很好的理想；用這原則去實施當也不會有損於民衆。所以奮鬥實先於和平。否則，那就等於說人類的發展，已經超過了最高的一點，而其標準，則不是任何倫理觀念的統治，而是野蠻的統治，接着就發生了混亂。我知道，有人要譏笑這一種說法，然而，地球固然運行於以太之中，歷經數千億年，人類所以能維持其高尚的生存，並不是為了狂妄者的理想，乃是因為了解自然的法則，且能控制這法則而為人所利用。倘使連這一點也忘掉，那麼，人類將會滅絕，又回到了洪荒時代了。

我們在世界上一切——科學、藝術、工藝和發明，——不過是少數民族的創造品，推究它的根源，或許出之於某一種族全部的文化，完全靠了這少數民族而存在。要是他們淪於滅亡，那麼，地球上的一切燦爛文物，自必也同歸於盡。

假如，我們把人類分為文化的創造者、保持者，和破壞者的三種，那麼，惟有亞利安人種，方能有資格做第一種的代表。

亞利安人常用極少的人數，去征服異族，而且能夠得到多種低劣民族的幫助，他們利用那新獲領土的特殊環境——像土地的膏腴和氣候等，——去發展他們潛伏着的智力和組織的本能。經過了幾百年，他們便創造出獨有的特別文化，這種文化，起初僅有他們本身的特性，後來便依照他們所征服的土地和人民的特性而發展了。時間過得稍久，他們那些征服者。便違背了保持血統純潔的原則（這原則在起初他們是固守着的，）而和被征服的土著通婚，因此，他們特殊的民族性，遂歸消滅，這是天演的公理。

凡是有創造力的民族，他們是始終在創造之中的，不過乍看起來沒有覺察而已。他們這班人，僅能認識既成的事實，因為世界上大都僅能見到天才的外表，像發明、發現、建築、繪畫等，而不能認識天才的本身。就是這種外表，也不是他們一時所能了解的。在民族的生活中心，其所有的創造力，須待某種特定環境的要求，始能有實際的應用；正像一個人的天才，則須受了特殊的激勵，他的本身，始能有具體的表現。我們看看那過去和現在人類文化的傳播者，大都是亞利安

人，那就可以明白了。

爲了要發展高超的文化起見，那些文化較低的民族，實在有着存在的必要，因爲祇有這些民族，可以當作技術工具的代替物，沒有技術工具，那麼，高超的文化是不可能發展的；因人類文化發展的初期，有賴馴良的獸類的地方少，而賴於低劣民族勞力的地方多。

迨被征服的種族，成爲奴隸之後，於是獸類才開始遭受同樣的命運，普通的人每以爲獸類先於人類服着奴役，實在是不對的。就把耕種來說，最初挽犁的是奴隸，以後才由馬來代替的。祇有夢想和平主義的愚人，認爲這是人類墜落的現象，而不知道這是勢所必然的，必須這樣，然後才能達到某種事態，而那些和平使者，才能對世界傳播他們荒謬的大言。

人類的進步，好像是去爬一無盡長的梯子。登高必須要從下面拾級而上，所以亞利安人必須要遵循實際的道路，向前進行，這道路決不是代近和平者所夢想的道路。

但是，亞利安人所必走的途徑，已經十分顯明。他是一個征服者，他征服了低等民族，使被征服者，遵循他的意志和目的，受他支配而從事工作。但是，當他驅使這班被征服者工作的時候，被征服者不但生命有了保護，而且命運也比較優於以前所謂「自由」的生活了。亞利安人長此以主人自居，他們不單是維持其主人的地位，而且是文化的維護者，及培植者。可是有一天，被征服者把他本身的地位提高，或者是和征服者的語言同化時，那就主奴的分別沒有了。亞利安人既放棄了他們純粹的血統，那麼，他們所有的養尊處優的權利，也跟着失去了。亞利安人於是就

一天一天地墜落，他們陷於種族的混雜之中，他們創造文化的能力，也跟着慢慢地消失了，終於智力和體力，和被征服的土著人種相像，而不類他們的祖先了。雖然他們暫時仍能享受着文明的福利，可是對於文明，初則漠視，最後終將遺忘。這就是各種文明和帝國所以崩潰的原因，而各種新的創造，所以也代之而起了。

血統的混雜，以及種族的墜落，這實在是舊文明湮沒的惟一原因。因為人類的覆亡，並非是爲了戰爭的失敗；實在是爲了喪失純粹血統所獨有的抵抗力緣故。

在德文中有一個準備服從義務的要求（Pflichter fullung）的形容字，這字極能表明勇於負責，急公好義的意想。這種態度的基本觀念，我們稱之爲理想主義，這是用以來分別利己主義的。因爲這個主義，是指個人爲社會爲人類而犧牲自己的。

當理想陷於滅亡的時候，我們可以立刻見到那種社會的精華，和文化之必要條件，也隨着而低落了。於是利己主義，也就成爲民族中的主要勢力，每個人只是惟利是圖，社會秩序立刻廢弛，人類大都從天堂而墜入地獄中去了。

猶太人正和亞利安人相反在世界上任何民族中，他們自衛本能的強盛，沒有較這所謂「天之驕子的民族」更強的。他們的種族，直到現在還是存在，這就足以明證了。我們試問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能夠像猶太族歷二千年而不改變他的內在特性嗎？世界上有那一個民族，所經的大變，較之猶太族爲更甚，而且能歷萬劫而不變的故態嗎？他們圖存在，保種族的決心，在這些事實

之中，已充分地表現出來了。

猶太人的智力，發展已歷幾千年；到了現在，猶太人才以狡黠稱。從某種意義來說，猶太人在每一個時代，都是如此。但是，他們的智力，並不是他們自身發達的結果，而是由於外族教育的功效。

猶太人本身，絕無什麼文化可言，所以他們精神活動的基礎，常常是受他族所供給的。他們的智力，在一切的時期中，都是因為和鄰近他們的文明相接觸而得到發達的。可是猶太人對於他族，就沒有絲毫的貢獻了。

有人以猶太人和他們的同類爭鬭時，能夠團結一致，因而稱他們是具有理想的犧牲精神的，這實在是大錯而特錯的。

由於這一點，猶太人也是出於他們純粹的自私心；這就是猶太國家——我們且不妨假定它是一個維持和繁殖種族的團體——所以毫無國境可言的緣故。因為一個固定的邊界國家，國內的種族，必須具有他們理想的情操，而且對於工作須有正確的觀念。假使這種概念缺乏了，那麼，想要維持有疆界的國家，是不可能的，而且也沒有文化所賴以建立的基礎。

因此，猶太民族雖然有着顯著的智力，然而沒有真正的文化，其次沒有他們所特有的文化。因為猶太人現在所有的文化，大都是他民族的東西，而在猶太人的手中敗壞了。

起初，亞利安人大都是游牧民族，到了後來，才慢慢地變成有一定居住的民族。從這一點上

，就可以證明他們絕不是猶太人。反過來，猶太人決不是遊牧民族，因為即使是遊牧民族，那麼，依他們的智力所及，對於「工作」概念，也抱有一個確定的態度，以備將來作發達的基礎。遊牧民族確實有着理想主義的根本觀念，不過並不濃厚，所以他們的生活概念，雖然和亞利安人不同，但也並不相反。然而猶太人對於這種態度，是絕對沒有的。他們向來不是遊牧民族，他們是異族的寄生蟲。他們雖然離棄原來所住的地方，然而這並不是完全出之於他們的本意，而是被那些反對他們的民族驅逐的緣故。猶太人散佈世界各地，這確實是一切寄生蟲的特徵，他們常常爲種族覓取新食養地。

猶太人假使能夠使世界人士相信他們的寄生生活，並不是爲了種族問題，而是爲一種特別的宗教團體，那麼，他們寄生於異族的生活，才能獲得永久的維持。可惜這是一個大謊話。

猶太人因爲要繼續他們在別民族中的寄生生活，所以不得不設法掩飾他們內部工作的真相。凡是他們的智力愈是富足，他們的欺詐也愈能奏效。他們欺詐的程序，竟使世界上多數的人士，大家確信他們是法國人，或英國人、德國人，或拉丁人，不過是宗教不同而已。

現在經濟的異常發展，正引起了民族中社會等級的變化，小規模的手工業慢慢地被淘汰了，工人不容易維持他們的生活，於是被迫而變爲一個無產階級了。工廠的工人，便由此而產生了。可是不幸明顯的事實，便是工人們晚年不能自謀生路。換句話說，工人們實在一無所有；年紀一老，即受痛苦，簡直難以維生。

在從前，已經有過一個類似而亟需解決的問題，現在已經發現。在農工以外，慢慢地出現了一個新的階級，這一個階級的官吏，完全是國家的公僕，而且他們也是一無所有的。這種不良的情形，國家爲之找出了一個補救的方法，凡是做公僕的人，如果年老而無法自給的，就由國家來負責維持，並且再規定退職的年金。所以一個毫無資產的人，因此而得免於社會的困頓，而能融合在整個民族中。

近來，國家又碰到了同樣的問題，而且牠的範圍更是廣大了。幾萬萬的人民，常從農村而移居於都市，希望在新工業區的工廠中，做一個工人以謀生活。

因此，一種新的階級，確實已經形成，不過並沒有人注意吧了。但是，後來必定有人要問：我民族是否有力量再使這個新階級去融合於整個的社會中？還是階級的分裂將日益擴大而至於破裂？

這種嚴重問題，資產階級雖然不去注意而聽其自然變化，可是猶太人就早已想到這問題未來無限變化的可能性了。他們一方面利用資本主義的手腕去不遺餘力剝削人類，一方面再去對於在他們的計謀和權勢下的犧牲者，去加以聯絡，不久就成爲反攻他們自己的領袖了。「反攻自己」這當然僅僅是一個譬喻，因此那些說謊大家，他們十分明白怎樣去假冒爲善，而嫁禍於人。他們既能夠厚臉無恥地親自去領導群眾，群眾也就從不知道他們就是向來無恥而欺詐中的更甚者了。

猶太人，他們所用的方法是這樣的：他們向工人宣傳，假意地做出憐憫工人不幸的命運，或

是憤憤於他們的困苦和貧窮，借此去博取工人們的信賴。並且不厭煩地去研究他們生活上的實際，或是想像是困難，因而去引起他們改變生活的願望。用一種巧妙不可言喻的手腕，使亞利安人種中對於社會正義所潛伏的要求，更趨激烈，而對於有幸褔的加以仇恨。在剷除社會罪惡的鬭爭上，這顯然是帶有世界觀的重要性。猶太人於是乃創立了馬克斯的學說。

他把社會上一切公正合理的要求和他的學說混合而成一片，以達到他學說的流行，同時，再在其他方面使那些自愛者，不願來擁護這種要求。他們所表現的，就形式來說，自始就陷於謬誤，而且也沒有實現的可能。因為在純粹社會思想假面具的護符之下，他們既暗藏鬼胎，但又厚臉不知羞恥，竟然大膽地公之於世。他們絕對否認人格的重要，因而再來否決民族的重要，而且再不承認種族的關係重大，借了這一點來作為破壞人類一切文化的基本原則。

猶太人，把馬克斯主義向世界宣傳，分作政治和勞工運動兩種差異而實雷同的組織。

工會運動，是一種更是受人歡迎的運動；因為這種運動，能夠維護工人們艱苦的生存競爭（這是多數的僱主們貪婪和淺見所造成的，）並且使他有改良生活現狀的可能。假使工人們不去信任僱主的殘忍而貪婪的措施，而國家——就是有組織的社會，——對工人又毫不注意，那麼，工人們爲了維護他們自身的權利，便不得不起來自衛了。現在，國內的那些資產階級，竟是利令智昏，對於工人的生存競爭，正在多方的設法阻礙，他們不但反對，並且還力謀破壞。減少不人道的的工作時間，廢止童工，保護婦女，改善工廠和住宅衛生狀況等的企圖。那些聰明而最狡黠的猶

太人，他們對於被壓迫的可憐者，盡力加以援助，而且慢慢地成爲工會運動的領袖，——這種事件，在他們是極易進行的；因他們的目的，不在除去社會的弊害，乃在經濟方面養成一種盲從的戰士，以便破壞國民經濟的獨立。

猶太人把那些和他們作競爭的，完全驅逐了出去，再利用着他們的殘酷本性，使工會運動能夠立足於暴力的上面。凡堅決有識的人士，如果想要抵抗猶太的引誘，就算不爲威嚇所屈服，這種方法亦極爲有效。

猶太人竟利用這可爲民族救星的工會，去實行把國民經濟的基礎破壞了。

政治的組織，和工會是相互而行的。因爲工會是替政治組織預備群眾的。事實上是用強力把群眾硬驅入政治組織中的。而且這又是不斷的金錢來源，使政治組織能夠因此而獲得維持其龐大的局面。這監察個人政治活動的機關，同時是一切有政治性質的大示威運動之主持者。到了最後，工會乃不再顧到牠們自身的經濟情形，而用其主要的武器——總罷工——來推行政治的理想。借着創辦一種合於最低教育程度的刊物，因此政治和勞工組織，取得了強制的利器，遂使最下層的國民，竟甘心去冒極大的危險，而有所不諱。

凡是足爲民族獨立，民族文化，和民族經濟自主的基礎，猶太人的報紙，沒有不瘋狂般的絕端地加以誣譏，任意地把它來摧毀。其中比較意志培養不易受猶太人所駕馭，或者他們的智力，好像足以危及猶太人所遭受的攻擊，更是厲害。

民衆對於猶太人的真正性質，並不知道，而我們的上流社會，又是冥玩不靈，所以我們的民族很易被猶太人的謊言所欺。那些上流社會，他們又是生性怯弱，對於凡被猶太人謊言和讒言所攻擊的人，大都避而不敢接近。同時，群衆們又是愚昧無知，他們竟能盲目地相信着猶太人的謊言。政府當局有時悚然惶恐，或者對於猶太人所攻擊的人，竟加以迫害，希望倖免於猶太報紙的攻擊，這種事件，在那些作威作福的官吏看起來，那是完全爲了政府威信和安寧秩序的緣故。

如果我們來回憶德國崩潰的原因，那麼，他最後和最重要的一點，當然是未能認識種族問題，和猶太人的險惡，這兩者尤以後者爲甚。

一九一八年八月，我們終於敗於疆場上了。但是，我們對此還易容忍；因爲推倒我們的並不是失敗，實在是政治上和道德上，剝奪我民族的本能和力量，以致釀成這失敗的勢力。舊帝國既對於維持我國民的種族基礎問題不加注意，所以對於我們在地球上維持生存的唯一法則，自然也忽略了。

純粹血統的喪失，已經使種族的幸福永遠受到了破壞；現在竟是每況愈下，這影響便永沒有離開身心的一天了。

因此，一切改革的企圖，一切的社會事業，一切的政治努力，各種經濟繁榮的增益，以及各種科學知識的增長，一切的一切，完全付之流水。而維持我人繼續生存的民族及其組織——就是國家不但不能日增於安全，反而日見其衰敗了。舊帝國的光榮燦爛，也不能掩住其內部的衰弱，

而振興帝國的一切企圖，次第的宣告失敗，這都是因為不注意於這最重要的問題緣故。

一九一四年八月，我民族所以沒有作戰的決心緣故，便是爲此。因爲這次的戰爭，僅爲我民族自衛的本能，和破壞我民族團體的馬克斯主義，相遇時的最後表示。但是，在這危急的時候，國人既不能認清內部的仇敵，一切的抵抗，自然完全沒有。上天並不來褒獎勝利者，而是要循着報應不爽的定律。

第12章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

我現在來敘述我黨發展的初期，並且再來簡略地敘述一下和它相關的事件，我決對不想來涉及本黨的理想目的；如果把本黨的任務和目的來一一說明，那就得要佔去一冊的篇幅。因此我想在下編中來詳細地談論一下本黨的黨綱，決定黨綱的原則，並且再就我們的見解去說明「國家」這一名詞的意義。我這裏所說的「我們」，是指幾十萬的群眾而言，他們的希望，大都是相同的，不過他們苦於不能說出他們的意思而已。在一切重大的改革之中，起初都是由一個人勇往直前地來作戰士，而在後面附從的人就有了不知億萬，這確是一件極可注意的事。這種改革的目的，潛伏在數十萬人的心坎中，經過了幾百年，方才有人崛起而宣布這一致的要求，自己來擔任領袖，促其實現。

現在，群眾們的憤懣，足可證明他們的心中具有徹底改革現狀的熱望；有許多人厭惡看選舉，還有極端瘋狂般左傾的人，也可以作為佐證；他們就是新運動第一應該顧到的。

我們要恢復民族的政治勢力，第一個重要的問題，便是應該先恢復民族自衛的慾望。經驗告訴我們，對外政策的建立，以及國家強弱的判別，根據於現有的軍備者少，而根據於民族的顯著或是潛蓄的抵抗力者多。因為同盟條約，是人所締結的。而不是由武器所締結的。因此，像世人都認為英國人的指揮和精神，很是果敢堅毅，那麼我們仍將把英國民族看成是世界上最有價值的

同盟者。因為他們一經奮鬥，就立刻決定殫精竭力，不惜時間和犧牲，來達到他們所期望的最後勝利。從這地方，就可以見到一國的軍備，不必隨時和他國成任何比例。

要把德國的自治國家新運動再建起來，必須要集中力量，獲取群眾的擁護。我們所說的「民族的資產階級」，是絲毫沒有希望，而且很缺乏愛護民族的熱忱，凡是對內外強有力的民族政策，無疑地，必定要為他們所反對的。德國的資產階級，他們很是愚昧無知，在自由解放之前，曾用消極抵抗的態度去反對畢士麥；因為他們素以怯懦著名，所以我們也不用去怕他們有了那樣的積極反對。

但是，就國內一般具有國際同情的群眾而論，那情形又不同了。不但他們的本性傾向於暴橫的觀念，就是做他們領袖的猶太人，也是愈來愈殘暴了。

除此以外，凡是一種運動，出於自衛動機的，必定要被那些背叛民族的黨魁所反對仇視。如果日耳曼民族要恢復過去的地位，必須要首先制裁這輩禍國的罪魁，在將來的法庭之中，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月的事件，將不再作通常的國事犯來審判，而作為背叛民族的大罪來審判。

因此，不論是那樣恢復德國人的獨立理想，必定和恢復民族堅強意志有着不可分離的關係。在一九一九年的時候，我們已經看清楚新運動的主要目的，就是必須喚醒群眾的民族觀念。從策略上說，有下面的許多要求，由此發生。

(一) 要使民族運動能夠吸引群眾，就應當不惜任何重大的社會犧牲。但是，運動的目的，

既在爲德國民族而喚醒德國的工人；那麼，當民族生活的維持和獨立，還不會受到威脅的時候，經濟犧牲，自然還不會到達必要的時候。

(二) 要使群眾民族化，決不能用敷衍的手段，或是客觀的和平表示，所能成功的；惟有毅然決然地把全力集中在這種目標上。大多數的民衆，他們並不是大學教授或是外交家。一個人凡是要想得到民衆的擁護，必須知道用那一種的秘鑰，才可以去啓發民衆的心靈。此種秘鑰，並不是一種客觀的力量，而是一種決心和毅力。

(三) 如果我們爲了自己的目的，積極指揮着政治鬭爭，同時再努力於消滅敵人，我們必定能夠獲得群眾，這是毫無疑義的。群眾不過是自然的一部分；如果去和那目的相反的人握手言歡，這決不是群眾所能懂得的，他們只知道強勝弱敗而已。

(四) 如果要使某一階級列入於民族的全體，或是納進國家，這方法並不在貶抑上等階級，而是在提高下等階級。但是擔負這種責任的，決不是上等階級，而是正在爭取平等權的那個階級。現在的中等階級，他們能得參與國事，並不是憑藉貴族的幫助，是靠着他們自身的實力，以及他們領袖的領導。

要使現在的工人，去接近民族主義的國民團體，其中最大的障礙，並不是階級的利益，而是國際領袖的態度，因爲這輩國際領袖，他們仇視着民族和祖國的。那些工會，對於政治和民族，如果具有狂熱民族觀念的話，那麼工會可使無數的工人，一變而爲民族中最優秀的分子，並且和

各處純粹的經濟鬭爭，完全是沒有關係的。

倘使一種運動，要使德國的工人傾向於自己的民族，並且對瘋狂的國際主義，加以鄙棄，那麼，必須切實反對那些大僱主所取的態度，因為僱主把民族的意義，認為就是雇工在經濟方面應該屈伏於僱主之下的。

如果工人不尊重公共的幸福，不維持民族的經濟，只知靠他們自己的強力，橫肆要挾，那麼他對於民族所犯的罪，實不下於僱主以殘酷的剝削手段，去蹂躪民族的勞動力，從他們的汗血中去榨取厚利。

因此這個新興運動的同志來源，第一便是工人團體這種運動的任務，是在使工人們脫離愚妄的國際主義，從貧困的社會之中，使他們解放出來，從他們低落的文化之中，把他們的知識增高起來，且能在團結、完善，和充滿民族感情及熱望的社會中，成為一種主要分子。

實在，我們的目的，並不願意在民族的壁壘之中，掀起變動，而是要使反民族派的人員，改變他們的態度，來信奉我們的主張。整個運動的方針，對於這原則是極關重要的。

這種一貫而明顯的態度，必須要表現於我黨的宣傳之中（這態度是宣傳者必須具有的；）宣傳的內容與方式，必定要能夠感動群眾；並且再觀察其實際的成績是怎樣，那才可以測驗這種宣傳是否正確。在群眾的大會之中，效力比較最大的是演說，然演說並不在能感動知識分子，而是在能投合群眾的意思。

要使政治達到改革運動的目的，我們決不能單靠苦心勸導，或是感化當局的方法便能達到的。唯一的方法，便在奪取政權。

然而僅僅把政局變動一下，因而取得了行政權，這仍不能認這種「苦跌打」(Coup d'etat)爲成功的。必定要使革命的根本目的和意志，完全實現；而且爲民族所造的福利，較舊時代使大家所受的爲多。一九一八年的秋季，像盜匪行爲的德國革命暴動，根本還不足以語此。

但是，假如奪取政權，是實現改革的前提，那麼把改革作爲目的的運動，在開始的時候，便應爲民衆運動，而非文人的茶話會和遊藝會。

這個新興的運動，在本質和組織上，是對議會加以反對的，但是，在原則以及和黨的組織上，便否認取決於多數任何的原理；這個原理的含義，謂領袖如果是僅僅維持秩序和執行他人的命令和意見，那是對於他的身價有損的。依照新運動的主張，不論事件大小，領袖是具有絕對的威權，並且還負有完全的責任。把這種原則去貫徹於全黨，並且再推行於一國，那就是新運動主要任務的一種。

最後，這種運動，認爲它的任務，並不在恢復那一種特殊形式的政府，而去反對其他的政府，它是在創立民主政權和君主政體所依着維持的基本原則。它的使命，並不在建立一個君主政體或是一個民主政體，而是在創立一個日耳曼的國家。

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並不是一個原則上的問題，而是一個是否便利的問題。最優良的組織

，須使領袖和黨員間的隔閡盡量減少，因為組織的使命，是要把一個確定的理想，常在一般人的腦中創造的——輸入民衆的腦海中，而促其實現。

在黨員增加的時候，必須要成立支部；這支部便是在將來政治團體中各地的細胞組織。

這種運動的內部組織，應當依照下列的綱領：

首先，把全部的工作，集中於慕尼黑一地。訓練忠實黨員，並建立學校，以便爲這種理想作將來的宣傳。把現在這裏所得的顯著成功，作爲將來取得必要權威的手段。

在慕尼黑，中央領袖的權威，已經得到絕對的公認之後，於是再來成立地方支部。

做領袖所需要的威望，不但是意志，並且是才能；由才能所生出的力量，較之由純粹的天才所生出的力量，更爲重大。把才能、意志、和堅忍三件事，完全集於一個人的身上，這人便是良好的領袖。

一種運動的未來，是有賴於從事運動者的狂熱（甚至是偏激），他們把這運動當作唯一的正當運動，且極端反對那性質相似的其他組織。

如果說，一種運動和他種運動聯合起來，便可以增強力量，這實在是一個極大的錯誤（雖然這種運動的目的也許是相似。）我向來承認運動次數的增加，便是範圍的擴大；但是，那些淺見的人，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以爲就是勢力的增強；其實，徒使這運動的本身，孕育着衰弱的種子，到後來才發現而已。

凡是一種理想所寄託的，無論什麼組織，它的偉大，就是在於它的宗教熱狂，和那不能容忍

的固執精神，他們攻擊其他的組織，並且堅信着人家都是不對的，祇有自己才是對的。如果理想的本身合理，並且加以這種武器，那麼，這種理想，奮鬥於世界之上，必定是所向無敵的。凡把壓迫加之於這種組織，那是恰好使其內部的實力增加。

基督教的偉大，並不在於委曲求全，而使教義和古代類似的哲學思想相調和，是在於他們對於本身的教義，努力於堅決和狂熱的宣傳，以及辯護本黨的同志，加於民族敵人的一切仇視，以及這種仇視的表現，用不到驚奇，看作這似乎是常而當然的事。因為謊言和誹謗，根本和這種仇視的表現，是不能分離的。

不論是那一個，凡是不受猶太報紙的攻擊、誹謗和誣陷的，那麼，這人便不是真正的日耳曼人，不是真正的民族社會主義的信徒。欲判斷他的意見價值，信念的確立，以及意志的強弱，完全可用我們民族的公敵，對他所示的仇恨，來做最適當的標準。

我黨必須竭力從種種方面去提倡尊重人權，並且還須牢記着下列各點：人類的一切價值，完全是寓於人格之中，每一個理想，每一件事的成功，便是一個人的創造結果；崇拜偉大，不僅是對於偉大的羨慕而已，而且是團結一切羨慕偉大者的連鎖。實在，人格是沒有什麼東西可以代替的。

我黨在運動的初期，因為聲名未著，所以常常被人忽視，因此曾感受到極大阻礙，能否成功，便成為極可疑問的了。凡是一切有牽涉我們的事，民衆是什麼都不知道的。在慕尼黑，除了少數的黨員，和極少數的熟人以外，竟沒有人知道我黨的名稱。因此，要擴充這一個小小的集團，

吸收新的黨員，使我黨的名稱傳聞於世，爲當時的要務了。

爲了這緣故，我們便每月開會一次，後來每兩星期開會一次。開會的通知書，一部份是用打字機印成的，一部份是用手抄寫的。我記得有一天，我親自送出去的通知書有八十份之多，當晚，我們就鵲候着群衆的駕臨。把開會時間延遲了一小時以後，出席者還僅只七八人；於是主席宣佈開會。但是開會以後，也不曾有人繼續來到。

於是我們幾個窮人，大家來捐集一些微款，設法在當時獨立的慕尼黑觀察報（*Munchener Beobachter*）上刊登了一個開會的廣告，這一次竟獲得了意外的成功。

我們預先租好了一間屋子作爲會場，到七點鐘的時候，出席者達一百十一人，於是立刻就宣佈開會。先由一位慕尼黑的大學教授致詞。次由我來演講，我演講歷時三十分鐘。我久已自己感覺到演講的天才。不過不敢確定，這一次便證明了。在三十分鐘之後，這一間小廳中的觀衆，經了我的激勵，大家極爲興奮，彷彿像是受到了電流般的，竟會因了我的演詞而使他們自願來捐助三百馬克，作爲會中的一切費用，這件事實在使我的心中大爲安慰。

在當時，我黨的主席哈勒先生（*Herr Harter*），原本是一位新聞記者。此人學識淵博，但是，可惜缺乏做黨魁的能力。他不能同群衆作講演，他的工作雖然確切謹慎，但是因爲缺乏說話的天才，所以沒有特別動人的力量。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rexler*）在當時是慕尼黑地方支部的主席，他僅僅是一位工人，既不是演說家，又不是軍人。而且他從來不會

在戰場上服役過，他除了生性優柔寡斷之外，又不曾受過剛毅果敢的訓練。因此，他們兩人，對於不論那一種運動，都不能使人發生狂熱的信仰，而獲得成功。

我本人在當時仍舊是一個軍人。

凡是一種運動，它所標榜的目的，如果是在博取群眾的擁護，那麼欺騙民族的馬克斯派，必定對它要有所仇視，因為群眾向來不去聽命於國際馬克斯主義，和猶太交易所的許多黨派。「德國工人黨」之名稱，它的本身，就是富有刺激性的。

一九一九年整個的冬季，我們的奮鬥，就是在鞏固新運動制勝力的信仰，並且使之成為狂熱而有移山倒海的力量。

在達好埃兒街（Dachauerstrasse）「德意志」（Deutsches Reich）大廈的聚會，又證明了我的主張是不錯的。當時出席的人數，已經超過了二百，我們在經濟上，以及和民衆方面的成功，那是十分光榮的。十四天後，到會者的人數，已經超過了四百人。

我們這個新興的黨，所規定的黨綱中，不用「民意」（Volkisch）一詞，這是很合理的。因為這一個字的概念，漫無限制，那種表示，不能作為任何運動的基礎；而且對於這一個名詞所隸屬的人，也是沒有一定的標準。因為概念在實際上是模糊的，而且解釋紛歧，意義廣泛，被人濫用，是有着很大的可能性的。如果把這種含糊不定，解釋紛歧的概念用之於政治鬭爭，那麼，勢必破壞了鬭爭中有着共同目的的團體。所以要達到這種目的，決不能任由各人去自行決定其

志願和信仰的。

我鄭重地警告，這個新運動，不要墜入所謂「靜默工人」的陷阱中。他們不但是懦弱卑劣，並且還無能、懶惰。一個人能夠十分明白一件事的危機和補救方法的，他們責任並不在「默然」着去工作，而在公然的剷除罪惡，力謀補救。如果他在這方面遭到了失察，他便是一個不幸的疏忽職責的弱者；這位不是由於懦弱，却是由於懶惰和無能。這大多數的「靜默工人」，通常所做的事，真使人莫名其妙。他們既是毫無能力，還要用飾詞來欺騙世人；他們既是懶惰不堪，還要自誇他們的靜默工作，使人認為他們是十分勤奮的。總而言之，他們的欺世盜名，實在是政治上的投機份子，而且還仇視他人誠實的工作。不論任何的煽動家，他如果有勇氣在酒店中和他的敵人對抗，毅然地為自己的意見申辯，那麼，僅僅這一個人的影響，已經勝過一千個鬼鬼祟祟，而狡猾的偽君子了。

在一九二〇年初，我就堅持着要舉行第一次群眾大會。那時我們黨中的主席哈勒先生不贊成我所定下的時間；他就自動辭職了，於是由安頓·德萊克士勒先生（Herr Anton Drexler）繼任。我自己則擔任宣傳工作，努力進行。

第一次的群眾大會，我們定於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舉行，當時我黨還不大著名，我乃親自安排一切。

我們選定了一種紅色，因為這種顏色最能惹人注意，並且還能使敵人受到一種刺激，給他們

一個深刻的印象。

七點半鐘開會，在七點十五分鐘的時候，我走進慕尼黑卜拉茨爾（Platzl）的霍夫布洛伊大廈（Hofbrauhaus）的禮堂，真是快樂得心花怒放。在禮堂（當時我對這禮堂覺得很大）中擁擠不堪，容有近二千人的聽衆。

第一個演說者說畢了，我就接着起來演說。在幾分鐘之後，有一部分聽衆對我鼓噪，禮堂中當場發生了騷動；少數的武裝同志，和其他的黨員起而加以制止，並設法使秩序恢復。於是，我乃繼續的講演，在半小時之後，喝彩的聲音，已壓倒了喧嚷和叫罵的聲音。最後，我把二十五條逐條的解釋，禮堂中在我前面的群眾，已經一致的有了新覺悟、新信仰、和新意志。熱情燃起了烈火，烈火煉出了寶劍，決心爲德國的西格弗里特（Germanic Siegfried）恢復自由，並且爲日耳曼民族恢復生命。

在下部中，我將把決定黨綱的原則，詳爲敘述一下，那般所謂知識階級的人，他們吹毛求疵，曾經給我們以訛笑和揶揄。但是，我黨黨綱的成效，業已充分證明我們在那時的見解是正確的。

第2部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

第1章 世界觀與政黨

一種新的運動，第一要能夠貢獻一些新的世界觀，不專門替政黨作選舉號召；倘使運動開始的時候，這種高尚的信念，不能深入黨員的內心，那麼，這種新運動在從事於偉大奮鬥的時候，必定難於得到所需要的權力，這是十分明顯的。

各黨的黨綱，屢次的加以修改，在這時候，一切卑劣的動機，往往就反映了出來，這是我們必須切記的，通常各政黨所以採用新黨綱，或者是改變舊黨綱者，他們的動機之一，便是顧慮到下屆的選舉而已。

議會選舉結束後，議員獲得了任期五年的高薪。他們便每天早晨到醫院去，議員未必入內辦公，可是簽名畫到，那是天天如此的。議員如果是爲民宣勞，天天簽到，那麼，他所領的薪俸，實在是應得的報酬。

天下事情最令人懊惱的，莫過於親眼看到議會辦事的真相，以及他們層出不窮的欺騙。議會制度，決不能增加小資產階級的實力，來抵抗馬克斯主義的有力組織。那些議員們，對

於這一點竟未曾深思熟慮。

凡是傾向於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政治鬭爭的目的，純粹是爲了各人奪取國會中的議席；至於信仰和原則，那是可以隨時拋棄的。所以他們對於黨綱的決定，和力量的估計，也都是依照這種旨趣爲依歸。這樣的政黨，決不會有號召民衆的魔力，因爲要感動群衆而吸引群衆，惟有以偉大高尚的理想，以及堅定不移的信仰，和大無畏的精神相結合，這才能達到目的。

當敵方用最兇惡的武器來破壞固有的秩序時候，另一方面想要尋求抵抗，那祇有建設一種新的信仰（就以我黨而論，便是一種政治上的信仰）放棄怯弱的防守態度，而改取一種勇往直前的攻勢。

「民意」（Volkisch）的概念，恰好像「宗教性」一語一樣的，漫無限制，解說紛歧。這兩個名詞，都含有某種基本的信仰。兩者雖然都屬重要，然而涵義空泛，必須使其成爲政黨組織中的基本元素之後，才能承認它們的價值。這是一種差強人意的見解，人類不能單靠感情來實現改革世界的理想及其要求，正和不能單靠普遍的渴望，以爭取自由是一樣的。尋求獨立的理想，必須要有武力的組織，而後民族的願望才能得到圓滿的實現。

不論那一種世界觀，雖然是萬分正確，有益於人群，可是，在原則上如果不是以武力奮鬥作爲基礎，那麼就不足以建設起新國家來；而且不是等到奮鬥已經獲得了勝利，和黨中的信條已經成爲國家的基本新法律的時候，這種奮鬥的運動，也不能自成一家。

一般人對於政治的見解，大都具有下述的觀念：創造力和教化力，這是國家必須具有的特性；國家是經濟上必然的產物，充其量也不過僅是政治力的自然結果，和種族問題是沒有什麼關係的。這種基本見解，如果加以推闡起來，不僅要使人誤認種族的原動力，對於個人的價值，也將無從去加以評斷。如果把各種族創造文化能力的差異，來加以否認，那麼，判斷個人的品格，自然也必定發生荒謬。假使一切種族的性質相等，那麼一切民族，甚至至於個人，都沒有區別可說了。所以，含有國際性的馬克斯主義，他的本身，不過是一種普通的世界觀（比說由來已久，）經過猶太人馬克斯刊行於世，於是便成為政治上的信條。這種學說，倘使不用毒惡的手段來作為基礎，那麼在政治上決難獲得成功。馬克斯僅僅是千萬人中的一人，他能夠用預言家的眼光，認識這腐敗世界中的主要毒物，用巧妙的方法去提取而製成濃厚的毒液，以迅速地去毀滅世上一切自由獨立的國家。馬克斯的所以如此，那是為了謀取猶太種族的利益而已。

因此，馬克斯主義便成為現在普遍流行於知識份子的世界觀了。

亞利安種族的存在，實在和歐洲社會的文化及文明，有着密切的關係。倘使有一天亞利安種族消滅或是衰微了，那渾渾噩噩的黑暗時代，勢必再重現於世。

無論那一個人，如果用民族主義的眼光來看世界，凡是要消滅人類的種族，因而使人類文化有了破壞，這是應該認為是一種罪大惡極，無論那一個人，他如果敢打倒天之驕子，那就是他違背天意而自絕於天國。

在遙遠的將來，我們都深切的知道，人類必須要應付這種種的難題；到了那時，最高貴的民族，必定做着世界的盟主，而且受着萬國所擁戴。

不論在什麼時候，世界觀的建立，必須把它的理論明確的宣布於世。醞釀中的政黨，它的黨義和黨的關係，恰好是像教義和宗教的關係。所以民族主義的世界理論，應該鍛鍊成一副工具，以作武力的防禦——恰好是像馬克斯主義黨趨於國際主義一樣。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便是以此爲其努力的目標。

我知道我的特殊任務，就是在從那些龐雜世界觀的材料中，去抉擇它的中心思想，而使這中心思想成爲簡明扼要，類似教義，這樣，必能使所有的信徒精誠團結。換一句話說，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須要適合於民族世界觀的重要原則，而且須注意於實事求是，審時度勢，顧及人類的才力和弱點，把這種原則，變成爲政治的教條；當這種方法已經使群眾達到嚴密的組織時候，這種政治教條，必定是世界觀最後勝利的先決條件。

第2章 國家

一九二〇——二一年間，小資產階級中的人士，他們大家都責難我黨的新運動，說我黨對於國家是抱着反對態度的，所以各黨派的政客們，大家都主張採用種種方法，來撲滅這新世界觀的理論戰士。他們有意把小資產階級來忘掉，而在小資產階級中的所謂國家，已經不是純一的組織；「國家」這個名詞，並沒有一定的定義。各黨派的政客，他們大家漠視這種事實，大家都置之不問。然而在我國國立高等學校中的法律教師，他們在講解國家法律的時候，無非強詞奪理，對於參養他們的中樞，解釋他是有存在的必要而已。一個國家的組織愈是不良，那麼世人來解釋他的存在目的，也愈是奧妙而愈難解釋。譬如，生於二十世紀最惡劣畸形國家中的大學教授，他們要暢所欲言來說國家的意義和目的，這豈不是一件難事嗎？

德國的人民，大抵可分為三派：

第一派，他們把國家看作是人民自動結合，而受治於政府的。從他們的眼睛裏看起來，國家的存在，是神聖不可侵犯的。他們因為要貫徹這一種瘋狂謬妄的思想，所以甘心去俯首貼耳，來尊重「國家的威權。」因此，在一反一正之間，他們立刻把手段變成目的，政府不復再是為人民服役的公僕，人民反以崇拜國權為人生的目標，而官僚便是此國權所庇護。

第二派，他們不相信以樹立威權為國家唯一的目的，國家也應當計及國民幸福的增進。這一

種國家觀念，錯誤在含有不大正確的「自由」思想。實際上，一種政體，不能因其存在的緣故，就說它是有着神聖不可侵犯的理由；到底它適宜與否，還須加以考核。我國純正的小資產階級，尤其是自由民主黨人，都贊成這一種主張。

第三派，人數最少。這一派的主張，聯合語言相同的民族，去實現一種空泛的武力政策，國家不過是實現這一種政策的媒介而已。

最堪痛心的，就是在近百年來抱着上述各種見解的人，喜歡濫用「日耳曼化」的一個名詞。我還能想到當我在少年時代，這個名詞，竟怎樣的引起驚異的錯誤觀念呢。曾經聽到『汎日耳曼』一派人的建議，說是如果得到政府的助力，那麼奧地利斯拉夫人民的日耳曼化便可實現了。

真是出人意料之外，有人以為一個黑種人，他們因為學過德文，而且終身講着德語，並且為德國的某政黨投票，就可以變為德國人。然而我們不能想像他是能變為德國人的。

這種辦法，實在就是種族混雜的開始。從我們的情形看起來，這並不是日耳曼化，實在是日耳曼成分的毀滅而已。

民族或是人種的鑒定，在乎血統，而不在乎語言；倘使能夠改變人種的血統，然後才能說到同化。但是血統的改變，勢所難免，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把血統混合；要是真的這樣了，那麼，優秀種族的品質，必至低落無疑。

從歷史方面來觀察，我們的祖先，用武力來征服這一塊土地，實行日耳曼化，這是大為有益

的；因爲定居在這地方的，大都是德國的農民。如果一朝引進了異族，亂了我們的血統，那就要有不幸的結果發生，這結果就是使我們的民族性毀滅殆盡。

我們須有這一個根本的認識，國家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國家雖然是形成人類高等文化的基礎，但是，國家並不是創造文化的原動力。能夠創造文化的，仍舊是賦有天才的種族。世界上儘管有不少模範國家，但是，保持文化的亞利安族，如果一朝衰退了，那麼現在的最高民族文化，也將不復存在。我們可以進一步來說，倘使人類的高等智力和適應能力，因爲沒有種族爲之護持而致喪失，那麼國家雖由人民來構成，豈能防止人類爲之滅亡？

國家的本身，並不能產生一定的文化標準；國家僅能把決定這項標準的種族，集納於一處，所以產生高等人類文化的必要條件，並不是國家，而是優秀的種族。

賦有文化和創造天才的國家或是種族，即使因爲環境惡劣而不能發展，但是，他的才能，仍舊是潛伏在這種族之中的。所以，如果說紀元前的日耳曼人，是一種粗野的蠻族，實在是十分荒謬的。我們的祖先，是一種文明的種族，決不是蠻族，他們聚居於氣候嚴寒的北國，環境把他們束縛了，使他們的創造性未能發展。假使沒有古代典型文化專美於前，而我們的祖先得宅居於環境較優的南方，利用那些劣等民族最初所用的器械以謀進展，那他們的創造文化的潛力，必定能夠表現於外，因而產生燦爛的文化，與希臘文化先後輝映。

民族國家，所努力的主要目的，在保存種族原有的一種特質；這種特質，是利用學術的傳播

，因此，就能造成燦爛的莊嚴文化。我亞利安族，必須認定國家是一個具有民族性的有機體，它的使命，不單是僅在保持固有的民族，而且還須繼續着培養它的智力和想像力，使它達到最高的自由境域。

現在，我們的國家受到壓迫，乃是人類極端錯誤的結果，將來的後患，是談都談不完的，世間一切的人，因為我們的思想，就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黨員，認為是亂黨，對我們橫加誣讎，這是我們並非不知道的。然而，我們萬萬不可因為一時的毀譽，就改變自己的思想和行動，必須堅決服膺我們所認識的真理。我們可以確信後世的人，他們不僅要諒解我們現在的行動，並且還要認為合理，而加以推崇呢！

這是我們必須加以牢記的；國家的重要使命，完全寄託於民族中；國家的責任，只是在利用它的組織力，以求達到促進民族的自由發展。

可是，我們試問一下，德國人所需要的國家，究竟應該怎樣組織？要回答這一個問題，必須先明瞭國家的旨趣，究竟是在容納那一種人民，和完成那一種目的。

但是非常不幸，我民族的中堅組織，它的種族成分，已經不純粹了。各種複雜的成分，還沒有完全融化，我們便不能斷定德國的民族，是一種新民族。反之，從三十年戰爭以來，德國的民族，因為血統混淆所受的毒害，不但摧毀了我們的血統，並且還摧毀了我們的靈魂。我國的四境，門戶洞開，四鄰的異族，不時從邊陲徙居於內地。外力的侵襲，繼續不斷，實在沒有方法，可

以使我們的血統能夠完全淨化。

凡是血統單純的民族，他們都具有合群性，能夠在民族危急的時候，共同一致的起來禦侮救難；可是，德國人就缺乏這一種天性。這種缺陷，使我們受害很大，因為德國的民族缺乏合群性，所以國內群雄，大家割據一方，各自為政；結果，把德國民族自主的權利，完全剝奪得沒有了。

一個有生命的國家，應當以實施較高的理想為職志，而去代替毫無生氣的，只為它本身圖謀生存的組織。

德國應該依國家的權能，把一切德國人團結起來，還須從日耳曼的民族之中，選擇原有的優秀分子，加以維護；更須慢慢地使它取得統治的最高地位。

自然，現在統治我們國家的官吏，他們是樂於維持現狀的，他們決不願為了未來的幸福而去奮鬥。在他們的眼中看起來，國家好像是一架機器，單為維持他們的生活而存在，所以他們常常愛說他們的生命是「屬於國家。」

照這樣看來，我們果真為這新的理想（這種理想和事物的原義，是完全符合的）而去奮鬥，那麼，在這些行屍走肉的無用人群中，所得的同志，必定是寥若晨星。祇有國內的那些頭腦清新，而有着壯志的人，願來和我們攜手，那些因循苟安的人，是根本談不到的。

我們必須記住，如果把一個民族中，少數出類拔萃的英俊，完全團結在同一的目標下面，並

且擺脫一切羣衆的惰性，那麼，這少數出類拔萃的英雄，必定可以成爲多數人的領袖。世界歷史的造成，完全是少數人，因爲這少數人，他們實在具有最多的民族意志與毅力。

因此，有些事在多數人看起來是不利的。實際上，就是我黨勝利的必要條件。我黨的事業，是那樣的繁重艱鉅，所以加入我黨而去共同奮鬥的，多數都是些驍勇的戰士，這才有希望。我黨成功的保證，必須在選擇優秀的戰士上面。

如果說異族雜交後，較高的民族能夠保留他們固有氣質的話，那麼，那些雜種，遲早必致衰亡。如果說文化較高的種族，因爲雜交而失去他們固有的氣質，那麼，那些雜種，必定不會有滅絕的憂慮。復興民族的程序，是在因勢利導，就是緩進也無不妨。不過我們必須名定我們的基礎，這種程序，才能慢慢地驅除敗壞我種族的毒素。不過，這是假定基本種族的品質還存在，而血統的破壞，已受到制止以後的話。

民族國家的第一急務，就是在於改進婚姻制度，使它免在種族上永久的留着污點，婚姻必須看作是神聖的制度，用以創造像神的人類，而不是創造半人半獸的性物。

站在所謂人道主義的立場上，出而反對上面的主張；他所持的論點，是和時代不合的。因爲吾人所處的時代，一方面既是允許腐化份子繁殖子孫而貽害當代，流毒後世；一方面又允許藥商小販，向健康的父母去兜售節制生育的藥品。在這自稱秩序井然的近代國家中——就是當這民族中的小資產階級雄視一世的時候，——像防止身染梅毒、肺癆、和其他的遺傳病的人，以及殘廢

、白痴等人的生育，常常看作是一種罪惡；反之，如果有幾百萬健全的國民，他們實行節制生育，那就不算一回什麼事，不認為違犯了社會的道德；從他們這種淺陋的思想上看起來，反而可以引為沒有頭腦人的安慰。不然，他們勢必要憂慮：怎樣去保護民族的健全份子。以後的健全份子，對於他們自己的後代，亦應該擔負起同樣的職務。

理想和榮譽，在這個制度是多麼的缺乏呢！世人大都得過且過的因循度日，不想去改革，不肯為後世去培植最優秀的人才。

民族國家的責任，就是在補救現在所怠忽的一切事業。民族國家，必須使種族成為全民族生活的中心，設法使他保持着種族的純潔。民族國家，必須認定兒童是民族的無上寶貝。民族國家，祇許康健的國民生育子女；而把病人或是殘廢者的生育，認為可恥。如果他們能夠制止病人或是殘廢人的生育，那是很光榮的一種舉動。反之，凡是剝奪民族的康健的兒童，就應該加以痛斥。國家應該把極新式的醫藥，來供給這種公認的用途。凡是患有疾病或是有遺傳病的缺陷人，國家應該宣佈他不宜生育的理由，並且來實行加以禁止。國家又當注意康健婦女的生育，以免因窮困而受阻礙，因為窮困常使人看作生育並不可喜，反而是父母的累贅。

國家教育國民的時候，應該使他們明瞭疾病和衰弱，並不是可恥，實在是不幸。倘使把自己的不幸，去累及無辜的兒童，那麼，這不但有罪，而且是可恥了。如果有一個患有殘疾而思想純潔的人，他願意放棄他的生育權，並且把他慈愛的心，去給予毫不相識的貧兒，而這貧兒的先天

健全，將來可以做強健的國民，這就可以說是高尚人格的表現，那是值得加以敬佩的。國家從事於這種教育工作，尤應該注意於知識方面的實際啓發。這種工作，不問人家是否能夠明白，是否受人歡迎，國家理應毫不顧忌地力行不懈。

民族國家中的民族意識，必定能夠創造出一個光榮的時代，到了那個時候，人類不會再去用全力注意於馬、狗、貓等的種類改良，而注重於提高人類的本身；到了那個時候，世界上的人，或許因為知識上的覺悟，而毅然放棄他的生育權了；或是甘心犧牲自身，而使他人有利。現在的人，因為遵守教條，而甘心抱獨身主義，在這世界上竟不知有千千萬萬，那麼，將來毅然放棄生育權的事，並不是絕對不可能的。

如果一時代的人，他明知自己有着某種的缺陷，而竟諉稱沒有補救的方法，而苟且圖安，那麼，這種社會，斷無僥倖之理可言。我國的小資產階級，現在便是這樣。

我們不再被他們欺騙了。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人士的腐敗，現在已經達於極點，他們決不能擔負任何的文化事業，我以為他們的腐敗，並不是由於他們的道德墮落，而是由於他們的懶惰成性，積重難返。所謂政治團體，概稱之為小資產階級的政黨，他們早已變為特殊階級和職業的代表團體。他們除了盡力去維護他們本身的利益外，對於其他的事，差不多是不去顧問的。我國的小資產階級之政治團體，他們絕對的不適宜於奮鬥，如果對方是強暴堅決的無產階級，不是小心審慎的商人，那就更不適於奮鬥了。

國家的責任，是在把青年鍛鍊成一副有用的工具，去發揚未來的種族。要達到這個目的，國家舉辦教育事業，首先應該注重國民身體的鍛鍊，而並不單是知識的灌漑。因為有了強健的身體，然後才能使他的智力發展。國民性的陶冶，也是應當注重的，尤其應該獎勵意志毅力和責任心的培養，最後乃授以純粹的科學知識。

一個國民，如果他有健全的體格，堅定性情，並且還富於自信力和意志力，那麼他雖然僅僅受的是普通教育，實際上他比學識湛深，而體質虛弱的人，更能造福人群。這一點，國家是應該知道的。

所以在民族國家中，國民的身體鍛鍊，既不是他個人的問題，也不是僅僅和他們父母有關的問題，更不是和社會沒有多大關係的次要事件，實在是保持民族的要素，國家是應當加以護持的。教育的工作，國家應該好好的分配，應該使青年男女在童年時代，就受到相當的嚴格鍛鍊，養成他們具有耐勞耐苦的體格。這是政府應當特別加以注意的，萬物造成那些「足不出戶」的無用國民。

民族國家的一切學校，應該增加運動的時間，使大家去做身體的鍛鍊。不論在早晨或是下午，兒童們每天至少應該有一小時的體育訓練，遊戲和體操並重，拳術一項，有許多國民看作粗暴無用，實在是絕不可少的。號稱曾受教育的人士，他們對此多持一種謬見，這是殊難費解的。如果青年練習劍術，以為決鬪之用，他們便視為高尚；如果練習拳術，他們便認為粗暴，這種理由

，究竟在什麼地方，須知拳術一項，最能使人鼓勵起戰鬥的精神，養成一種靈敏的決斷力，並且能使身體順應自如。倘使青年用利劍來解決爭端，那比拳鬪，不是更加粗暴嗎？

假使我國的知識階級，能夠把他們注意虛文的時間和精神，來注意拳術，那麼一切暴徒叛黨式的德國革命的騷亂，或許不會發生了。因為騷亂之來，實在是為我國的高等教育不知培養普通的人才，祇知道那些官僚、工程師、化學家、法學家、文學家以及保存這種知識的大學教授。

在知識方面的成就，我國往往有出人頭地的地方；然而對意志力的培養，那就不足一評了。

我們日耳曼民族，現在已經陷於崩潰沒落之中，到處被人加以唾棄，所以國民必須由自信力去產生自覺力，才能挽救危亡。這種自信力必須要自幼培養成功。青年所受的教育和訓練，應該要造成惟我獨尊的一種自信力。同時青年必須由體力和武術方面發生信仰，確信他們的民族，是不會被人征服的。因為德國軍隊早先的勝利，完全是靠着他們個人的自信，而且能夠共同信仰他們的領袖。惟有這一種信念，才能替德國的民族爭回自由，並且恢復過去的尊崇地位。然而，這必須有待億萬國民，都具有一種同感，然後這種信念才能產生出來。

關於這一點，請大家不要誤會，因為我民族的腐化既很厲害，那麼將來要圖恢復，亦必須有極大的力量，才能消滅這不幸的情形。關於這一點，我們是不容輕視的。惟有整個的民族，團結一致，表現出一種偉大的意志力，專心一致地渴望着自由和懇摯，那我們才能恢復一切的舊觀。

民族國家，具有鍛鍊青年體力的責任，這種鍛鍊，不偉是限於青年的就學期間；就是青年離

開了學校以後，如果他的身體尚在繼續發育之中，仍應加以注意，使他們的發育健全。如果使青年們的學校生活完畢了，國家就中止他的監護權，一直到青年入伍的時候再行加以監護，這真是叫人莫名其妙。國家對於青年的監護，是一種權利，同時也是一種義務，這是永無終止的。

軍隊，是最高和最後的國民教育，並不是單單學習開步走、立正等便算完畢。青年人入伍，自然要學習軍器的運用，同時，亦應注意於未來生活的訓練。從軍以後，青年就變為成人了。不僅須養成服從的習慣，而且應當給予軍事的訓練，俾使他們將來有指揮的能力，不僅須默受正當的責備；在必要的時候，必須能忍受不平而毫無怨言。

一個青年，自己既有充份的自信力，再加上軍隊的團體精神，那他自然能夠確信他自己的民族，是不會屈服於人的。

青年於軍隊服役結束之後，必須有兩種證明書：一種是公民證明書，許可他在一切公共機關中服務；一種是康健證明書，證明他的體格健全，可以結婚。

關於婦女教育，第一應當着重於體育，其次是德育，再其次是智育。婦女教育的最大目的，就是在培植未來的良母。

在大戰的時候。我們常常從各方面聽到指摘國人的不能緘默，常把重要的消息洩漏於敵人。我們不妨先來想想，在戰前的德國教育，是不把緘默作為一個人的美德呢？不，我國現行的教育制度，對於這些是當作不屑注意的瑣事的。在訴訟上的毀謗案件，多是起於不能緘默，因此而耗

去鉅額的訴訟費。言語不慎，每多敗事。我國的國民經濟，時因任意洩漏工業上的秘密而蒙受損失；在國防上的秘密準備，也因爲國民的不知道緘默，而失去效力。在戰爭的時候，國民隨便談論軍事，常常足以使戰事失敗，戰事的結局不良，主要原因還是在於國民的多言。我們須知道，我們的習慣，不在少年時代先行養成，到了壯年，那就不能再行養成了。

現在的教育，缺乏美德的陶冶。今後，我們應當改變方針。誠實、犧牲和緘默三件事，都是偉大民族必須具備的美德。這三種美德的陶冶，實在比現在一切學校中的任何課程都爲重要。

所以民族國家的重要，應把人格的修養，和體格的訓練並重。現在我國的國民，道德上的缺陷，已經根深蒂固，但是，如果能予充實的訓練，即使不能把這種缺陷根本剷除，至少可以大加糾正。

我們國人對於一九一八年十一、十二兩月的處處失敗，每多怨言，說上自國君，下至土官，竟沒有人能夠敵愾同仇，和敵人決心作戰。實在大家都不知道這種可怕的事實，是導源於我國教育的缺陷，在平時大家都不屑去注意的瑣事，現在乃變爲重大的慘禍了。我國現在所以不能作切實的抵抗，並不是軍備的不足，實在是意志的缺乏。國民缺乏意志，積習已深，對於稍有危險性的事件，大都猶豫不前，彷彿任重致遠，用不到什麼膽力的。一個德國的將軍，曾經得到一個公式，很足以暴露這種優柔寡斷的弱點，然而他並不自知；他說：「我在作戰的時候，如果勝利的希望不及百分之五十一，我決不敢動。」這「百分之五十一」便是德國失敗的慘劇主因。

國民缺乏責任心，是由於青年教育的不良；一切的公共事業，沒有不受到這種不良教育的薰染，在議會制度，一種缺乏責任心的弊病，已經是達於極點了。

民族與國家，既須用全力培養青年的意志和毅力，也須養成青年從小就有樂於負責和勇於改過的習慣。

現在世界各國的教育，大都以科學訓練為唯一的目的，而國家民族的教育，應該採取科學訓練而略加修改。修改的旨趣可以分三點來論述。

第一，現在一般學校中的功課，百分之九十五，不是青年學子所需要的，所以把這種課程，強迫灌注於青年的腦中。青年每因不需要而易於遺忘。例如，一個尋常的公務員，也曾畢業高等學校的文科或是理科，到了他的年齡在三十五或四十歲的時候，試問當年所給他注入的知識，尙能記憶多少？

我所說關於學校中的功課，已經足夠為大多數青年國民所享用，如果青年們想再進而去研究一種專門的學問（例如語言），也可據此作為基礎，再依他個人的志願而加以學習。

學校中的學生，對於體格的鍛鍊，以及其他必要的修養，學校中應該定出充分的時間來。

歷史的教學方法，尤其應該加以改良。現在的歷史教學，百分之九十九的實例中，所得的結果，都是至堪痛心的。因為所傳授的不過是一些少數日前，以及生死的時代、和人民、地名而已。至於大綱要領，倒反而既付闕如。他們既不把根本的要點來傳授；僅由那些少數具有天才的人

，去自行發現無數日期和史實中的意義。

歷史教材必須減少。因為我們讀史，並不是單單研究已往的陳跡，實在要去找一種教訓，用以作未來的警戒與民族前途的殷鑑。我們對於古史的研究，也是不可忽略的，就大體而言，羅馬史不但給予現代人以一種良好的訓練，就是推之於百世，也是一樣。民族國家應該加以注意的：我們必須有一世界史的著作，而這著作，是把民族問題列在首要的地位。

由將來從事於職業的觀點，來看我們現在的教育，我們就可知道，出身於三種學校的學生，他們都能從事於同一的職業；從這一件事上，足以證明現在我國的學校——尤其是中等學校，對於學生的未來職業，很少有所籌劃。所以我國的普通教育，比較還算有些價值，而專門教育，那就無足稱道了。凡是一件事，需要專門知識，在我國中等學校課程中，可說是毫無準備。像這類的缺陷，我民族國家，亟應設法彌補才好。

第二，普通教育和專門技術教育，必須要嚴加區別。因為專門的技術教育，既有降為拜金主義的危險，那麼，普通教育，至少在理想上亟應來設法加以補救。工商業和工藝科學，惟有在理想高尚的民族社會中，就是人人不重私利而勇於犧牲，樂於退讓的社會中始能發達，這一個原則，我們當牢記勿忘。

國家到現在，還沒有明確的定義，普通所給予人民的，除了狹義的愛國主義之外，不再有其他的東西了。我國古代的國家觀念，不過是指對於那些王侯等模糊的尊重而言，所以我民族的真

正偉大，始終是不能享受到任何的尊崇。因此，我們的人民，對於德國的歷史，祇有一些極殘缺而不健全的觀念，歷史的要義遂失掉了。在這種情形之下，沒有人能夠真心愛國，那也不足為怪了。

怎樣去使學校的兒童，崇拜我國真正的偉大英雄，而且怎樣去集中國人的注意力於這等人物，以激勵他們敵愾同仇的心理，這些問題國人對之更是茫然不知所以了。

德國自革命以後，那些忠君的觀念，慢慢地熄滅了，教授歷史的目的，祇在求取知識而已。我國現在好像是用不到愛國熱忱，在共和國，愛國心實在也難有持久的力量。如果在大戰期間，以「擁護共和國」口號，來向德國人相號召，那麼，這次的戰事，決不能支持四年半之久。

共和國的制度，極能投合世界各國人的口胃。因為粗暴的人，決不會像怯弱的人，被人所喜，為的是他不能像怯弱者易於受到利用。所以敵人同情我國的政體，實在是出於一種惡意的批評。敵人贊同德國的共和政體，並且任其繼續維持，沒有別種原因，不過是他們想來奴役我民族而已。而這種政體，最能為虎作張的緣故。

民族國家，應該為生存而奮鬥。道威斯（Dawes）的建議，對於我國的自衛，並無任何幫助。我們為民族的生存計，為國家的自衛計，我國所需要的，正是世人所信為可棄的；因為我國的形式和實質愈是完備，而愈有價值，那麼，敵國對我們的憤恨和仇視也愈深。國家最好的屏障，是公民而不是武器。國家所賴以自衛的，不在堅固的堡壘，而在舉國一致男女的愛國心。

第三，就是科學教育：民族國家必須把科學看作是增進國家榮譽的一種工具。這不單是教學世界史，應當依照這種觀點，就是文化史，也是如此。發明家所以偉大，並不是因為他是一個發明家，實在是因為他是我們的同胞。一種豐功偉業，能夠受人稱贊，這是因為他是建樹我民族的一員，所以他可以引以自豪。我們應該把德國歷史上最偉大的人物來曉示青年，給青年一個深刻的印象，使青年們成為愛國思想的支柱。

民族主義，決不可有階級偏見，一民族之中，必定要沒有可恥的階級，才可以誇示於人；反之，如果一個民族之中，大半飢寒交迫，愁苦不堪，甚而至於墮落，那麼，情形既是這樣，還有什麼可以向人誇耀的地方呢？我們必須等到整個的民族，處處地方都健全了，而後我們的人民才可以表示屬於這一個民族為光榮，就是我們所說的「民族的光榮」。但是，這種榮譽，祇有在人民知道民族偉大的時候，才能獲得。現在，大家都駭怕和人家發生衝突，這就是一種民族的懦弱表現。

不肖說，這世界確實在劇烈的急變之中。變化的結果，究竟是亞利安種族的福利，抑是猶太人的福利，這實在是一個問題的焦點，所以民族國家的重任，就是給予青年以良好的教育，使種族得以保存，使能夠適應世界上最後而又最大的決鬭。那得到最後勝利的，必定是先發制人的民族。

從種族的觀點看起來，這種青年的教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來完成，恰恰像德國尋常的國民教

育，應該以軍事訓練作爲最後的階段。

國民的身體和智力測驗，雖然應被民族國家所重視，然而優秀國民選擇，也是同樣重要的。現在的人，對於這事件的措施，每多輕率。照例，處境富足上流社會的子女，他們較宜於去受高等教育。至於天才問題。還在其次。因爲所謂天才，祇有相對的價值：一個農夫的子女，他的天才或許遠勝於世家子弟；然而世家子弟的知識較高，這實在因爲他在幼小時候，已受到比較良好的教育，見聞較廣，所得的印象較富，這是和他個人的天才無關。

硬學來的學問，根本談不到發明，祇有富於天才的人，才能談到發明。可是現在的德國人，大家都不來重視這點，祇知道重視分數的多少。

民族國家，必須要另負一種教育的任務，就是國家不應該把任命權去委之於某一階級，應該從全國的民衆之中，去選拔出一些有才智的人士出任要務。對於尋常的兒童，國家本來是應該給他們受規定的教育，尤其是應該使具有天才國民享受充分的教育機會。國家的高等教育機關，應該盡量開放，不論階級，不加歧視；這種措施，實在是國家至高無上的職責。

國家所以應該注意於這種事情，尚有進一步的理由。在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素來和世人隔絕的，所以和下層民衆，更是漠不相關。因此，就有兩種不良的結果產生了。這兩種不良的結果，一是知識份子對於平民隔離太久，所以對於群衆心理，茫然無知；因而對群衆缺乏同情心，像是路人一般毫無關係。二是知識階級缺乏最關重要的意志；凡是知識份子，他們比沒有受過教育

的民衆毅力要薄弱些。我們德國人，不是缺乏知識，不過是缺乏意志和毅力而已。我們不妨舉例來說：我們試看我國的政治，大抵他們的知識愈高，他們便愈怯弱，他們事業的成就也愈小。在大戰的時候，我國的政治方略和軍備，都不充分，這並不是爲了統治者的缺乏知識，實在是因爲他們的知識太高，他們的腦中充滿了知識，反而沒有健全的本能，以及毅力和勇氣了。叫一個文弱書生去擔任聯邦的總理，要他去領導缺衆去作犧牲的奮鬥，這真是我民族的一個大不幸。倘使領導者不是像如貝特曼·霍爾威克（Bethmann Hollweg）一流的人物，而是國中的健將，那麼，沙場烈士的鮮血，也不致完全白流了。況且我國領袖，他們大都傲慢浮誇，這不啻暗自助長十一月革命的叛徒使之乘虛而入。我國國民本身的福利去付託給他們，他們不能用全力來替我們增進福利，反而用卑劣的手段，來阻遏我們國民的福利，這就是知識不足成事，反而足以幫助敵人。

關於這點，羅馬公教會便是良好的例證，這是可供我們參考的。教會有禁止結婚的規定，所以獨身的神父，在選取繼任者的時候，必須從民間去選取，而教士內部，沒有承繼人的。普通人大都不明白這種禁止結婚的特殊意義，不知道羅馬公教會的力量，就據此作爲基礎。

民族國家的責任，是在盡它教育的能力，注意於吸引下層的新進優秀份子，去更換那些知識階段。國家應該十分小心，從全體國民中慎選卓越的天才，服務於社會。然而在現時世界情狀之下，這是很難辦到的。

一切事業，大都具有物質和理想兩方面的價值。物質上的價值，完全要看事業的重要性，然後看這重要性的程度如何，再來給以相當的評價。事業的重要與否。並不是着重在物質方面，必須看它根本的效用功能。就理想方面來說，人類的平等，須使處於不同的個人，在他的範圍之內，儘量表現他的才能。對於估量個人價值的時候，須依照他履行職務的態度為轉移。因為個人的工作，是他生存的手段，不是他的目的。個人應該進而去從事於各人自己人格的完成和提高；他的先決條件，又是繫在他本身所受文化的程度，和其在國的文化基礎。

現在國家的一切措施，完全是無異於自取滅亡。我國現行的普通選舉制度，大都是空談權利平等，然而却不能舉出它的理由。在他們看起來，個人所得的報酬，便是個人價值的表現，這樣平等原則的基礎，根本就發生了動搖。平等決不是（而且也決不能）把個人的成就作為根據；不過，倘使各人都能履行他的特殊義務，這平等才能實現。必定要這樣，然後對人的評價，方不被偶然的實際所左右，而各人種才始能創造他自身的價值。

對於現在人的生活之中，金錢是極大的勢力，然而，我相信將來的人類，必定會崇拜更高尚的神明。現在有不少的事物，完全是根據富有的要求而才生存的。不過，如果人類缺乏了這些，那麼，人類就未必更窮。

我黨的一種任務，是在於揭示一個新時代，期望到達那個時候，人人能各取所需；並且保持着一個原則，就否認人生唯一目的是物質的享受。欲實現這件事，那麼，國家對於工作的報酬，

務須精細規定分配的標準，使誠實的工人，大家都能享受有秩序和光明正大的公民生活。

但願大家不要以為這是空談的幻想，不要以為在現在的世界，事實上不容許而且決不能實現這種理想。我們雖然愚蠢，還不致妄想那毫無缺憾時代可以實現於這個世界。但我們也決不可能因此自甘放棄，不去努力於彌補缺陷，剷除弱點，和追求最後的理想。這種理想，發生種種事實上的障礙，這是勢所不免的。所以我們人類，須各盡自己的心力，共赴最後的目的。我們決不因一時的失敗，遽然把原定的目的放棄；這正像我們不可因為法律偶有一些瑕疵，就說法律可以廢除；因為疾病難免，就說醫藥無用。人類對於理想的力量，請勿過份看輕！

第3章 公民與國民

現在大家所說的「國家」，單單把人民分爲兩類：一是公民，一是僑民。因爲出生地的關係，或是入籍的緣故，因而享受公權的叫做公民；在他國的統治下享受和公民相同的權利的叫做僑民。現在要取得這種權利，第一個條件，必須生在國家的疆域中種種和國籍的問題，倒是沒有怎樣關係的。比方像黑人，從前居於德國的保護地，現在居於德國，他們的子女，說可以算是德國的公民。要取得一個國家公民資格的全部手續，竟像加入汽車俱樂部爲會員一樣。

我知道這句話大家一定不願樂聞的，可是事實上，德國現行的公民律的荒謬和草率，却令人不能不這麼想。現在已經有一個國家企圖改良他們的公民律了。我所說的，原不是指我德意志模範共和國，是指竭力以理性爲師表（至少一部分如此）的美洲合衆國。合衆國的政府，他們禁止不健康的人入境，而且嚴禁某一種入籍，這是趨向於民族國家觀念的第一步。

民族國家，區分他們的居民爲二類，就是公民、國民、僑民。就原則方面來說，一個人的出生，只能獲得國籍；不能因此而去做國家的官吏，或參加選舉。凡是一個國民，必須有種族和國籍的兩種證明。國民可以隨時脫離國籍，而在和他們同民族的國家內成爲公民。僑民所以異於國家，就是因爲他居於外國，而仍保存他的國籍緣故。

德國的青年國民，須受德國一切人民所應受的教育。以後，他也應該受國民所規定的體育，

最後入伍而受軍事訓練。軍事訓練是人人必須接受的，成績優良的強健青年，於兵役完畢之後，乃由國家正式授以公民的權利。這一件事，實在是他一生最爲可貴的紀念。我們必須知道做一個德國的公民，即使他的職業是一個卑下的清道夫，然而他的榮譽，也必勝於做外國的帝王。

德國的子女，不過是國民，直至結婚以後，乃能成爲公民。德國的婦女，她們從事於職業者，也得授給他們公民的權利。

第4章 人格與民族國家的觀念

如果我們並不預備去探求馬克斯理論的結果，那麼，希望把個人所屬的種族去估量個人的價值，而同時又攻擊馬克斯派的「人人都是一樣，沒有種族分別」的理論，那真是傻子。

倘使有人相信現代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能夠用純粹的機械方法，和比較優良的經濟生活組織，使本國和他國不同——換句話說，就是調和貧富，或是擴大經濟的統制，或是使報酬公平而除去過巨的工資差別——這樣的人，他必定要陷入絕境，因為他一點也沒有我們所說的世界觀眼光。上面所說的種種方法，既沒有長久的希望，也沒有偉大的前途。如果一個國家，僅僅信賴這種淺薄的改革，那麼，在這國際的競爭之中，決難獲得勝利。一種運動的使命，如果是出於這樣的妥協方法，勢必不會有偉大的改革，因為這是膚淺而不深入的緣故。

要明白這種道理，我們不妨去大略追溯一下人類文化發展的真正起因。人類所以和禽獸不同的緣故，第一就是因為人有發明的本能。當人和一切的獸類鬭爭的時候，人類有巧妙的方法，用以駕馭各種具有特殊能力的動物。就在這個時候，人格便足以判斷疑難，建立奇功，以後人類就把這看作當然的事了。一個人對於自知的能力所以能夠認識，（我一直把自知之明認為是一切策略的基礎），起初因為他具有果毅的精神，不過這種精神，直到幾千年之後，人類才開始公認這是極自然的事態。

人類除了這第一種的發現以外，又有第二種的發現，就是他知道在生存競爭的時候，怎樣去謀生。人類所持有的發明能力，遂由是而起，就是從這地方開始的。現在我們所見到的，就是這一種發現的結果。這一切的一切，都是從個人的創造能力上面所產生出來的。這種發現，使人類繼續向上發展的功績，實屬匪淺。從前在森林中爲獵人生活而奮鬥的種種單純技巧，現在已經成爲科學上的巨大發現，這種發現，既有助於現在人類的生存競爭，而且又爲未來的生存競爭製造武器。

把純粹理論發展而所費的思考，那是無法可以計算的。凡是一切物質發現的必要初步工作，是個人的專有產物；可是對於更進一步的物質發現，實在是一個必要的前提。群眾並不能有所發明；大多數的人，也沒有組織和思考的能力；所賴者，只是個人而已。

人類社會，如果能夠竭力去推進這種創造力的工作，以爲社會謀福利，那麼人類社會，才能有良善的組織。而且這良善組織的社會，應該設法安置有才智的人士於群眾之上，使群眾都聽受他的指揮。

所以社會的組織，不但不能阻止有才智的人士，高出於群眾之上，而且還須努力使有才智的人士，居於最高的地位。

一種劇烈的生存競爭，是促成智力高於一切的主要原因。統治國家行政和國防，完全是一種人格觀念和他的權威，以及對於地位最高的人所負的責任

。

現在的政治生活，常和這自然的原則背道而馳。人類的文化，差不多是人格創造力的結果，在社會的全體是如此，在領袖間也是如此。但是現在竟把尊重多數人的原則，作為決定一切的權威，而且很慢地使人受着它的毒害，實在是受着它的破壞。猶太教對於其他民族所施行的破壞工作，就是在時時消滅個人的重要，並摧毀該民族中的主要人物，而把群眾的意志，去代替這主要人物。

於是，我們就可以知道，馬克斯主義是猶太人用以消滅在人生各方面領袖人才的一種明目張膽的企圖。他們企圖在人生各方面，取消人格的重要性，而去代之以多數的群眾。在政治上的議會制度，就可以算是它表現的一個代表。從小的教區會議，直到控制全國的大權，都是這樣的。

馬克斯主義的本身，決不能建立起一種文化，或者獨自創造一種經濟制度；進一步來說：它在事實上決不能依照固有的原則去維持現存制度。可是在短時期之後，馬克斯主義又不得不表示讓步，回過頭來承認人格原則的理論；就是在該黨的組織中，也不能否認這一項原則。所以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和馬克斯主義的理論，是絕對相反。民族主義，確信種族的價值，十分明瞭人格的重要，並且使這二者成為國家的柱石。這就是民族主義世界觀的基本要素。

民族國家，應該繼續努力使整個政府，——尤其握有政治領導權的最高機關，——脫離群眾的操縱；必定要如此，才能取得無上的權威。

最好的國家制度，就需要用毅然決然的階段，去選擇社會中有才智的人士，叫他做着有權威的領袖。

決斷權絕不可操在大多數人的手中，國家應該是一個負責的團體，而「顧問 *Rat*」一詞，應該恢復它的真義。每個人的旁邊，雖然可以有顧問，可是決斷必須出之於一人。

一切的專門問題——例如經濟——民族國家不可請教於沒有專門學識和沒有職業的人。於是，國家分設了若干的政治委員會及代表專業和行業的委員會。在這兩者的上面，又設參議院，俾能收到合作的效能。

參議院和衆議院都沒有決議權；任命議員，是使他們工作，並不是使他們來決議。各議員可以參加意見，但是不能有什麼決議。因為決議，是當時主席的特權。

我們的主張，能不能實現，我敢請讀者要注意的，就是我們所用多數人議決的議會原則，決不能長久去支配人類；反之，在歷史上支配人類的時期，大都是在民族國家衰落時間的短時期中的。

無論怎樣，我們切不可去妄想：以為由上者用了單純的理想方法，就可以產生出這種變動來；因為他所牽涉的，並不是僅僅一國的政治而已。一切立法，和一般公民的生活，都應該充滿這種變動的精神。只有一種運動，始能實現這種改革；這種運動，是由改革思想的精神所造成，所以這種運動的本身，就可以成為未來國家的創造者。

所以現在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必須和這理想相符合，而且須在他的本身組織中實行。這樣，不但把國家導入正軌，而且還能使這個完善的國家能夠執行它的職務。

第5章 世界與組織

我所要大概敘述的民族國家，決不是單單明瞭它的必要條件，就可使它實現的；也並不是單單明瞭它的表面形態，就足以了事的。民族國家的產生，實在是一個更重要的問題。我們不能靜靜地等待現在那些利己損國各政黨自動來改變他們的態度。因為他們的真正領袖大都是猶太人，而且只有猶太人，所以尤其沒有改變態度的可能。

猶太人抱定了他的目的，來對付這幾百萬德國的小資產階級，他們的聲勢很大，而這般德國人，又大都是昏庸怯弱，日趨滅亡。猶太人對於他們的最後目的，都是十分明白的。所以，凡是猶太人所領導的政黨，除了為猶太人的利益而奮鬥以外，不再有其他企圖，他們和亞利安民族的特性，是毫不相同的。

如果我們要實現民族國家的理想，我們勢必拋棄現在支配公眾生活的勢力，而另外去求取意志堅決，足以為這種理想奮鬥的新力量。倘使我們的初步工作，不在創造民族國家的新觀念，而在剷除現在猶太人的觀念，那麼目前的奮鬥，是無法避免的。

一種含有偉大新原則的新主義，必須把嚴厲批評作為他們的最初武器，至於被批評的個人，對這批評有着怎樣的厭惡，那是可以完全不管的。

馬克斯主義，自然有他的目的，而且還抱有一種建設的雄心（雖然他們所建設的不過是猶太

人壟斷世界金融)；然而，他們致力於攻訐已經有了七十年。以後便開始他們的所謂「建設工業」。這工作是正當、自然，而且又合邏輯的。

世界觀，不但不許，而且還不甘和其他各黨爲伍，它要堅持唯我獨尊的地位，依照它的新觀念，去改造全部的公共生活，因此，對於代表過去狀況的舊勢力，世界觀是不能容許它繼續存在的。

宗教也是這樣。基督教並不把建立他們本身的祭壇爲滿足；尙須進而破壞異教的祭壇。但是這種狂熱的排他性，能夠創立萬古不滅的信仰，這就是該教存在的絕對必要條件。

政黨每容易妥協，而世界觀便不是這樣。政黨和他的敵黨磋商條件，世界觀便公然說他本身的正確無訛。

無論什麼政黨，在開始的時候，大都抱有獨攬大權的希望，所以大都是具有若干世界觀的成分。然而，因爲他們的黨綱貧乏，所以各黨大都沒有世界觀的英雄氣慨。因爲他們這樣的願意和人家妥協，所以各黨所吸引的，大都是一些怯弱無能的人；和弱者混在一起，決不能爲主義而去奮鬥。所以各黨常常在開始的時候，就因他本身的懦弱而不能有所進展。

如果世界觀不是羅致一批國內在當時算是最勇敢，而最有實力的份子，叫他們來組成堅固的奮鬥團體，那麼，他們的理想是決難實現的。同時他們又須就世界一般的現狀中，去抽出某些確定的世界理論，用簡單明瞭的文字制訂出來，俾可作爲新社會的信條。純粹是政治性質的政黨，

他的黨綱，祇在希望爲將來的選舉獲得勝利，而世界觀的計劃，實等於向現在的社會宣戰；其實，這就是向現存的世界觀實行宣戰。

信仰世界觀，而願意去奮鬥的各個戰士，對於領導者最近的思想，以及他思想的過程，用不着完全了解。譬如軍隊，假使士兵們個個都有大將的才幹，對軍隊並沒有什麼大益。所以政治運動，如果純是「知識份子」的集團，那麼，他們對於世界觀的維護，也不會有什麼補益。因此，政治運動，也需要思想簡單的戰士；因爲沒有這班人，那內部紀律，就不能有所整飭。

在本質上，倘使有一位具有大學問家的領袖，但是不會有激於感情的群眾，受着他的指揮，那麼，這組織的本身必定仍不鞏固。如果有一隊二百人的軍隊，他們的智力都相等，那麼，他們的紀律，恐怕比一百九十人智力較低，而十人智力較高的另一隊，更難維持。

社會民主黨的組織，便是一個明顯的例證：他的軍隊，是軍官和兵士所組成的。退伍的德國工人做士兵；猶太人中有知識者則做軍官。

民族觀念，要想從現在空洞的希求中去產生，且能獲得更顯著的功效，那我們應該在廣泛的思想之中，去選出若干確定的主要條文。這樣，那新運動的黨綱，就可以草入少數的主要條文當中，這條文一共只有二十五條。這個目的，第一是在使局外人家都能夠知道一些運動的大意。這種黨綱，有些像政治的條文，一半是向外宣傳它的主義，另一半則向內締結共同的誓約，以便團結黨員，號召群眾。

我們所以把原則上正確的主義，廣泛地來加以宣佈的緣故，就是因為我們以為堅持一種概念（即使和實際情形並不完全符合）為害較小，而公開討論以前所認為不能更動的基本原則，因為發生了極大的流弊，為害較大。實在，當一種運動正在進行之中，那是決不能有公開討論的。凡是重要的東西，不能外表上探討的，必須求之於內在的意義，而這內在的意義，已經不能再有什麼更改了。我們只希望我黨為着本身的利益計，必須避免分化，以及缺乏團結的任何行為，用以保持那奮鬥所必需的力量。

有不少的事情，羅馬公教是可以教訓我們的。羅馬公教的全部教義，雖然有許多和科學研究是互相衝突的——有一部份是不必要的衝突——然而教會的本身，它們決不肯犧牲教義中的片言隻字。教會方面十分明白，它的抵抗力並不在教義是否能夠符合當時的科學事實——實際上科學事實時有變動——而在堅持從前所規定的教條，因為它們的教條，就大體而論，本來就足以表示它們信仰的要旨。因為這樣，所以教會的地位，將較從前更為鞏固了。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把他們的二十五條黨綱，認為是一種確立不移的基礎。不論現在和未來，我黨同志的任務，不在批評或是更改這些主要原則，而是在堅持信奉，把自己和主義融合一片。

這新運動，就是依照這主要原則而定名的，它的黨綱，也是根據主要原則而草成的。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基本思想，是含有民族主義的意義；同樣，民族主義的思想，也是有着

民族社會主義的意義。倘使要把民族社會主義的運動完成，那麼，不是絕對的深信這種思想不可。民族社會主義，在權利和義務上，都應該有明確的宣佈；凡是在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範圍以外，再有表示民族主義的觀念的，它的基礎大都是虛偽而不足相信。

各種會系和派別——不管它是小組織也好，大政黨也好——大都喜歡把「民族主義者」來向人自命；這一個名詞的由來，實在是受了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影響。否則，各種會系等等，甚至竟不能說出「民族主義者」的一個名詞；這個名詞對於他們實在可以說是毫無意義的。他們和他們的領袖，必和這種的思想無關。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N S D A P）是第一個和這名詞發生一種重大意義的，而現在竟被衆人所通用了。我黨的運動，從宣傳工作方面，充分地證明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因此，其他的政黨，他們爲了利益的驅使，也來冒稱，說他們和我黨有着一樣的志願。

第6章 初期的奮鬥——演說的功效

一九二〇年二月二十四日，我們在慕尼黑霍夫布雷好士會堂（Hofbrauhaus festsaal）剛在開第一屆大會，就開始籌備第二屆大會了。在過去，我們不敢有什麼妄想，在慕尼黑一類的城市之中，每月或是每二週開會一次，現在則決定每週舉行大會一次了。

在那個時候，我們國社黨的黨員，大家差不多把這會堂看作很有一些神聖的意義。每一次開會，濟濟一堂，到會的有增無已，而且聽來對之一天注意一天。每次的議程，大都是先論「戰爭的罪惡」問題（這個問題，當時還沒有人注意到），接着是討論和平條約；在這時候，慷慨激增的演說，十分適用，而且也是十分必要。

假使在當時召集一個民衆大會，參加者都是困苦的無產階級，並不是麻木不仁的小資產階級，一同來討論凡爾賽條約，那麼，這個民衆大會，不啻是向共和國進攻，即使不被人認為復辟思想，至少也被人當作反動思想的表現。當我們把凡爾賽條約加以批評的時候，群眾每有近來辯論的說「那麼布勒斯特·里多弗斯克（Brest Litovsk）條約又怎樣呢？」群眾的叫囂，擾攘，直至他們力竭聲嘶，或是發言人曉得他們不能加以理喻而休止時為止。唉！像這樣的國民，真是叫人失望！他們不知道凡爾賽條約是我國莫大的奇恥，不知道這種和約，是對我民族一種橫暴的侵襲。馬克斯黨的破壞工作，敵人的毒害宣傳，處處使民衆對於事理完全失掉了理智。但是，我

們不必去怨天尤人，因為對方的罪惡，大到不可限量。但是，我國的小資產階級，在當時對這狂瀾是否出力維持？或者會運用他們的智謀去啓導了真理？然而他們並不如此。

我自己知道得十分明白，但是爲初期的運動着想，戰禍的責任問題，應該去依循歷史上的事實來解決。

當強大有力的敵人，運用他們誘惑的階段，欺騙群眾，使群眾懷有狂妄的主張，和荒謬態度的時候，那麼，一種尚未發達的新運動，自然易於受欺，隨聲附和而就和他們爲伍了，尤其是當一個新運動認爲群眾之狂妄的主張有幾點（即使完全是虛幻的）宜於採取這種行動時尤甚。

上述情形，我碰到的已經不止一次，當時要用極大的力量去防備捲入漩渦之中。最後一次，就是當時我國的可惡報紙，他們竟不顧日耳曼民族的生存，對於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竟誇大其辭，說日耳曼民族將因此而受到嚴重的影響。有許多所謂「民族主義」的人物、政黨和協會等，他們自己並不知道爲什麼要這樣做，應該怎樣做，只是他們怕激起猶太人的公憤，所以糊裏糊塗的就同聲附和，贊助猶太人去反對一種組織。這種組織，在我們德國人遭此存亡關頭的時候，都應該看作是在這腐敗社會中的一線曙光。當那些沒有國籍觀念的猶太人，慢慢地置我人於死地的時候，我國有所謂「愛國者」的朋友，竟憤然反對有勇氣的人物和制度，要知道這種人物和制度，至少是在世界的一方，我們是盡力想脫離猶太人大同盟的羈絆，要靠了民族主義的力量，去反抗國際毒害的。

敵人對我們的辯論，有着他們一定的爭點，他們反對我們的要點，在他們的演說中，再三地有着攻擊我黨主張的理由，從這種同樣的辯論來看，已經足以顯示出對方有着一般的訓練了。事實上確是這樣。現在我已發現一種方法，這方法不但可以使他們的宣傳失掉效力，而且還能以他的矛去攻他的盾，這真是足以自豪的。這樣兩年以後，我已經十分精於這一種技術了。

不論在什麼時候，我每在演說之前，必定預先猜想在討論中將有那種方式和性質的辯論發生，因此我在演詞前段，先把敵人的理由駁斥得體無完膚，這方法就是把對方一切可能的論辯完全說了出來，證明他們是虛妄。而毫無價值。

上面所說的，就是說明當我在任教官的時候，第一次向軍隊演講凡爾賽和約時，為什麼要把講題改為「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和凡爾賽和約的比較」緣故。因為在第一次演講後的討論中，我就確切知道他們不明白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和約的真相，因為他們早已受了他們黨中有效宣傳的影響，便認為該和約是世界上最可恥壓迫行爲的一種。成千成萬的德國人，把凡爾賽和約僅僅認為我們在布勒斯特·里多佛斯克的作惡所應得的果報，這種謬妄的見解，實因謊言繼續着欺騙國民衆而致的。於是他們認為反對凡爾賽和約的任何舉動，都是錯誤的，而且常常痛恨這種舉動。因此，那可恥而又可怕的「賠償」一詞，便通行於德國了。我在演講的時候，同時提出這兩種和約，拿來互相比較，使大家明白那一種是合乎人道的，那一種是違反人道的，結果成績很好。在千百萬聽衆的腦海裏，因此不再存有這種謊言，真理完全代替了他們心中早已存在的謊

言了。

這種集會，在我們是很有利的；因為我已藉此而慢慢地成為群眾大會演說家了。在容納一千聽衆的大會場中，應該需要沈痛語調和姿勢，我已經弄得十分熟悉了。

我們最初幾次的集會在桌子上堆放着許多傳單、報紙、及各種小冊子，然而我們所依靠的只是言詞，因為心理的關係，只有言詞，才能引起思想上的重大轉變。

演說家，可以時時受着聽衆的指導，使他能夠矯正他的演辭，因為他觀察聽衆的面色，就能推測到觀衆是否對他的演辭能夠明白了解，和他的演辭能否產生他所希望的效果。至於著作家，和讀者，沒有一面之緣，所以作家不能依賴當前的觀衆，來修飾他的詞句，祇好用普遍的文字，來敘述普通的事理。

如果一個演說家，他知道聽衆對於他的演辭，不能完全領悟的時候，便應該作十分淺明的解釋，使大家都能明白。而且在解釋的時候，審慎而很慢地說着，使那些知識最低的人也能夠領會。還有他如果知道聽衆對他的辨論有了懷疑，就應該另行舉例來反覆說明，並且把聽衆尚未說出來的反駁先行說了出來，這樣斷續地做下去，直到最後的反對者，也由態度和面色上的表現，顯示信服時為止。

一切聽衆的成見，演說家往往採用這種方法去破除的。因為他們的成見，並不是起於理智的認識，而是起於不知不覺無意識的感情作用。欲破除這種本性上的厭惡，以及感情上的嫉恨和成

見，他的困難，比較去矯正由錯誤的知識，而生出來的意見更困難萬倍！一種愚昧和錯誤觀念，可以由教導而祛除的；但是由感情作用而生出來的阻礙，那就不容易祛除了，如果要祛除的話，只有靠着這種潛伏着的力量；然而這決不是作家所夠負責的，祇有演說家才有成功的希望。

馬克斯主義者，所以對於群眾能夠有驚人的勢力緣故，並不是得力於猶太知識階級的著作上面，而是得力於歷來許多滔滔不絕，支配群眾口頭的宣傳上面。在十萬個德國的工人當中，曉得有馬克斯著作的人，平均不會有一百人；而且曾經研究過馬克斯著作的人，當中要算知識階級——以猶太人為最——的人數，比真正擁護這種運動的下層階級多達千倍！該書的著作，目的並不是為了群眾，而是純粹為了征服世界猶太機關中有知識的領袖。至於煽動群眾，那就應用另一種方式，就是報紙。馬克斯主義的報紙，所以和我國小資產階級的報紙的不同處，就是在這種地方。馬克斯主義的報紙，執筆的人大都是煽動家，而小資產階級的報紙，就愛用作家去從事於煽動的工作。

演講的時間，對於演講的效果，也有着很大的影響。同一的演說家，去發表同一的問題，但是，因為時間的不同，像在上半十點鐘和下午三點鐘，或是在晚上，所得的效果便會截然不同。我在最初演講的時候，常把時間排在上午，我還記得在慕尼黑德景酒館（Kind Keller）的集會，是在上午十點鐘舉行的。題目是「反對德國領土的被壓迫」，可是所得的結果，真是令人失望，然而同時我因此而得到了一個良好的教訓。我自信在當時我的演詞，並不比平時說得壞，可

是，所得效果，竟等於零。然在這次的集會中，我獲得了較豐富的經驗，可是我絕不把這一些認為滿意。以後我又試驗了好幾次，結果都是如此的。

善於演講的人，要感動聽衆，最好的時間就是在晚上；因為聽衆在晚上精神疲倦，不像上午的頭腦清醒，意志堅決，而反抗力也比較強烈的緣故。

在天主教的教堂裏，光線暗淡，有着神秘的意味，而且又用香、燭、等發出一種氣息，用意正也和此一樣。

真是想不到，德國的知識階級，他們認為著作家的智力，必定比演說家爲優，這正和他們的茫然不識世務一樣。在某種民族主義的報紙上，對於這種見解，曾作過最有趣的說明，說著名的大演說家所刊行的演辭，使人看而生厭。我記得在大戰的時候，我見到一篇論文，對於當時英國軍需大臣羅易·喬治（Lloyd George）的演辭細細加以分析，後來得到一個絕妙的結論：說這種演辭，徒然表現演講者的平庸，而且又智能薄弱。我曾在一本小冊子中，讀過他的演辭多篇，因而知道那般德國的記者，他們對於這種心理的傑作，足以感動社會的地方還不能明白，獸想至此不禁大笑起來。那些記者，對於演辭的批評，純粹把演辭對他貧乏智力所給予的印象爲依據；要知道這一位英國的大演說家，他確能利用演說來感動聽衆；感動了全英國的下層階級。這樣看起來，就是英國人的演辭最有驚人的力量，因為他們能夠洞悉群衆的心理；所以他們感人的效力至深且大。

如果把前面所說的演辭，和貝特曼·霍爾威克拙劣的演辭來比較一下；貝特曼·霍爾威克的演辭，雖然是長於說理，實在不過是證明他這一個人不能向群眾來講演。羅易·喬治演辭的內容和形式，能夠博取聽衆的信仰和悅服。就這一點來說，羅易·喬治比較貝特曼·霍爾威克，也只有過而無不及的。他的演辭樸實無華，而且敘述清晰，辭句易解，舉例淺顯，處處足以證明這位英國人具有高超的政治才能。

民衆大會，實在是必要的，因為當一個人正要去參加一種新興的運動，在沒有去參加的時候，不免是畏縮的；可是一經到會，便可從大會中，得到一種良好的印象。這種印象，能夠使多數人增加聲勢，鼓起勇氣。這樣，個人便懾服在「群眾的暗示力」的魔力之下了，而萬千人的志願、希望、和力量，完全聚集於每一個到會者的心靈之中。凡是到會時有着懷疑態度的人，散會後必定意志堅定，他已成爲團體中的一員了。我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對這點是應該千萬牢記。

第7章 同共產黨的鬥爭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二年間。我會親自參加所謂小資產階級的各種集會。因此我大略知道一些小資產階級政黨的宣傳者，然而我並不驚奇他們的舉動，因為我十分明白，他們對於口頭的宣傳，不加重視的緣故。我曾去參加過民主黨、德國國民黨（German Nationalists）、德國人民黨（German People's Party）、和巴維利亞人民黨（Bavarian People's Party）就是巴維利亞中央黨（Bavarian Centre Party）的集會。其中使我及時加以注意的，便是聽衆的一致。到會的人大都是黨員。他們的會場一些紀律都沒有。就全體而論，很像是一個雜亂無章的賭場，而不是從事於偉大革命事業的群眾大會。演說的人，竭力保持着他們的鎮靜工夫。他們背誦着演辭，大多數的人，不過把演辭高聲朗誦，極像報紙上精巧的論文，或是學術上的論文，他們避免一切強烈的語調；演辭中間有一二處溫文儒雅的笑謔穿插，引起在演講壇上的人輕微一笑，這不過是聊以助興，乃不失紳士的基本態度。這樣經過四十五分鐘，全體的聽衆，都昏昏地要進入睡鄉了，於是就有了早退的脚步聲，相互交談聲，以及一部分聽衆的呵欠聲。演講完畢了，主席領導聽衆，共同唱一隻德國的愛國歌，於是散會。——聽衆們擁擠不堪的奪門而出，有的到酒店中去，有的上咖啡館去，有的出去呼吸一些新鮮空氣。

反過來，我們民族社會黨的集會，絕不是「平靜」的集會。兩種不同的世界觀互相的對抗，

在散會的時候，每致引起群眾和民族主義者的狂熱，並不是唱了一隻沉悶的愛國歌所能了事的。我們的集會，有着嚴格的紀律，大家第一步是盲目的信從，讓主席有着絕對的權威。這件事極關重要的。

在我們的集會裏，常有反對派（共產黨）參加，他們常常是結隊而來的，偶然還有少數的煽動份子混入其間，他們各人的臉上，看來都呈現着「今夜我們要和你們決一下雌雄」的表情。在這千鈞一髮的危險時候，惟有主席的魄力，以及會場衛隊的嚴厲防衛，才能挫敗反對派的陰謀。共產黨員和我們的搗亂，是有原因的。我們在精密考慮以後，決定採用揭貼紅色的標語，故意來激怒他們，使他們怒不可遏，特地來參加我們的集會——我們的用意，本來只是在離間他們——於是，我們便趁此機會，來向他們宣傳。

我們的敵人，因此令「有階級意識的無產階級」，成群結隊來參加我黨的大會，以使用無產階級的力量，來攻擊我們「專制而反動的計劃。」

在開會前的四十五分鐘內，會場上已經擠滿了工人。他們好像是一隻火藥箱，大有一觸着導火線，立刻爆發的趨勢。可是事實上每每不像如此，他們在到會的時候是敵人，到了散會的時候，他們雖然未必和我們携手，但至少他們也能反躬自省，並且去查考一下他們的主義是不是正確。以後，他們竟是這樣地說：「無產階級們呀！你們千萬不要去參加民族主義煽動家的集會罷！」同時，共產黨的報紙，他們也有了同樣改變方針的表示了。

民衆們見共產黨的報紙對我們注意了，因此對我黨也就加以注意了。因此，共產黨的報紙，突然改變了他們的策略，有一個時期，他們竟把我們看作是人類的真正罪人。該報屢次的撰述論文，宣佈我們的罪狀，他們盡量的造出種種謠言，存心來對我們陷害。但是不久，他們好像也深知這種攻擊完全無效；因爲事實上，適足引起一般人對於我黨的注意。

我黨的集會，爲什麼敵黨不能來破壞？原因是由於他們的領袖過於怯懦的緣故。凡是到了危急的時候，這般不要臉的傢伙，大都鰓立在會場的外面，靜待事變的演變。

在當時，我們不得不自己來保護集會；我們決不能去依賴官廳；因爲我們根據過去的經驗；官廳不但不能來爲我們保護，反而幫助那些搗亂份子呢？官廳所擅長的手段，不外是把大會解散；而解散大會，這實在就是共產黨搗亂的目的。因此，我們絕端的相信不論什麼大會，如果完全依賴官廳來爲他們作保護，那麼，他們的領袖，決難取得群眾的信任。在從前，往往有少數同志，他們挺身而出，對咆哮凶惡的紅色群眾，作出壯烈的抗拒。這十五人或是二十人的少數的同志，終必被敵方所打敗。其餘的同志，他們明知有三四倍之衆，也必受傷，因此就不敢冒險了。

這是誰都明白的，統治德國小資產階級的禍國殃民，便是革命發生的唯一原因。在當時，雖然有着準備保衛德國民族的赤手空拳，但是，却沒有準備犧牲的精神。我和德國青年在談話的時候，常常向他們說明所負使命的重大，並且一再反覆證明，假如人類的智慧，要是沒有武力來扶助保護，終必要陷入淪亡之途。溫柔和平的女神，如果沒有戰神作伴，必定是寸步難行的。偉大

的和平事業，必定要由武力來做後盾。青年們聽了我的話，沒有不動容的。於是軍事訓練的觀念，對於他們覺得較有趣味了。他們都確切知道，人人都有隨時隨地爲國捐軀的義務，不再像那死氣沈沈舊政府裡的一班老朽官僚，大家把軍事訓練視爲是一條畏途了。

我們姑且看一下這班青年勇敢的奮鬥怎樣！

他們像一群黃蜂，向着會場中的搗亂份子拚命猛衝，他們既不去計較敵衆我寡，也不顧到傷害和流血的犧牲，心裏只是滿懷着偉大的理想和神聖的使命，誓爲我們的運動掃除障礙。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我黨維持秩序的軍隊，有些兒像樣了。次年春天，依次再分爲好幾隊，每一隊再分爲幾小隊。因爲我們集會的活動，一天一天的增多，增加保護實力的編制，實在是刻不容緩的。

我們組織起軍隊，來維持會場的秩序，目的是在解決一些十分重要的問題。在那個時候，我黨還沒有黨徽和黨旗，這種標幟缺乏了，不僅在當時是不便，就是在將來也是不便的；因爲既沒有方法去表明黨籍，而且將來我黨和國際主義的黨員鬭爭的黨員鬭爭時，也無法來加以區別。

我在幼年時代，曾由感情上去觀察，知道這類的標記，能夠影響到我們的心理，所以就認爲標幟是十分重要的。在大戰以後，我曾參加過柏林皇宮前的馬克斯主義民衆示威運動。一幅幅的紅旗，一條條的紅巾，以及一朵朵的紅花，在空氣中自由飄蕩。顯示了十二萬參加大會的群衆聲勢。我深切的知道，這種偉大而莊嚴的氣象，確有感動局外人的一種魔力。

在小資產階級，他們的政黨，並沒有世界的觀念，所以並沒有黨旗。因爲他們的黨是由一些

「愛國份子」所組成的，所以他們就用帝國的國旗。

黑白紅三色的舊帝國的國旗，現在已被那些所謂「民族的小資產階級」各政黨採用爲黨旗了。

德國的國旗，不足以作爲我黨的象徵，因爲他所代表的德國，在將來或許要受盡恥辱，被馬克斯主義所征服；而我黨的運動，則在消滅馬克斯主義，所以我們不該去沿用舊的德國國旗。現在雖然還有不少的德國人他們念及舊國旗的全盛時代，絲且因爲他們曾在這國旗下作戰，親眼見到無數的生命死於這旗下，因此對之就生出了敬愛之心；可是，照未來的奮鬥來說，這旗是一無價值的。

這就是我們民族社會黨，認爲舊國旗不能象徵我們特殊目的的唯一理由。因爲我們的志願，並不在恢復污點很多的舊帝國，而是在建設一個有新精神的新國家。我們現在所做的運動，既是本着這境界去和馬克斯主義爭鬭，那麼，黨旗上自然應有代表新國家的象徵。

我自己每想要保存舊國旗的黑、白、紅三色。經過了多少次的試驗以後，我便決定了最後的形式，我黨的黨旗是在紅地之中有一個白圈，圈中再畫上一個黑色的字。再經過多少次詳細研究。便決定旗和圈中的適當比例，以及字的形式和粗細；這旗一直沿用至今，從來不曾有過更改。

不久，維持秩序的軍隊，也就製成了同樣的臂帶——紅地，白圈，中有黑十字。

一九二〇年的夏天，新黨旗初次在光天化日之下出現。經過了二年，吾黨同志，已經到達幾千了，於是就組織人數衆多的挺進隊（Sturmabteilung）；這種爲新世界觀而奮鬥的武力組織，應該有勝利的特殊象徵，——就是軍旗。

在那時候的慕尼黑，除馬克主義的共產黨外，不再其他的黨能夠像我黨一樣敢來舉行大示威運動——民族主義派的政黨，更是不足一道了。慕尼黑的德景酒店，可以容納五千人，每當我黨集會的時候，擁擠不堪；所以我們常在找尋其他的更大場所。我們不曾集會的會堂，只有克羅納戲院（Circus Krone）——處地方而已。

一九二一年一月底，德國人的心裏，又復大感不安。因爲巴黎和約，依倫敦最後通牒的方式逼迫我國承認，依此和約，德國應付賠款二千二百六十萬萬金馬克。

一天二天的過去，這件驚人的事件，德國竟沒有一個大政黨來加以注意，就是所謂民族主義各黨的聯合會，他們雖然有示威的計劃。可是也沒有決定的日期。

二月一日，這天是星期二，我要求該會決定日期，可是，我的要求被延至星期三。我再詢問這一天大會是不是舉行，到底在什麼時候舉行，給我的答覆仍是游移不定；不過說他們要邀集各團體在下星期三舉行示威運動。

到了這個時候，我已經忍無可忍，所以決定自己起來負責領導示威運動，反對和約。在星期三中午，我就叫人於十分鐘內寫齊了標語，並且租定克羅納戲院，作爲明天（二月三日，星期四

（開會的會場。）

在當時，這件事是個驚人的冒險。因為在這樣一個廣大的會場之中，是否能夠有相當聽衆，我黨的黨員，能不能把這廣大的會場填滿，這確實是一個疑問；而且大會還有受人破壞的憂慮。不過我確切知道，——如果這一次失敗的話，那我黨在將來的長期奮鬥中，終必陷於不利。

我們在一天之內，去把標語貼好，可是不幸的很，星期四的早晨降雨，我十分擔憂，擔憂着聽衆決不願冒雨前來赴會，而多安居家中；並且這一次的開會，說不定要發生惡鬭慘殺的暴動。

星期四那一天，我僱了運貨汽車兩輛，周圍完全圍着紅色，上面插了黨旗；每一輛車上載着黨員十五至二十人，滿街馳騁，散發傳單，作爲在晚上舉行群眾大會的宣傳。除了馬克斯主義的共產黨外，其他的黨用了汽車插旗而馳騁於街上的，這還是創舉。

我一走進會堂，立即就感到一種欣慰，這欣慰是和前一年在何夫布萊好士會堂第一次集會時所感到的一樣。當我從人叢中擠入而登上講堂的時候，我才知道我黨勝利的全部情形。因於在目前的會場上，已經被千萬的聽衆所塞滿了。

我的講題是「前進或滅亡」。我一直演講了二小時半。在最初的半小時以後，我就感覺到這一次的大會，一定要獲得巨大的效果，事實上確是如此。

小資產階級的報紙，說這一次的示威，不過是一些「民族主義」的性質；這種報紙，依照他們一向的平穩的態度，把發起人的名字都略而不提。

從一九二二年第一次舉行這種大會以後，我們在慕尼黑集會的次數，也就越來越多，我們每星期的開會不止一次，有時是兩次；在仲夏和中秋的時候，我們每星期竟召開大會三次。我們在這時候常在克羅納戲院集會，差不多每晚都有良好的成績，這是足堪自慰的。因此，加入我黨的人數，也就一天增多一天了。

我們有著這樣的成功，敵黨看了當然不會甘心坐視。所以他們決定從事於最後的努力，用恐怖的手段，來阻止我黨的集會。過了幾天，他們知道我們在那一天要在什麼地方開會時，他們便首先發難。因此，我赴何夫布萊好士會場的大會講演，他們便把這會場作為襲擊的目標。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四日，在晚上六點鐘到七點鐘的時候，得到一個正式的報告，說他們要用斷然的手段來破壞我們的大會。

這種消息，我們未能早些探悉，真可說是不幸。在那天，我們已從斯坦阿克兒巷（Sternackerasse），光榮的舊辦公處遷了出去，但是還不會遷入新的辦公處，因為新的辦公處尚未完工的緣故。結果，我們只有四十六名勢力薄弱的衛隊在維持會場的秩序；突然警報來了，我們無法於一小時內召集到充分的援兵。

我走進會場大門的時候，是七時四十五分鐘。我一看情形，立刻就知道必有變故要發生了。那時在會場裏人山人海，萬頭蠕動，警察正在阻止後來的人入場。因為敵人進場很早，大家都聚在會場內；而我黨同志，却反而大都徘徊在門外。少數的衛隊，他們在會場的前廳等著我。我立

刻命令把前廳到會場的門關起來，並召集這四十五人（或許是四十六人）前來聽受命令。我對他們說明：今夜是我們第一次實踐的試驗，我們忠心於本黨的運動，就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惜。我們誓不退出會場，除非是置身死地被抬了出去。

無論如何，不會相信你們在患難的時候，會棄我而去的。如果我見到有形似懦夫的人，我便親自去摘下他的臂帶和徽章。於是，我再命令他們當敵人發出破壞大會信號的時候，應該立刻衝去奮鬥，但是必須牢記著，自衛的最佳途徑，就是進攻。

我的話受到他們三次的高聲歡呼，這歡呼聲的勇猛熱烈，實為空前所未有。

於是，我走進會場去，眼見當時的情形。那些敵人大都並肩而坐，大家怒目的向我看。還有無數的人，大家都轉過頭來向我作一種憤恨的仇視，那種態度，真是咄咄逼人；還有人做出一種高聲怪叫，一切醜態，真是不一而足。因為敵人知道他們的實力較強，所以有必操勝算自信的那種感覺。

那時可以宣布開會了，我便登台去演講。大約我講到一點半鐘以後。敵人就發出他們搗亂的信號來了。於是有幾個人起來怪聲呼叫，一人突然跳上椅子，大呼「自由！」跟了他的呼聲，那些「自由」的戰士便開始行動了。不過在幾秒鐘內，全場完全陷入狂暴中了。

我仍舊鵠立在原處，注視著他們活潑青年同志的行動。當敵人騷動正當要發作的時候，我黨的挺進隊，便奮身而向敵人進攻。挺進隊的名稱，實在是從這裏來的。他們個個都勇猛得像狼一

樣，每十個人或八個人爲一組，屢次向敵人的隊中猛衝進去，把敵人完全驅逐出會場外面去。過了五分鐘，我們的隊員，沒有一個不是血流滿面的。到了這時候，我才知道他們的品質了。那位英武的穆列斯·罕斯（Maurice Hess）他現在做著我的私人秘書，以及其他的向志，沒有一個不奮勇進攻，祇要能夠支持不倒，即使身負重傷，仍是力戰不却。

在會場的一角，尚有一群的敵人，還在頑強抵抗。這時忽然有兩顆槍彈從入口的地方向講臺飛來，一時就人聲鼎沸了起來。這種槍聲，喚起我們往日戰爭的記憶，這是十分欣喜的事。當時我不能辨認出開槍的是誰；可是我親見我黨青年們再接再厲，重行進攻，終於把所有來搗亂的敵人完全逐出到會場之外了。

這件事共計花費二十五分鐘的時間，到底控制會場的還是我們。這時主席赫爾曼·伊塞爾（Hermann Esser）發言：「大會照常進行，請演講者繼續演講。」於是我仍舊繼續演講。」大會正當要結束的時候，有一個十分張惶的巡長，他突然跑進會場。搖著手高聲大呼：「停止開會！」我不禁覺得好笑，因爲這是一套老例的官樣文章。

那天晚上，我們所得的教訓很多；然而我黨的敵人，他們無法忘去他們所受的教訓。直到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慕尼黑報（Munchener Post）對於無產階級搗亂的新聞，竟是一字不提。

第8章 強者獨裁便成爲最強者

一般的公民，他們聽到各種勞工團體合組工會。努力團結而避免分化的消息，他們必定是十分快慰的。人人都深信這種結合，必定能夠增加巨大的力量，而且以前弱小的團體，必定可以變爲強大的團體。可是事實上並不完全如此。

有人宣布某種事情的真理，說是解決某項問題，提出某種目的，並創始某種運動，以求他的理想實現。一個社團，或是一個政黨的建立，便是如此的。他的計劃，或是在革除現存的罪惡，或是在實現將來的社會。

這種運動，有一天發生了，便可以獲得一種優先權。除了自然的程序，凡是願意爲同一目的而奮鬥的，都應該參加這種運動，借此而增加他的實力，使他們共向的希望更爲容易實現。

然而事實上，恰好得到相反的結果，這是有著兩種原因：第一種原因，可以稱之爲悲慘的原因；第二種原因，是基於人類的弱點，可以稱之爲可憐的原因。

照普通的情形來說，世界上不論那種豐功偉業，大都是在實現衆人所共有的宿願。這是各時代各種大問題的特質，千千萬萬的人，努力於解決這種問題，而且有些人還認自己負此重任，完全是受著上天的使命。於是在一群英豪互相爭勢的時候，惟有比較強壯，比較勇敢的人，方能出人頭地而獲得最後的勝利，能夠擔當這項巨大的任務。

所不幸的，就是他們大家用了不同的方法，去達到共同的目的，他們只相信自己是對的，各自照著自己的主張去做，並且不互相幫助。

人類往往爲了嘗試的失敗，因而得到了教訓，終於獲得事業的成功。這就是所謂「前事不忘，後事之師。」

我們從歷史上去研究，知道要解決德國的問題，有兩條途徑。這兩條途徑的代表和戰士，是奧地利和普魯士，也就是哈布斯堡皇室和霍亨索倫皇室；他們老早就應該合併爲一，其餘的小勢力，也應該各自依他們自己的意見把團結力歸附於甲方或是乙方。這樣最後勝利的一方所採的途徑，自然是應該人人所遵循的了。不過，奧地利所用的方法，斷不能造成德意志帝國。

總而言之，統一而又堅強的德意志帝國，這是全體德國人心目中所視爲同室操戈最可怕的結果。因爲德意志帝國的皇冠，並不像一般人所說是從巴黎的圍攻所得來的，實在是得之於寇尼希格萊茲（Konigsgratz）的戰場。德意志帝國的建樹，並不是用協助的方法，去從事於共同的志願；實在是由於竭力爭霸獲得了最後的勝利。

所以，多數的人，大家都趨向於同一的目的，這是無關緊要的，不過我們從這地方可以認識出最堅強、最敏捷，而且能夠戰勝一切的人。

第二種理由，不但是悲慘，並且是十分惋惜的。這就是由於嫉妬、貪婪、野心，以及盜竊的觀念混合而成的人類劣根性。人類事件重大，大都難有這類邪念，這是十分可歎的。

當一個新運動發生，並且採取特殊的黨綱時候，就有許多人起來用這新運動的目的而奮鬥。然而，他們並不是真的忠心去參加這個新運動，而想獲得優先權，實在是想乘機竊取黨綱，以謀求自己另組新黨。

一九一八年到一九一九年間，有不少以「民族主義者」自命的新團體和新政黨。這些團體和政黨，係自然的發展，不能歸功於他們的創始人。到了一九二〇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慢慢地團結而成爲一個勝利的政黨。有幾個某黨的創始人，他們自知他們的運動沒有什麼成績，因此就十分迅速的犧牲了他們的個別運動，無條件歸附於強有力的運動；這種行爲，足以證明他們是確實忠誠的。

那連堡（Nurnberg）的德國社會主義黨（German Socialist Party）領袖詹留士·史特萊希（Julius Streicher）尤其是誠懇。兩個政黨的目的相同，但是不相依附而各自獨立。常史特萊希有一天確切地知道了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實力和發展，確是超過德國社會主義黨的時候，他就停止了他的活動，使他的同志，和優勝的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携手，實行合併爲共同的目的而奮鬥。這種果斷的精神，深堪讚美，能夠像他這樣實幹的。實在是難於可貴。

我們所不應該忽視的，就是世間一切的豐功偉績，必須靠自己個人的勝利，決不是靠群力的結合所能產生的。由群力的結合而得到的成功，決不能長久，因爲在開始的時候，已經就含有異日分化的種子，甚至前功盡棄。真正足以改變世界思想的偉大革命，除掉由單位力量所領導的猛

烈鬭爭之外，決不會有實現的希望，至於由群力所領導的事業，也不會有什麼完成的希望。

民族國家的創造，斷不是毅力薄弱的民族主義聯合會所能濟事的，祇有具備鋼鐵般堅決意志的單獨運動，才能打倒其他一切運動而獲得最後的勝利。

第9章 挺進隊的意義和組織

舊德國國力所維繫的柱石有三：就是君主、行政機關和軍隊。一九一八年的革命，把君主政體打倒了，把軍隊解散，把政權委託給腐敗的政黨了。國家的權威，因此就失掉了它的憑依。然而這三顆柱石，常常是國家的權威所維繫着的，也就是一切權威的基礎。

權威的第一要素，固然是群眾的一致擁護，可是，單單靠群眾來做基礎，那權威仍舊是十分脆弱而固的。所以權威必具的第二要素，顯然是武力了。如果群眾的擁護是武力兩者相輔而行，那麼不穩，到了相當時期，基礎便益臻穩固，而成為傳統的權威了。如果群眾的擁護、是武力、傳統與權威，三者合而為一，那麼，這權威可說是永不會發生動搖了。

革命興了起來，這種希望，便成為絕望。傳統的權威已經消失。舊帝國的崩潰，和舊帝國過去光榮徵象的破毀，已經把傳統的精神打破，結果，是國家的權威，受到了一個極重大的打擊。

就是支持國家權威的第二柱石——武力——也不復存在了。爲了要完成革命，各領袖大都不惜把舊帝國中有組織的軍隊，來加以摧毀，把這殘餘的軍隊，來從事於革命的鬭爭。

這種動不動就要改變的烏合軍隊，他們把軍役看作和尋常的八小時工作一樣。實在我們並不能希望他們能有助於國家的權威。所以第二種保障權威的要素也就消滅了。實際上，革命所賴以建立權威的，只是群眾一致擁護的第一種要素而已。

不論那一種民族，都可分為三等：最上等的是具有各種的美德，並且有犧牲的勇氣和決心的；最下的是民族敗類，他們祇知道自私、縱慾自利，放佚淫侈。在這兩者中的是第三階級，人數最多，他們既沒有英勇的決心，犧牲的精神，只有卑鄙枉法的自私行爲。

我們應加以注意的，就是這般群衆——我一向稱他們叫做中間階級——從來不會變成重要，祇有當最上等的和最下等的兩者在發生衝突的時候，始能顯示出他們的重要來。比方他們不管那一方獲得勝利，他們都望風披靡的去歸附勝利的一方。如果是賢者來握權，他們固然安心相從；可是被小人執政時，他們也絕不會反抗的；因爲中間階級，他們是絕不願有鬭爭的事故發生。

在歐戰告終時的情形大致是這樣：國內多數的中級人民，因爲迫於義務，已經有相當數目的人爲國捐軀；一部份最優秀的國民，差不多大都犧牲了，祇有那些最卑鄙的下級國民，靠了荒謬的法律保護，同時，他們又不遵從治軍條例，反而苟安偷生。我們的民族中，安安穩穩留下來的敗類，於是起來革命了；因爲一些優秀的國民，大都已經戰死沙場，沒有人再來對他們反抗了。

這班馬克斯主義的亂黨，他們不能專門靠着群衆的擁護，來維持他們的權威。然而，這些被擁護的權威，是新共和國所急需的；因爲他們不願在短期的混亂之後，就被我國碩果僅存的優秀分子所組成的討伐軍來撲滅。

具有革命思想，和從事革命的人，他們自然不能，而且也不願受軍隊的保護。因爲他們所願望的，並不在組織一個國家，而是在破壞現存的國家，他們這種思想，正和好亂成性的軍隊相吻

合。他們的口號，並不是德意志共和國的「秩序」和「建議」，而是國家的「掠奪」。

在這時候，有大批的德國青年，他們出來說，願爲「和平秩序」效力，他們身上穿了軍裝，背了槍械，戴了鋼盔，開始試行抵抗蹂躪他們祖國的人。他們在做義勇軍的時候是憎恨革命，但是，他們爲治安計，就不得不來維護革命，而使革命的基礎鞏固。他們的行動，完全是出之於他們的至誠。

造成革命和暗中操縱革命的國際主義的猶太人，他們對於當時的情勢，早已估量得十分的正確，他們知道德國並不像俄國，所以要使德國陷於布爾雪維克主義的流血慘劇，還沒有到時候。從前線歸來的將士，對這事情怎樣呢？德國的軍人能不能容忍呢？這些都是疑問。

在那時候，德國的革命，不得不有着十分和緩的表示。因爲要不如如此，德國的革命，可以在幾星期之中，被德國兩三師的軍隊完全擊破而消滅。在這時候，如果某師長和他的親信軍隊，決心扯下紅旗的話，那革命政府立刻可以置之於死地，或是用槍彈壓服任何的反抗，不到一個月，這一師的軍隊，必定可以擴大而爲六師。這是在暗中操縱着的猶太人所十分恐慌的。

革命的造成，是由於亂徒的暴動和掠劫，那些愛護和平秩序的人，是不在內的。革命的進展，是由於慢慢地和暴徒的意見相左，完全基於戰略，不是他們所能了解，而且也不合他們的脾胃。

社會民主主義逐漸地得勢，這種運動也就跟着慢慢地失去了他激烈的革命性。

在大戰還尚未告終的時候，帶有民衆惰性的社會民主黨，已經成爲國防的障礙了。在他們黨中極端活動的人物，脫離了該黨，而去組織成一種積極進攻的新陣線。這種新組織，就是爲革命馬克斯主義作戰的獨立黨（Independent Party）和斯巴達庫斯團（Spartacus Union）。不過，當德軍從前線退回來的時候，每個軍人都是虎視眈眈的，因此革命的進程，便又趨於和緩了，如果不是經過鬭爭，那是決不能如此的。在這變局還未曾實現以前，顯然有着兩大壁壘互相對峙，一是維護和平秩序的政黨，一爲流血恐怖的團體。小資產階級，自然是傾向於和平與秩序的政黨方面。

結果，到底爲了種種的原因，從前仇視共和國的人物，現在是不再做他們的仇敵了，而且幫助他們來征服共和國的敵人。再進一步的結果，就是從前擁護帝國的人物，他們原想要反抗新國家的，現在也不必再來杞憂了。

如果我們在舊帝國本身的種種缺點外，另外再去考慮革命成功的原因，那就可以得到下列的結論：

（一）因爲革命把我們的責任心，和服從觀念完全弄掉了；

（二）因爲當局許多政黨的怯懦無能。

第一種原因，就是因爲我國的教育，是一種沒有民族性，而純粹是國家教育的緣故。因爲從這種教育，去養成對於手段和目的的謬誤觀念。責任心和服從觀念，以及實踐他的本身並不是目的（這等於國家的本身不是目的），實在是爲扶助並保障社會生存的一種手段，用了這手段，去

維持精神和物質雙方的一致生活。

革命的成功，就是因為我國的人民（還是說我國的政府）不能了解上述許多觀念的真義，因而使這些觀念變成脆弱的空論。

關於第二種原因，小資產階級的許多政黨（也可以說是舊帝國下僅有的政治組織），既是把武力認為屬於國家的，所以只有靠文字來發抒他們的意見。在那時候，可以說是十分錯誤的；因為敵黨久已把這方法拋棄不用，公然喊着要儘量採用武力來達到政治目的的口號了。

小資產階級的各政黨，他們在沒有和新制度妥協之前，他們的政綱，還是靠着舊國家的事務上；然而他們的目的。確也願意在可能的範圍中，想在新環境中佔得一席的地位。不過他們唯一的武藝，還是和從前一樣，靠着那空談的文字而已。

在當時有能力而敢反對馬克斯主義，以及受馬克斯主義鼓動的缺衆，最初當選「義勇團」（Free Corps），接着是各種自衛團體和民團（Einwohnerwehr），最後是傳統的勢力。

過去，馬克斯主義的獲得成功，是因為他們運用政治的決心和暴力。民族主義的德國，所以終於沒有完成他們的發展希望，就是因為他們缺少暴力和政治野心堅決合作的緣故。

民族主義的各黨，不論他們具有怎麼樣的政治野心，因為他們沒有戰鬥的能力，所以不能憑鬥爭去達到他們的目的。

保守的民團是有此實力的，他們是巷戰的能手，可是，他們缺乏政治觀念和目的，所以他們的力量，對於民族主義的德國，也沒有什麼利益。

猶太人利用了報紙的力量，來宣傳民團「非政治性」的觀念。倒頗獲得成功，恰好像他們政治的技能，往往宣傳他們的鬭爭，是「合於理智」的鬭爭。

缺乏偉大的新觀念，常是缺乏戰鬥力的一種徵兆。如果能夠深信改革後的新制度，必定會獲得勝利的話，那麼，對於武器最殘酷的，也必定會相信而有運用的權利是同樣荒謬的。

一種運動，如果不能爲了這種高尚的理想和目的而加以奮鬥，那麼必定不能堅持到底的。

法國革命，因爲能夠產生出一種偉大的新觀念，因此他們就發現成功的秘訣；俄國的革命也是這樣的，法西斯主義是完全由理想去發生力量，他們的思想，在使整個的民族復興，結果是爲他們的民族造福不淺。

國防軍的組織統一以後，馬克斯主義也慢慢地獲得了他們權威所必需的力量，於是就以不必要的藉口，去解散那似乎帶有危險性的民族主義民團，這是勢所必然的。

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創立，是一種新運動的象徵，他的目的，並不在小資產階級政黨的死守着舊狀態，恢復一切的舊觀念，而是在建設一種新的有生氣的民族國家，去替代這時無意義的機械國家。這種新興的運動，因爲確信他的新主義，有着極端的重要，所以認爲如果能夠達到目的，就不惜任何重大的犧牲。

在世界史上，常有這樣的事情：大概根據一種世界觀而引起的恐怖時期，往往不是政府的權威所能破壞的；但是，這恐怖時期，常爲一種新的世界觀（也同樣有着勇敢而決心的）所屈服。

固然，處在政府的地位以維護國家的，或者不免要對此稍感不快，可是事實是不容抹殺的。

我國正被馬克斯主義所蹂躪着，我們的當局者，既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九日，無條件投降了馬克斯主義，此後他斷不能突然起來把亂戡平。反過來，高踞閣席資產階級的許多傀儡，他們祇是說着空話，認為「工人」不可反抗，足見他們談論到「工人」的時候，便聯想到馬克斯主義了。

我已經說過，我黨爲了要保護我們的集會起見。曾經組織了一個隊伍，而且這隊伍，以後慢慢地採取了軍隊性質來維持秩序，並希望他努力前進，成爲擔任組織工作的集團。

這一個集團，最初不過是單單爲集會而設的衛隊。所以他的任務，不過在使我們的集會，不受敵人的搗亂而中止。他們所受的訓練，專門向敵人攻擊，並不是像德國人民黨中的那些笨蟲所宣傳以械鬥爲目的，實在是因爲他們十分明白抱有理想的那種人，如果一遭到狙擊，那麼理想就無從實現了。這是在歷史上常常見到的，一些偉大的領袖，死在宵小的賊子之手。所以，他們並不以暴力爲目的，他們是保護宣布偉大理想的人，免除遭受暴力的危害，他們又知一個國家，如果不能去保護民族，那麼，他們就不應該去保護這個國家；因爲他們的職責，是在保護民族，努力抵抗那些危害民族和國家的壞人。

所謂挺進隊，不過是我們黨中的一部分，正像宣傳、報章、科學機關等，各爲我黨的一部分一樣。

組織挺進隊的基本要義。除了嚴格的體格鍛鍊之外，還把隊員們訓練爲絕對信從民族社會思想的代表，並且力求整飾他們的紀律。這和一切小資產階級防衛組織絕不相同，就是和其他的秘密組織也不相同。

在那時候，我竭力反對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挺進隊，使他們擴充而成爲一種防衛的團體，這是有着下面的理由的。

就事實來說，私人的防衛團體，如果沒有得到全國的力量來贊助，那是決不能實行民族的防衛。要使「自動的訓練」，成爲一種具有軍事價值，而能達到適於一定用途的目的組織，那是一件絕不可能的事；因爲他缺乏一種發號施令的力量；這力量便是一種懲罰權。在一九一九年的春天，我們所以能夠召募「義勇軍」的緣故，就是因爲多數的義勇軍，他們大家都從前方歸來，而且他們又是曾經受過舊式軍隊的訓練。可是，現在的「防衛組織」，那就完全缺乏這種精神。

我們且不去管一切的困難，假定有某一種團體，能夠不避困難，爲德國造成許多的人才，使這許多人材都具有真實的情感，和充分的軍事訓練，所得的結果，也是要失敗的。因爲現在我國不但沒有企圖養成這種軍人，而且對這軍人還加以深惡痛絕呢！因爲這是和禍國殃民各領袖的隱衷絕不吻合，這就是現在的實在情形。在數年之前，國家曾悍然犧牲了八百五十萬受過高等教育優秀軍人，事後不但加調用，而且反受着人家詛罵，認爲是犧牲的報應，現在政府又要秘密訓練幾萬人，這豈不是笑話！國家的執政人，既污辱了最光榮的士兵，撕毀他們勳章，踐踏他們

的旌旗。漠視他們的功績，像這樣的國家，我們還能希望他來訓練士兵嗎？再退一步來說，我們這國家的掌權人。曾否設法去恢復舊軍隊的光榮，和嚴懲破壞國家軍隊光榮的人？這我確不曾聽到過。他們反而安居高位，而且像雷不茲（Leipzig）還說「權力就是公理」呢！因為現在的權力，既完全落於當年策劃革命人的手中，而這種革命，是最為沾污德國歷史而罕見的賣國行為，所以要組織新軍隊來助長他們的權力，實在是毫無理由的。這是一切明白的人都要反對的。

如果我國現在採取有訓練的防衛軍制度，但是，這制度絕不能用於防衛國外的民族利益，而祇能用以保護國內的那些壓迫民族，終有一天，會因觸犯受欺騙的民族公憤而引起反抗的。

因此之故，我們的挺進隊，絕不能容許和其他軍事組織有了怎樣的關係，他們純粹是保護並教導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工具，他們的任務，和那所謂國防軍是截然不同的。

挺進隊並不是秘密組織，因為秘密組織的目的，純粹是一種非法的行動。

不論過去和現在，我們所需要的，並不是那一二百思想謬妄的叛徒，而為數十萬能夠替我們的世界觀不斷地努力奮鬥的戰士。所以他們的工作，決不是秘密結社所能了事的，必須要群策群力去進行的。這種運動，絕不能靠了手槍和利刃，或是毒藥來推倒一切障礙而攫取民衆的。我們須明白地去教訓馬克斯主義的黨徒，將來支配群眾的，必定是民族社會黨，將來執掌國權的，也必定是民族社會黨。

秘密結社，還有一種危險，就是他們的社員，常常不能完全明白他們自己工作意義的偉大，

並且容易妄想以爲用暗殺的手段，就可以達到救國的目的。這種觀念，如果徵之於歷史，當一個民族，呻吟在專制的暴政下面，受着壓迫的大衆，大都又有過人才智的時候，這種現象時常會發生的。在一九一九年至一九二〇年間，秘密結社的社員，他們既被歷史的先例所鼓勵，又感於祖國的創深巨痛，因此想到如果把國家叛賊來殺掉幾個，或許會解救民族的困難。這種企圖，都是愚妄可笑的；因爲馬克斯主義所以能夠得到勝利，並不是他們的領袖有了卓越天才，實在是由於小資產階級過於庸懦無能。

挺進隊既不是軍事組織，又不是秘密結社，牠的發展，須根據下列原則：

(一) 挺進隊的訓練，不必根據於軍事原則，而應該以最有益於我黨的作爲標準。每個隊員必須要具有健全的體格，所以重視的不是軍事的操練，而是各項運動的演習。我常說拳術比平常的射擊演習還重要。

(二) 爲了要避免挺進隊帶有秘密的色彩起見，不但他們的服裝，須爲大家容易辨別認識；就是爲了我黨的利益而採取的工作步驟，也須明白地規定出來，使得個個人知道。挺進隊並不許秘密集會的。

(三) 挺進隊的編制和組織，在制服和設備方面，都不宜去抄襲舊式的軍隊，而且須審慎的着重於適應目前的任務。

挺進隊的發展對於下述的三事有着重大關係：

(一)一九二二年夏天，各愛國團體大家在慕尼黑廣場 (Konigsplatz) 舉行總示威運動，反對保守共和國的國防法律。民族社會黨也去參加這種運動的，由六個慕尼黑的隊伍去做領導，而以政黨的各支部繼續殿後。我恰好忝爲講員之一，所以能躬逢其盛，得有機會對六萬的群眾來演講。那次的防禦十分的周到，所以共產黨雖然多方的恫嚇威脅，然而這次的示威運動，到底是得了一個極大成功。這就是慕尼黑民族主義能夠在市街上能作遊行的第一個明證。

(二)一九二二年十月出發柯堡 (Coburg) 去遠征。「民族主義」的各團體，大家決定在柯堡舉行德國紀念日 (German Day)。當時我也被邀赴會，我是帶了幾個朋友同去的。我選了挺進隊八百人，乘坐專車同赴該鎮，當時該鎮已屬於巴維利亞。

火車到柯堡站的時候，「德國紀念日」籌備處，派代表來迎接我們，說是奉了當地工會——就是獨立黨和共產黨——的命令，規定我們在進城的時候，不得揚旗奏樂——我們的樂隊共四十二人——而且不得結隊同行。當時我就拒絕這種可恥的條件，並且對「紀念日」的籌備者，以及同意於這種規定的人，不能不表示一種驚異，因此我對他們宣稱挺進隊就要整隊揚旗，奏樂進城了。

在車站的廣場上，向我們高聲叫罵的不下數千人。他們罵我們爲「暗殺者」、「土匪」、「強盜」、「罪人」等等不堪入耳的字眼。然而我們的挺進隊依舊秩序井然。我們走到鎮市中心的市政府，警察爲了阻止群眾的追隨我們。所以就吧門關上了，我覺得這是不可忍受的恥辱，所以

要求警察開門。但是他們躊躇良久，結果仍舊照我的請求把門開了。我們從原路回到駐紮處，終於和群眾碰到了。那些真正社會主義、平等、博愛的代表朋友，就向我們投擲石子，我們忍無可忍了，所以我們就向他們回打了大約十分鐘。在一刻鐘以後，街上不再見有共產黨的影蹤了。

在當天的晚上，就發生了嚴重的衝突。民族社會主義黨員受着攻擊，正在情況十分危險的時候，挺進隊的巡查隊，就立刻奔馳救援。很快的擊敗了敵人。到了第二天早晨，數年來柯堡所感受的紅色恐怖，從此就消滅了。

第二天，我們走到街上，聽說有一萬工人舉行示威運動，實在到達的不過幾百人而已。當我們走近他們的時候，他們大家都力持鎮靜。有些從外方來的紅色團體，他們還不認識我們，所以起初則各處尋覓。想來和我們鬧一鬧，可是終於使他們受到教訓而中止了。久在威脅之中的群眾，到這時開始慢慢地覺悟，敢來向我們作歡呼；在當天晚上，我們同他們告別的時候，歡呼的聲音就圍繞在我們的四周了。

我們從柯堡所得的經驗，知道挺進隊必須要有制服；因為制服不但可以鞏固團體的精神，而且在鬭爭的時候，還可以免去敵我混亂不分。以前，挺進隊僅僅佩有臂章，此後就著短襖和戴帽子，這帽子現在已經是衆人所共知的了。

因為久被紅色恐怖盤踞的各地，凡不是共產黨的團體，嚴禁在該處集會；所以，我們必須按照一定的計劃，去往各處撲滅赤禍，並且重行確立集會的自由；我們現在已經十分明白這一着的

重要了。

(三)一九二三年三月，有一件事發生了，這使我不得不把運動的方向來轉換一下。是年初，魯爾(Ruhr)被法軍所佔領了，說對於挺進隊發展的影響是十分重大的。

我們從國家的利益上着想。這件事，用公開的演說或是文字的討論，已是不可能，而且民族也沒有利益的。法軍佔領魯爾，我們並不驚異，我們反而因此可以希望我國拋棄怯弱的屈服政策，而防衛團體，也就有了確定的工作可做。我們的挺進隊既是數千壯士所組成的，自然也應該分擔着效忠民族的職責。因此於一九二三年春夏之間，實行把挺進隊改組，使他們變成一種作戰的軍事組織。以後挺進隊的發展，都是造因在此。

一九二三年年終，所發生的事變，乍看起來，像是令人討厭的；可是從遠處着眼，那也是必要的；因為受了這事變的打擊，挺進隊便中止了改革計劃，這是爲了當時的計劃，實在是有損於我們的運動緣故。同時，這類的事變，我們被迫而離開正軌的地方，將來還有重行改進的可能。(註：這是指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希特勒暴動」的失敗而言)。

一九二五年，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改組，並且依據前面所敘述的各原則，從新再組織挺進隊。我黨必須恢復本來的健全觀念，而且還須認定最高的任務，使挺進隊成爲本黨世界觀，以及防衛鬭爭的工具。

我黨絕不能容許挺進隊淪爲防衛團體，或是秘密組織，並且還須設法使他們成爲十萬人的衛

隊，用以保護民族社會主義的觀念，也就是保護深刻的民族觀念。

第10章 虛偽的聯邦主義

一九一九年的冬天，尤其是在一九二〇年春夏兩季，我黨對於在大戰時已經趨於嚴重的問題，不得不採取一種態度。這點在本書的第一部中，已經照我所見到的，把德國崩潰的徵兆，大略敘述過了，尤其是對英法所指使的擴大南北德意志間舊有裂痕的宣傳計劃特別加以注意。一九一五年的春天，煽動反對普魯士的報紙出現了，它們認普魯士是大戰唯一的禍魁。到了一九一六年，這些狡獪無恥的宣傳手段，已經醞釀成熟，他們不惜利用人類最卑劣的本性，來鼓動南德意志反對北德意志。不久，他們的煽動就發生了結果，政府和軍事當局（尤其是巴維利亞的軍事當局）實在不能不負相當的責任；因為他們對於這種卑下的宣傳，竟是看它滋長起來，優柔養奸，未能立即採取斷然的手法去防禍於未然之。他們反而好像是不關痛癢，不知道這種宣傳，不但有損於德國民族的統一，並且還助長聯邦的勢力呢！從有史以來，因為疏忽而得到的懲罰，從來不曾有比這更甚的。從此，普魯士就一蹶不振，危害到整個的德國，而促使其崩潰。這不獨在德國有着亡國的痛苦，各邦也同歸於盡了。

在當時，柏林的市民，對於普魯士的痛恨，達於極點，這種惡劣的空氣，完全是受人慫恿而激成的，他們對皇室的反抗，實為革命的起點。如果說，人民對普魯士的反應，純粹是為敵方的宣傳而致成的，那也不盡然。因為我國戰時的經濟組織，騙取全國的財力，完全集中於柏林，這

種荒謬的制度，就是市民對普魯士發生反感的主要原因。

狡黠的猶太人，他們並不是不知道，他們借了戰爭團體的美名，以從事無恥的掠奪，而使日耳曼民族受到危害，必定會遭到反對的。但是，當日耳曼民族沒有受到攻擊的時候，他們一些也不驚恐。因為戰爭對他們並沒有什麼損害。於是猶太人遂生出一計，要使挺而走險的群眾，對他們不起反抗，不如激起他們的憤怒，而使他們自己去胡鬧。

後來革命就爆發了。

國際主義的猶太人柯爾特·愛斯納爾，就開始挑撥巴維利亞反對普魯士。他所以這樣的處心積慮，使革命運動在巴維利亞發動，使巴維利亞的民衆，反對國內的其他各地，這並不是他們的民衆爲巴維利亞打算，實在他們是完全盲目的，受着猶太人的指使。猶太人利用巴維利亞人民固有的天性和嫉忌，以便使德國傾覆。如果德國一朝崩潰了，那麼，德國受布爾雪維克主義的魚肉，自然是毫不困難的。

共產黨的煽動者，他們說委員會制共和國（Republics of Committees）如果因反抗軍的進展，而遭受到傾覆，那就好像是反普魯士和反軍國主義的組織，被普魯士的軍國主義所克服是一樣的。他們這樣的宣傳詭計，竟得到很大的成效。當巴維利亞立法議會選舉的時候，愛斯納爾在慕尼黑所有的黨徒不到一萬人，共產黨也不到三千人，到了委員會制共和國傾覆以後，這兩黨連合在一起，黨徒竟增加到十萬左右。

我覺得我所做的事，從有生以來最不能得到人家同情的，要算是反抗這種反普魯士運動了。在委員制的時代，慕尼黑舉行第一次的民衆大會，在那時會場中對於德國其他部分的嫉恨，真像瘋狂了一般，尤其是對普魯士最爲厲害。那時如果有一個北德意志人參與會議，說不定就有性命的危險。這種示威運動，在將要散會的時候，常常狂呼「脫離普魯士！」「打倒普魯士！」和普魯士宣戰！」——在德國國會中，有一個維護巴維利亞主權的出色人物，他竟高聲狂呼「情願死了做巴維利亞的鬼，不願生着去做普魯士人」。這真可說是一針見血的話了！

我所作的奮鬥，起初只有我一個人，後來才得歐戰時許多同志的幫助，我敢說現在已經成爲「新運動」中的一種神聖天職。這是我現在可以引爲自豪的，就是他們那種荒謬叛亂的結合，所以終歸消滅的原因，實在是全靠我們巴維利亞同志的力量。

反對普魯士和聯邦主義是毫無關係的，聯邦運動，他的目的，如果只是破壞或解散另一邦，那是十分不當的。一個真正的聯邦主義者，他既不把畢士麥所說的帝國觀念作爲空口說白話，那麼，對於他所慘澹經營的普魯士，自然不應該存有分割的念頭，因爲普魯士是畢士麥所開創和完成的地方。尤其不可理解的，就是所謂聯邦主義者的挑戰，在對付普魯士，而普魯士和十一月革命是毫不相涉的。他們的攻擊指摘，並不是對手創威瑪憲法（Weimar Constitution）的人而發的，（那些制憲的人，以南德意志和猶太人爲最多）是對富於保守性的舊普魯士代表而發的。這班代表，和威瑪憲法正相反對。他們所以小心謹慎，惟恐觸犯了猶太人，那是毫不足怪的。

但是個中的謎團，竟因此而真相大白。猶太人的目的，便是在使德國國內的民族互相鬭爭——使保守的巴維利亞人，去反對保守的普魯士人，而他們便可因此而獲得成功。

一九一八年冬天，在德國各地，反猶太人運動慢慢地興起來了，猶太人還是用着他們的老法子，以敏捷的手腕，去挑撥群眾運動，使群眾間有一個新裂痕，使他們反對猶太運動的勢力分散開來。在當時，足以引起公眾注意，而不使猶太人成為衆矢之的，就是猶太人提出天主教教皇全權（Ultramontan）的問題，以及由這問題而生出的新舊教種族的爭論。那個提出這問題禍害我民族的人，真是罪無可赦。猶太人目的已經達到眼見着舊教徒和新教徒的互相爭鬭，他們很是快意，亞利安族和基督教的敵人，沒有。

這五派的基督教，他們眼看着上帝所賜給人類寶貴而優越的生存，橫遭這種不幸的玷污和摧殘，竟是毫不介意。要知道世界的將來，主要的並不在新舊教徒的誰勝孰敗，而在亞利安人的生存和滅亡。現在，兩派還是照舊鬭爭，他們不去反抗那滅亡亞利安族的敵人，而只是一味的自相殘殺。

在德國，不許反對教皇全權主義，或牧師全權主義，但是，在其他各種純粹舊教國，倒是可以的。因此，德國如有反對運動，新教徒必定是參加的。舊教徒在別國可以防衛他們的領袖，去對抗政治上的攻擊，但是在德國，那種防衛，便演成新舊兩教的爭鬭。

其他一切，都有事實證明，用不着加以詮釋的。一九二四年，忽然有人認識民族運動的主要

使命，就是在反對「教皇全權主義」，可是，他們不但不能推翻「教皇全權主義」，反而去使民族運動發生分裂。因此，我必須要來警告民族運動中的幼稚輕浮分子，不要夢想能夠做畢士麥所不能做的事。不論什麼企圖。凡是足以使我們的運動捲進這種漩渦的，都要加以堅決的反對，並且從我們的隊伍之中，去擯棄從事於這種宣傳的人。這兩件是領導民族社會運動者的主要任務，一九二三年的秋天，我們在這一方面實在獲得了很大的成功，熱烈的新教徒，和熱烈的舊教徒，他們在我們的隊伍中大家都能相安無事，對於宗教的信仰，絲毫沒有良心上的衝突。

德國究竟成爲聯邦政府好呢，還是成爲單一的政府好呢？

什麼叫做聯邦政府？

所謂聯邦政府，就是多數自主國的集合體，根據各邦的主權而自動結合的。至於保障聯邦政府生存所需要的主權，那就是各邦所讓給聯邦政府的。

現在全世界所有的聯邦政府，在事實上都知道這種理論的方式不合，尤其是北美合衆國爲甚。因爲亞美利加合衆國並不是成之於各州，實在是各州都由合衆國所造成的。各州所享的大權，不僅是適合聯邦的特質，而且和各州所佔面積的廣度也相稱的。所以當我們談到亞美利加各邦的時候，不能說他們享有國家的主權，不過是享有憲法所規定的保障權利，或者把這種權利稱之爲特權。

上面的理論，對於德國並不完全相合，因爲德國各邦原本獨立。帝國就是由各個獨立邦所組

成的。可是，帝國的組成，並不完全是出於各邦自願的平等合作；乃是因爲其中的普魯士，對於其他各邦握有霸權的緣故。德國各邦的區域，大小並不一樣，不能去和亞美利加合衆國相比；各邦既是大小並不等，那麼對於帝國的締造，和聯邦的構成，爲力所作的貢獻，也互有差異。所以我們不能說各邦多數都享受到真正的「主權」。

各邦爲成就帝國的主權，而去犧牲自己的主權，他們大都不是出之於自願。實際上，大都本沒有主權的存在，或者，因爲他們的主權在普魯士壓力之下已經喪失了。畢士麥所走的原則，並不是去把各小邦剝而使之歸於帝國，不過看帝國的絕對需要而再取之於各邦的。但是，讀者諸君，請不要發生誤會，畢士麥也並不在使帝國立刻得到國家永久所需要的一切權利，而是在把一時難於取得的留着將來慢慢地再去取得。這在事實上是犧牲了邦權，而使國權一天一天的增長。日子一天一天過去，畢士麥所希望的也就逐步的完成了。

德國的崩潰，以及專制政體的顛覆，自然更促進了這種制度的發展。

國家的聯邦性質，因此而遭受了一個重大的打擊；同時，又因接受和約的義務，所受的打擊更爲重大了。

國家自從戰敗後，必須履行兵費賠償的義務，因此各邦就失掉了他們的財富管理權，而統歸之於國家，這是十分明顯的事；但是，單靠各邦的稅收，那是絕不能清償這種債務的。因此，國家就進一步而決定收取鐵路、郵政，這是我民族在和約的拊制之下所必走的步驟。

畢士麥的帝國，是自由而沒有束縛的，它不受財政上的債務壓迫，恰恰還像現在德國所受道威斯（*Dawes*）計劃的壓迫是一樣的。當時的國貨，只限於一些國內絕對所需要的事項，所以不必要財政上的優越權，各邦的納稅，已經足夠國用。因為各邦的納稅既少，而且又能各自享受主權，所以他就甘心樂為帝國的屬邦了。但是，如果說現在各邦的不滿意，那是因為受國家財政的束縛，這也不是確切的言論，而且和事實完全不符。各邦所以不滿意於帝國，這並不是因為他們主權失掉的緣故。那是為了現在的帝國政治組織，不足以代表日耳曼民族的緣故。

爲了這緣故，現在的國家，爲圖自存計，就不得不慢慢地削減各邦的主權，而且不但在一般的物質方面是這樣，就是在理論上也是如此。因為國家洞察了這種剝削政策，已經吮盡人民的膏血；所以不得不盡奪他們的主權，俾免人民因不平爆發叛變來。

下列的基本原則，是我民族社會黨人必須承認的：

一個強有力的民族國家，如果對外能保護國民的利益（就最廣義言），對內必定能給人民以自由，這樣，國家當然可以堅固像若磐石了。在另一方面，一個強有力的國民政府，不妨去干涉個人的自由，以及各邦的自由，但只要不去損害國家的觀念；不過須人民能夠確認這種政策的目的，是在造成這種民族的偉大性。

事實上，世界各國沒有不趨向於國內政策統一的，所以德國也不能例外。

現在國家所行的統一政策，特別是在交通方面，在表面，不論是怎樣的名正言順，可是它的

目的，不過僅在袒護一種禍國的外交政策而已，所以我民族社會黨人應該竭力來加以反對的。現在國家想把鐵路、郵政、財政等，完全收歸國有，以圖操縱，俾能償其無窮的債務，這並不是一種遠大的民族政策。我民族社會黨人，必須竭力來阻止或是預防這種政策。

猶太人所操縱的民主國（Jewish Democratic Reich）已經成爲德國民族的禍根，這是反對中央集權政策的另一理由。各邦有不和他們同流合污，起而加以反抗的，就要遭到摧殘，使他們失勢而無力再來反抗。

我們必須抱有遠大的民族政策的立場，萬不可失之狹隘，或是偏袒邦權。這一點我們必須要加以深切的注意，以免我黨向志，誤解我民族社會黨將否認國權應高於邦權。要知道這種國家，那是無可疑問的，而且也不應該有疑問的。由我們看來，國家的本身，只是一種形式。他的本質是在其民族和人民，所以一切必須以民族的利益爲依歸。我們不能在一個民族和國家（國家是民族的代表）內，去承認某一邦可以享有獨立權，儼然像一個獨立國一樣，如果各邦在國外有設立使館等的荒謬事件，那我們必須加以禁止的。否則我國的國基是否穩固，不免要引起外人的懷疑，並且還要根據這種懷疑而來決定對付我國的策略。

各邦的重要性，將來應該側重在文化方面。巴維利亞爭得好名的皇帝路德維格一世（Ludwig I）他並不是反對德國，而竭力維護邦權的君主，他同情於大德國的觀念，也像他同情於藝術一樣。

於藝術一樣。

我們必須使軍隊不受各邦的勢力影響。在過去，國家每迫使軍隊從事於一種絕不應該做的工作，將來的民族社會主義國家，萬萬不可再來蹈此覆轍。德國軍隊的目的，並不是單在維持種族的特性，而是在使德國人能夠互相了解，互相提携。凡是足以使民族分裂的目的，完全應該用軍事訓練來加以矯正，而使他們團結一致。所以兵役必須擴大青年的眼界，使他們不要被鄉土的觀念所拘禁，能夠自己知道自己是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青年所必須加以注意的，就是祖國的邊境，而不是家庭的畛域，因為將來他們所應該捍衛的，是祖國和國境。所以德國的青年，不可只是株守家園，而應該在服兵役的時候，認識德國究竟是什麼。這在現今是尤為必要的。因為現在的德國青年，已經不再像從前常常旅行而去擴大他們的眼界了。

民族社會主義的綱領，不是在單做某一邦政治利益的工具，而是在領導整個的日耳曼民族。所以它的綱領，必須決定整個的民族生活而重新來創造。因此，必須要取得權力而不為邦界所限。因為這一種界限，原是根據我們所反對的政治運動所造成的。

第11章 宣傳與組織

宣傳必須要進行在組織的前面，而且須廣攬人材，作為組織的成立基礎。我常常恨那草率和迂拘的組織，因為他們所得的結果，大都是黯然而沒有生氣的。爲了這緣故，我們如果採取宣傳方法，從一個中心點去廣播某種觀念，然後再就所得的人材當中，審慎地去選擇領袖人物，那是最要緊的。常有一種人，初看像是毫無顯著的才能，豈知後來竟是卓越的領袖人物。

大家都以為領袖所必須具備的特質和能力，就是理論上的豐富知識，那是大誤而特誤的；因爲在事實上往往是適得其反的。

大理論家，就是大領袖，那是少有的。煽動家，大都具備着大領袖的才具。自然，這種才具，不是純用科學方法去研究問題的人所樂聞的。煽動家，雖然不過是一個狹點的政客；可是他既能將某種觀念傳播給民衆，可見他必定是一位心理學家。如果叫他來做領袖，必定較不通人情的理論家爲優。所以講到領袖的才能，就是指能夠鼓動羣衆的才能而言。理想家和領導羣衆的能力，是截然迥異的兩件事。假使一個人能具備理論家、組織家和領袖的本領，這真是了不起的偉大人物了；然而，這究竟是世界上少有的事。

前面我已經說過，當我黨在運動開始的時候，對於宣傳這一點，我們就加以十分的注意。宣傳的使命，就是在使一小部分的中心人物，能夠接受新主義，俾造就將來組織的時候所必需的

子。在這過程之中，宣傳的目的，實在比組織的目的，更為重要。

宣傳的工作，就是在孜孜不倦的為自己的主義，攬招信徒；而組織的目的，就是使信徒之中，最優秀的份子，成為忠實的黨員。至於信徒們辦事的效能怎樣，才幹怎樣，智力怎樣，人格又是怎樣，這都不是宣傳的本身所應該去顧慮的；因為宣傳的目的，就是在招攬信徒。至於在群眾中去慎選幹員，俾能推進運動，而使主義能夠到達成功之路，那便是組織方面的工作。

宣傳的第一個任務，就是替未來的組織，設法羅致人才；而組織的第一個任務，就是任用羅致來的人才，去促進宣傳。宣傳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用新主義去打破目前的現狀；而組織的第二個任務，就是爭取權力，俾希望達到新主義的最後勝利。

組織方面的要務，就是在注意黨員，不因內部的不和而引起分裂，致使運動工作，因而陷於衰弱的地步；另外還須注意奮鬥的精神，不致萎靡，要再接再厲，益臻強固。爲了要達到這種目的，所以要注意不應該去濫招黨員，因為人類中只有少數的人，具有毅力和膽量；如果一種運動的黨員，要是漫無限制的招收。那麼這個運動終有衰敗的一天。

如果單是為自衛計，那麼，一種運動而要想維持着它的勝利，就得要限制黨員的人數；就是以後想擴大組織，也需要詳加考察，審慎出之。惟其如此，才能使這運動的幹部時時更新，日益健全。幹部必須要握着指揮運動的全權，——換句話說，就是決定宣傳的內容，以便博得世人的贊同，總攬一切的權力，進行一切的工作，以謀理想能夠達於實現。

我主持黨中的宣傳事務，那時非常小心的，而且不但要替將來的偉大運動，留下發展的餘地，還宣傳着最激烈的原則，去吸引那些最優良的份子，來加入我黨。我的宣傳越是激烈驚人，那些性格怯弱而信仰不堅的人，越是生着畏避的心，而不敢來侵入我們組織的幹部。這些都是有益於我黨的。

當時，我採取強有力的方式，來用作我黨的宣傳，使我黨的運動日趨於激進；從此以後，凡是加入我黨的人，便多是激進的份子了。

這種宣傳，不久就有了成效，有幾十萬的人數，不但深信我們是對的，而且極希望我黨能夠得到勝利。因為他們是怯弱而不敢犧牲的。

直到一九二一年，這種吸收同志的工作還是不錯，而且對於我黨的運動是有百利而無一弊的。不過在這一年的夏天，由某種事件顯示了我黨的組織，不及我黨的宣傳，於是宣傳的成效，也就日見顯著了。

從一九一九年到一九二〇年，黨員大會選出了一個委員會，來指導黨的運動。很滑稽的，這是一個委員會竟採取我黨所極端反對的議會制度。

我不願附和這樣笨的辦法。不久，我不再去出席委員會了。我祇有為我自己作宣傳，不問其他的一切。我不聽任何無知者的勸誘，而改變方針，同時也不去干涉他人份內的事務。

等到新章程一經採用，我就被選任為黨中的總理，因此我便取得了必要的威權及附帶的權利

，這種愚笨的辦法也就立即廢止。用實行專責的原理，去代替委員會的合議制。總理是負責這個運動全責。

日子長久了，大家就公認這種原理是合乎自然的，至少在黨的統治上應該如此。

委員會徒具空談，而毫無一些成績，所以如果把它來解散，最好是使他們去從事實際工作。眼看着他們一聲不響的離職，以後不知到那裏去了，不禁要令人笑起來。因了這事更使我想到了同樣的大制度，那就是國會（Reichstag）。如果叫那些坐談的職員，去擔任實際工作，尤其是要他們各人對於工作須負責任的時候，他們必定會迅速的鳥獸散了。

一九二〇年十二月，民族觀察報（Völkischer Beobachter）由我們來接辦了。這個報紙，我們從名字上就可以知道對於人民的意見是多所愛護的，現在，變為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的機關報了。最初，每星期刊行兩次，到了一九二三年的春天，改為日報；又到是年八月底，於是便擴展而成為人所共知的大張形式了。

民族觀察報是一種「民族」的機關報，它有着長處，自然也有它的謬誤和弱點。它的內容雖然不錯，然而它不能作為商業經營。原想此報由民衆來定閱，以報費來維持生存的；可是它不知道和他報去競爭，以謀自己的生存，徒然用愛國人們的一些報費去彌補營業不良的損失，而且他們還不知道他們自己的不當。

我看到了這種危機，於是頗費苦心的去亟謀救濟。在一九一四年大戰的時候，我曾認識了馬

克斯，阿曼（Max Amann），他現在本黨中擔任着事務主任，一九二一年夏季某日，我偶然碰到這位軍隊中的老友，我便請他擔任黨中的事務主任，因為他在那個時候已經有了優缺，所以遲疑了好久，才開始答允。可是有一個條件，就是不願意被庸碌的委員會所牽制，而願意對唯一的領袖負責。結果乃挑選了幾個人去任報館編輯。這幾個人以前曾隸屬於巴維利亞人民黨的；但是，依他們的工作成績而論，那是極能勝任的。這種試驗，成效卓著，這就是因為本黨能以忠誠坦白的態度去賞識人才，所以能夠使職員心悅誠服，比較往日所收的效能，尤為迅速而穩固。以後他們便成為良好的民族社會黨黨員。非特他們的言論是這樣，而且還能見之於實行。他們在吾黨新運動中所做的工作，都很切實、堅定，而出之於至誠。

在兩年當中，我的見解慢慢地獲得了實現；至少就最高的領導機關而言，我的見解，在現在黨中已經成為極自然的事了。

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的事件，足以證明這種制度已經獲得了成效。當我在四年前加入這運動的時候，那時黨中還沒有一顆橡皮圖章。到一九二三年十一月九日，我黨遭到解散，財產全被沒收，一切貴重的物品，以及報紙的所植，總數已超出了十七萬金馬克了。

第12章 工會問題

我黨運動的迅速發展，使我們不得不於一九二二年採取一種態度，來對付某一項問題，這問題直到現在，還沒有完全解決。我們曾竭力研究用一種最敏捷而最簡易的方法，使運動深入到羣衆的心裏，但是常常會碰到一種阻力，因為維護工人職業上和經濟上的利益，如果永遠和我們的意見相反，而工人的政治組織，也操在他們的手中，那麼，工人決不會完全來歸附我們。

在本書的第一部中，我已經論及工會的性質、目的、以及工會的重要。照我的意思，如果不是用國家的政策（這種政策也是常常沒有結果的，）或是教育上的新理想，使僱主對於工人的態度，稍微有些改變，那麼工人除了從經濟生活中的平等權利上着想，去保護他們自己的利益以外，沒有其他的辦法。我繼續說，如果因為這個緣故，而無法去防止一切常使社會生活受重大損害的不平，那麼這種保護的行爲，實在是有害於整個的民族社會的。我又說在僱主中，如果還有不知道社會的義務，甚至或不知道人類最基本的權利的，那麼工會當然是有着它的必要。

依照目前的事態來觀察，我深信工會決沒有可以廢除的。實在，工會在民族的經濟生活中，確是一個十分重要的制度。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目的，是在替人民實現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我們確信將來在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當中，每一種制度，必定要把這種運動的本身作爲根基。如果說握有了權力，就可以

實行無論怎樣的改革，既不必有什麼運動來作爲基礎，也不須去徵求對於這種運動素有訓練的人才，那麼，這是一種十分謬誤的見解。在這裏，就有了一個原則，就是精神往往重於形式，因爲形式的創造，是十分快速的。

決沒有一個人能夠在他的文件夾中，去取出一張新的憲法草案來，並且再希望能夠憑藉一紙最高機關的命令，就可以「施行」的。這一種草案，雖然可以試驗，然而決難久存，差不多和流產沒有兩樣。我記得威瑪憲法在產生的時候，有人想用一種新憲法和新國旗，來欺騙德國的民族，在過去的半世紀中，這種新憲法和新國旗，大都對我民族是毫無關係的。

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都應該避免這種試驗，因爲民族社會主義國家，應該從長期的運用組織中產生出來。所以民族社會主義運動，應該自己有一種工會的組織，而且還須認識這種組織的必要。

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它的性質究竟是什麼？什麼是我們任務？什麼是工會的目的？

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並不是階級鬭爭的工具，而是代表工人的機關。民族社會主義的國家，不知道有階段，不過從政治方面看來，有一種叫做公民，而公民是具有絕對平等的權利和義務的。除了公民之外，還有一種叫做國民，國民是絕沒有政治上的權利的。

工會制度的主要目的，並不是從事於階級鬭爭，可是馬克斯主義硬要叫它成爲階級鬭爭的工具。馬克斯主義，首先創設這種經濟的武器。而國際主義的猶太人，就來用以破壞自由獨立國家

的經濟基礎，毀滅這種民族的工商業，而經營他們自己的工商業，他們的目的，是要使自由民族去做那不分國界的猶太人所操縱金融界的奴隸。

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並不是主持罷工當作破壞民族生產工具的，而在增加生產使物品能夠暢銷，他的方法，是在打倒一切的弊端；因為這種弊端，是含有反社會的性質，並且阻礙經濟和全民族生活效率的。

民族經濟的繁榮，就是工人本身實質上的幸福，這是民族社會主義的工人，應該知道的。

民族社會主義的僱主，也應該知道工人的幸福和快樂，就是他那大企業的存在和發展所必要的要件。

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並不能和他種的工會並存，因為民族社會主義的工會，必須認識自己的普遍性，和由這任務所產生的任務，不被其他的組織所阻礙，並且還須發展自己的特色。不能和他種同類的組織妥協，而且還須保持絕對獨立的權利。

在過去，曾有不少反對我們獨立工會的議論，但是，到了現在，還是一樣。我不願意去考慮各種必要失敗的試驗。像從工人血汗所得的工資當中，去提取一部分用以來維持工會，而這工會，未必一定有利於他們會員的，所以我必認定這一點是不對的。

在一九二二年，我們的行動，就是根據這種意見的，其他的人士，在表面上也像數有着過人的見識，大家去着手創辦工會，可是沒有多少時候，他們便煙消雲散，結果和我們一樣，所不同

的，就是我們既不欺人，也不自欺而已。

第13章 德國在大戰後的聯盟政策

在日耳曼帝國時代，外交政策既是變幻不定，又行同盟政策，也沒有遵照適當的原則。在革命以後，這種情形，不但沒有改過，而且愈形弄愈糟。譬如在戰前，政治思想的混亂，便是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那麼在戰後，外交失敗的主要原因，便是缺乏誠意了。因為憑藉革命的手段去從事於破壞運動的政黨，勢必對於以復興德國為目的的同盟政策，是不放在眼中的，這是十分明顯的事實。

當民族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還是一個不出名的小團體時候，多數的同志，對於外交政策上的問題，大都抱着一種漠然的態度。因為我們要想爭取對外的自由，主要的前提之一，就是在首先要除掉我們潰敗的原因，並且還須撲滅從中漁利的敵人。

不過，我們這個不重要的小團體，一到擴張活動的範圍，變成為大團體的重要地位時候，就須急於注意外交政策的發展。在這時候，我們必須要決定各種進行的原則，而這種原則，不但不應該違反我們的基本觀念，且須把這種基本觀念，應該切實的表現出來。

關於這問題，我們在研究時所抱的基本觀念，就是認定外交政策是達到一種目的的手段。這種目的，純粹是在鼓勵我們的民族性。凡屬外交政策的建議，不得不經過下面的考慮：就是這種建議，在現時或是將來，是否有助於我民族，或有害於我民族呢？

還有，我們必須要注意的，一個民族和國家，如果要想恢復土地，常把恢復祖國的政權和獨立，作爲最急要的問題。在這種情形之下，如果把喪失領地的利益，和祖國重獲自由的利益，兩相比較，那是斷然的應該輕視前者。因爲一個民族，或一個國家的領土，被壓迫和被割裂部分的解放，決不能由被壓迫人民的抗議，就可以實現的，必須憑藉着祖國所殘餘的實力來實現。

僅有激烈的空口抗議，而沒有準備鬭爭的武器，決不能使被壓迫，而失掉的土地重歸故國。凡是一個民族的領袖，他在對內的政策上，固把訓練這種武器爲首務；就是在對外的政策上，也須把進行這種訓練工作爲目的，並且還須徵求同志。

我在本書的上部中，已經說過，在大戰之前，我國的同盟政策並不徹底。我國的政治領袖。不在歐洲的內部去實行妥善的領土政策，反而喜歡去採取殖民地與商業政策。他們以爲這樣便可避免武力的衝突，豈知這是十分謬誤的；因爲這種計劃貪多務得，所以他的結果自必弄得一敗塗地。世界戰爭，便是德意志帝國領導不良所得的報應。因爲在當時最適當的政策，便是在歐洲取得的新領土，使帝國在大陸上的勞力，能夠堅強鞏固。

可惜我國從前的議員，愚昧無知，不注意準備戰鬭的策略，立即就把在歐洲取得土地的計劃完全放棄。又因他們採取殖民地和商業政策，因此便拋棄了與英國的同盟（在當時和英同盟確是可能的事）。同時他們又不去取得俄國的幫助。如果依照當時的情勢而論，我國確是應該取得俄國的幫助的。於是他們陷入於世界大戰，衆叛親離；而不離棄他們的，也祇有那不幸的哈布斯堡

王朝 (Habsbury Dynasty) 而已。

在英國，外交政策的歷史趨勢，從伊利沙白女皇樹立了先聲，用各種可能的手段，來制止歐洲強盛的國家；在必要的時候，就是用武力來解決。在德國方面，能夠和這種政策媲美的，也只有普魯士軍隊的傳統精神。英國爲要達到這個目的，隨了形勢和他所負的任務，而異其所用的手段，不過，他的志願和決心，是常常一致的。當北美殖民地獨立的時候，曾經按照當時的情形，竭力向歐洲方面尋取一個真正對它幫助的伴侶，所以從西班牙、荷蘭喪失了強國地位以後，英國就集中力量，去對付法國的新興勢力，一直到最後的拿破崙失敗爲止。英國人向來是懼怕法國用軍力來危害它的，到了現在，便什麼都不怕了。

英國用來對付德國的政治方針，進行得十分緩慢；這是因爲德國內部不統一的緣故，所以對於英國也並沒有顯著的威脅。可是在一八七〇年到一八一七年左右，英國已經採取了他們的新態度。美國佔了世界經濟上的重要地位，俄國發展成爲強國，這雖使英國躊躇一時，但是德國不能利用這種機會，那是十分不幸的。結果竟使英國向來的政治方針愈形穩定。

英國把德國看作是一個強國，這是由於德國極端工業化的結果，造成商業上的優勢，因此在此世界政治上也佔取了優勢，於是就變成了一個極大的威脅。用「和平侵略」的手段，去征服世界，這是我國政治家自以爲是無上的妙計；而英國的政治家，就利用這一句話，作爲組織抵抗的根據。事實上，他們抵抗的形式，確是一種組織完美的進攻，這是完全對英國的政治方針符合的；

因爲英國政治方針的目的，本來不在維持這可疑的世界和平，而是在樹立英國的世界霸權，因此，凡是在軍事上可以利用的國家，英國便引爲同盟，這既合於英國傳統的見解，同時又可以隨時估計敵人的實力；而且是合於英國明瞭他自己本身的弱點。英國這種措施，自然不能稱之爲「毫無顧忌的」，因爲能夠對戰爭準備到這樣的周到，不應該拿勇敢來作爲標準而加以評判，必須看他能不能適應機宜。外交的任務，在必須注意於一個民族不爲好勇寡謀，而受到失敗，須得依照實際情形，去設法維持他的民族；能夠達到這目的，便是正當的途徑；如果不依照這途徑走，那顯然是一種罪過，對於外交疏忽的責任，這是逃不掉的。

德國的革命起來了，英國在政略上不再怕德國行將有支配世界的威權了。可是如果德國在歐洲的地圖，完全消滅了，這對於英國也是沒有利益的。反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可怕的政變使英國的外交對象又改變了一個方向。歐洲的新形勢，是德國變成衰敗，法國在政治上變爲最強的國家。所以德國喪失了在大陸上的強國資格，恰好使英國的敵人有利而已。不過從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到明年的夏天，英國的外交，還是沒有改變他的態度，因爲在長期的戰爭中，英國的外交，利用群眾心理的力量，比較從前更爲厲害了。

此外，英國爲了要防止法國的勢力，不致過於強大，他惟一的可能政策，便是去干涉法國的劫掠野心。然事實上，英國並沒有達到參戰的目的，因爲歐洲已經產生了一個強國，這一個強國的勢力，竟是超出了大陸國家實力的比率；對於這種事實，英國竟沒法來加以防止；而且實際上

這強國已經確定了。

現在法國的地位，真是無法比擬。就軍事上來說，他是首居一指的強國，在大陸方面並沒有什麼勁敵；而且近鄰西班牙、意大利等處的邊境也很安全；又因德國已經陷入衰弱無能，所以也毋庸去加以防禦；他的綿延的海岸，正斜對着英國的命脈。

維持歐洲各國的均勢，這是英國的一種宿願。因英國如果想握有世界的霸權，這種均勢實在是必要的條件。

防止德國變成一個鞏固的強國，去維持着德國內部各小邦的均勢，而沒有統一的政府，這是法國的一項宿願。他要把萊茵河的左岸佔領，就是要保持歐洲霸權的一項鐵證。所以法國外交的最大目的，和英國政治手腕的趨勢，是永遠衝突的。

凡是英美意三國的政治家，可以說是沒有一個親德的。因為英國的政治家，必定以英吉利的利益為前提；美國的政治家，必定以美利堅的利益為第一；不用說，意大利人自然也準備促進維護意大利的政策。所以凡是相信他國政治家的親德論調，而希望和他國去締盟的，這種人不是愚人，便是妄人。

爲了要達到實際的目的起見，我們必須要答覆下列的各個問題：從德屬的中歐完全滅亡之後，試問有那一個國家不因法國的軍事力量，和經濟力量已經獨攬霸權，而發生了動搖？又有那一個國家，不因自己本身的生存條件，與向來的傳統政策，而認這種發展是他未來的威脅的？

我們必須絕對的認清，法國和德國是有着不共戴天之仇的，法國對外政策的關鍵，是想永久佔領萊茵河一帶的土地，並且想趁德國的衰弱，保障他們領土的安全。

英國祇不願使德國做一個世界的強國。而法國更不願意德國成爲一個強國，這是兩國的根本不同點。我們現在的奮鬥，並不是在爭取世界強國的地位，而是在爲我國的生存，民族的統一，子孫的麵包而奮鬥。照這樣看起來，祇有英國和意大利可以做我們的同盟國。

英國極不願法國的軍力沒有限制的發展，因爲這是有害於英國利益的。所以法國在軍事上的優勢，正是大不列顛最痛心的事。

意大利，也不願法國在歐洲的地位，一天一天的強盛。因爲意大利的前途，在領土方面，只有靠地中海沿岸的發展。他參加世界大戰的動機，並不在增加法國的勢力，而是在斷然的給亞得里亞海（Adriatic）上的勁敵，一個致命的打擊。在歐洲大陸方面，法國的實力，一步一步的加強，這就是意大利的未來障礙。如果說民族相同，就可以消除敵意。那意大利並不會有這種自欺的夢想。

我們審慎的加以考慮，知道英意兩國的自然利益，和德國民族生存的必要條件，是極少衝突的，而且在某種限度內，還是有着互相的利害。

照德國現在的情形來說，還有願和德國來聯盟的嗎？我們可以說「沒有」。不論那一個國家，如果要對自己的尊嚴看重的話，並且希望由聯盟所得的利益，較多於貪污的政客所騙取的小利

，那是決不願意和現狀下的德國來聯盟的。因為我國沒有資格去和人家聯盟，所以無怪那些行同匪寇的敵國，要聯合一致了。

如果德國再衰弱的話，雖對英國的政策並沒有什麼利益，但是對那總攬國際金融的猶太人是有着大利的，這是因為壟斷金融的猶太民族，顯然是和英國的見解相反，他們不僅希望德國在經濟上永遠的衰落，而且還希望德國在政治上完全成為奴隸。因此之故，猶太人便竭力提倡滅亡德國。

猶太人的用意，是十分明顯的，就是想使德國赤化——就是摧殘德國民族的智力——並竭力借着猶太人所操縱的世界金融，來摧殘德國勞工的勢力，作為擴張猶太人征服世界計劃的第一步。

英國的情形，和意大利十分相似，他的堅定政治方針，和猶太人壟斷世界金融的要求，顯然有着不同，而且這種不同時時顯露。

祇有在法國，猶太人所代表的證券交易所，目的正和法國政治家所具有的希望一樣。因法國的政治家，是極端的愛國主義人物。這種一致的現象，對德國是一項極大的危害；所以法國確實是德國最可怕的敵人。

我們從事於民族社會主義運動的人看來，英國是不是可以做我們的同盟國，不易遽而斷定。因為德國猶太人的出版物上，常有使國人痛恨英國的言論，而德國許多愚昧的人，甘願受猶太人

的利用，竟言擴張海軍，反對奪去我們的殖民地，並且主張把那些殖民地收回。這些問題，他們使無賴的猶太人給英國的猶太人，用作宣傳的資料。我國愚蠢的小資產階級政治家，現在應該覺悟了。我們現在所必爭者，並不是什麼「海上權勢」，就是在大戰以前，不是先把我們在歐洲的地位使它鞏固，而竟盡我們民族的力量去爭海上權勢，這實在是失策的。這種企望，實在是太愚笨了，在政治上這樣的愚笨，就叫做罪惡。

我還須來敘述一下近年來猶太人用了特殊技巧所演的把戲，這就是南的羅爾（South Tyrol）問題。猶太人和擁護哈普斯堡皇室的正統派政治家，竭力來設法阻礙德國的聯盟政策，因為聯盟有使德國可能復興的緣故。猶太人有利於南的羅爾的宣傳，並不是真的愛護南的羅爾，而是恐怕德意間有諒解的可能，因為他的宣傳，對於南的羅爾實在害多利少。唉，南的羅爾呀！我還要說明的，就是當南的羅爾的命運已被決定的時候，（從一九一四年八月到一九一八年十一月），我就和多數的同志，到防地去加入軍隊。在當時，我的從軍志願，就是不願意喪失南的羅爾，而願為祖國保全這一塊土地，像保全德國別的地方一樣。要為德國保障南的羅爾，自然不是狡黠的議員，在維也納的市政廳中，或是在慕尼黑黑的總司令部前面，發表一些虛偽激烈的演說所能辦到的，祇有靠那前線的軍隊，所以凡是破壞前線的，就等於出賣南的羅爾和德國的其他各地。

我們必須澈底的明瞭，要收回失地，祇有靠武力，決不能靠祇禱仁慈的上帝，或是誠心去希

望國際聯盟所能做到的。

最可恥的，就是多數的發言人，並不自信他的議論有什麼效用。他們也十分的明白空談是無補於事的。他們所以這樣，不過因為現在來說恢復南的羅爾，比較過去須用武力來捍衛南的羅爾容易而已。各人各盡其才能，我們過去曾爲南的羅爾流血，他們現在祇知高談闊論。

假使日耳曼民族，要防止威脅歐洲的腐化份子，千萬不可陷入像戰前那樣的謬誤，而去和上帝及世界爲敵，我們必須切實地認定，誰爲我們的最大敵人，俾得集中全力去向他們進攻。要是我們能夠靠別處的犧牲而獲得勝利，那麼，我民族的子孫，可以不再來責備我們了。他們見到我們這樣的堅苦卓絕，終於得到了光榮的成功，必定會欽慕我們這樣的決心。

使德國陷於失敗的，就是和過去腐敗的奧國同盟的一種妄念。現在的外交政策，仍舊被這種狂妄的情感所支配，阻礙了我們的復興，那是無過於此了。

現在，我們不妨試問一下，我國的政府，曾經怎樣的把獨立自尊、英勇自負和敵愾同仇的精神，來注入我民族，這是什麼用意？

一九一九年，德國受和約的束縛，當時有人希望這種壓迫的條約，會使德國的解放，得到幫助，這是十分合理的。因爲和約的條件，如果給某國一種極痛苦的打擊，那麼，這和約常常是某一國將來復興的先聲。

凡爾賽條約給我們的影響很大。這條約每一點，都在我們民族的心靈和情感中焚起了烈火，

結果使共同的恥辱和共同的仇恨，深切地注入六千萬男女的心坎裏，變成一片瀾漫的火燄；從這赤熱的火燄，將產生一種堅強得像鋼鐵般的意志，發出「我們還要奮鬥」的呼聲。

然而一切的機會，我們都錯過了。我們什麼事都沒有成就。誰還能來怪我民族不能得到應有的地位呢？

一個民族處在我們的地位，如果不是政府和公意毅然和人民合作，宣佈人民爲爭取自由而奮鬥的意志，並且保護這種意志，那麼，不會有人承認這民族有和人家聯盟的資格。

建造新的戰艦和收回殖民地等口號，顯然是一種空談。因爲這種口號，並沒有實現的可能性，祇要我們平心靜氣的考慮一下，就可以明白。唱這種高調的人，竭力從事於一種有害的示威運動，而去對抗上帝及世界上其餘的各國，忽略一切成功所必需的重要原則，就是「澈底實行」。我們徒向五國或十國怒吼，而不知道集中我們民族的意志力和體力，去向我們最凶惡的仇敵；作重大的痛擊。而且我們把聯盟政策，到了最後奮鬥時所增加實力的可能性，也一併犧牲了。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在這裏負着一種使命。就是這運動必須教訓一般人民忽略於瑣碎的事情而注意於榮譽大端，不要因爲細故而生出異見來，而且永遠不要忘掉我們現在的奮鬥目的，純粹是爲民族的生存；我們應努力去打倒惟一的仇敵，就是時時來剝奪我民族生存的人。

更進一步說，日耳曼民族在不曾懲罰那些賣國誤國的罪犯之前，是沒有道德上的權利去指摘世界各國所採取的態度。

能夠和我們聯盟的民族，如果真是能夠代表民族的利益，而去夠妄所欲爲，能真的反對各自由民族國家的公敵嗎？譬如說，英國傳統的政治勢力，能不能打破猶太人的優越勢力呢？這確實是一個難答的問題。因爲可以決定這問題的因素太多了。

在法西斯蒂統治下的意大利，竭力和猶太人的三種主要勢力作鬭爭（這種鬭爭，或許是出於無意的，但是我個人無論如何不相信他是出於無意的），這種舉動，最能證明用間接的手段，也可以來消弭猶太人危害國家的毒害。像秘密結社的嚴禁，獨立的和超國家出版物的檢舉，國際馬克斯主義的剷除等等。

如果是在英國，那麼這種舉動比較是困難的。因爲猶太人在英國用着間接影響公意的手段，幾乎完全操縱了這「最自由的民主國」，可是從英國方面來說，代表英國利益的和代表猶太人壟斷世界權力的兩者之間，他們也時起衝突，而互相鬭爭不止。

我們看一下歐俄戰後英國當局對日本問題的態度，以及報紙對於該問題的態度，就可以知道這反對勢力衝突的猛烈。歐戰剛剛結束，美日兩國的宿怨又出現了。英國看到美國在國際經濟和政治方面的突飛猛進，他嫉妬，自然不是種族關係所能遏止的，所以英國注意他舊日的同盟，十分擔心着將來「英國統治海洋」的一句話，變成爲「美國統治海洋」。

把德國消滅了，這並不是英國的利益，實在是猶太人的利益；這正像現在滅亡日本有利於英國。還不及有利於猶太人希圖獨霸世界的野心。英國雖是拚命維持他在世界上的地位，而猶太人

便暗中在運籌設計，以求達到征服世界的目的。

猶太人十分明白，在幾千年之後，他們能夠顛覆歐洲的民族，使血統淆混純粹的種族消失。可是，對於亞洲的民族國家，像日本，那就不易實現這種目的了。

所以，現在的猶太人，他們又煽惑各國去向日本進攻，正像從前慫恿各國去向德國進攻一樣。爲了這個原因，即使英國的政治方針，要去和日本締結同盟，但是英國的猶太報紙，竟可以同時鼓吹對北同盟國來作戰，並且靠了宣傳民主政治，和高唱「打倒日本帝國主義」的口號，準備從事滅亡日本的戰爭。

現在的猶太人，是英國的判徒，而反對猶太人危害世界的鬭爭，也將在英國作爲出發點。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必須要認識自己國內的最大敵人，同時，使反對這種敵人的鬭爭，對於其他的民族成爲一種驅除黑暗，大放光明的火炬，並且再爲奮鬥的亞利安人，指示出一條福利的途徑。

第14章 東方政策

我國那些所謂知識階段，他們冒然改變了我國的外交政策，使它不能真切地來代表我民族的利益，使他們狂妄的理論得到好處，我十分感覺到，我必須向諸同志鄭重地談論一下外交政策上的重要問題，就是我們對於俄國的關係。因為這問題是人人所應該明瞭，而且是本書篇幅所許可的。

一個國家的外交政策，它的任務是在使他們民族的繁殖，和他們土地的大小，能夠有一種自然和適當的比例，而保障種族的生存。

能夠保證一個民族的生存自由的，惟有地球上的充分空間。德意志的民族，也祇有靠了這種方法，才能保障他是世界的強國。在世界史上，我國民族的利益，已經佔重要的地位有二千年了。關於這一點，我們自己可以來做證明的。因為從一九一四年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戰，實在是德國民族在世界上的生存競爭，我們對這戰爭稱為世界大戰。

在那時候，德國的表面是一個世界強國，我所以稱之為「表面」，就是因為實際並不是一個世界強國。如果德國的土地和人口，能夠合於上述的比例，那麼，德國確實是世界的強國了；倘使把其他的種種因素，一概置之不論，那麼，歐戰的最後勝利，就應當屬於我們。

現在的德國，並不是一個強國。從領土上看來，德國的疆域，和那世界列強相較，真是小得

可憐。我們不必用英國作比例，因為英國實際上祇是不列顛世界帝國的一大都會，但是不列顛帝國所轄的領土，差不多佔了地球面積的四分之一。我們必須再看看其他的各大國，像美國、俄國和中國。這幾個國家所擁有的領土，都是十倍於現在的德國。就以法蘭西而論，也應該列入這等國家中。法國常常使國內的有色人種加入軍隊。如果這樣再過三百年，那麼，法蘭西的血統，勢必完全消滅於歐非兩人種所造成的國家中，他所擁有的廣大領土，將會從萊茵河一直擴充到非洲的剛果河（Congo）。他的種族，也就越來越複雜了。這就是法國的殖民政策，所以和德國以前的殖民政策不同的地方。

我國以前的殖民政策，既不能擴張日耳曼民族的領土，又不敢大膽靠了黑種人的血統，來增強帝國的實力。德屬東非洲的亞斯加力（Askari）士兵雖然略有這種傾向，可是這種士兵，僅能保衛殖民地的本身而已。

我們不能去和世界其他各大國來比較，我們已經不再享有怎樣的地位。這是不得不歸咎於我國外交政策的謬誤，因為在外交上缺少了傳統的政策，喪失民族所賴以維持一切健全的本能和策勵。

這種種的錯誤，必須用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給以補救。我國的人口和疆域，不相稱的情形——疆域是財富的來源，又是政治力量的基礎——以及我國過去的歷史，和現在衰弱無望的情形，應該從民族社會主義運動來設法除去或是調劑的。

德國政策上最大的成功，便是普魯士邦的組織，以及從這一組織所養成的國家觀念；同時使德國軍隊的組織，也能夠適合現代化的需要。因為從個人自衛的觀念變成民族自衛的觀念，這種改變的思想，實在是從普魯士邦的組織和它的新原則而來的。因為日耳曼民族的個人主義過份地發達，因之人心渙散，只有在經過普魯士軍隊的組織才成為有訓練的民族，而且使已經喪失了的組織能力，稍稍得到恢復。凡是其他各民族在努力進行統一的時候所需要的精神，我民族都已靠軍事訓練而獲得了。因此之故，對於廢除一般的兵役義務——這件事，對於其他的民族或者不關什麼輕重——實在和我們的生死相關。如果我們德國人十世不受軍事訓練和軍事教育，由他們去受本性上渙散的壞影響，那麼，我民族在地球上，將不會再有獨立生存的餘地了。這樣，日耳曼民族祇有在異族的旗幟下面，苟延殘喘，對於文化的貢獻，這種精神恐怕是不再會有了。

我國在政治上的真正成功，和那種徒令民族犧牲流血的目標，這兩件事，我們必須區別清楚，這種區別，對於我們現在和將來的行動，是十分重要的。民族社會黨運動，決不能和那些卑污下賤的小資產階級的愛國主義相聯合。要是我們認為現在也須為歐戰前的主張所束縛，那是更為危險的事；因為我們的目的，在使我們的領土和人口的比例能夠互相調和。

從政治上來說，要求恢復一九一四年的國境，這未免太不聰明了。但是，堅持這一種要求的人，反而宣稱他們這種要求，是他們政治行動的目標；豈知這種要求，反而使敵方的聯盟更為鞏固。歐戰八年後——參戰各國的慾望和目的原本是十分複雜的——在當時勝利的聯盟，到現在

所以還能團結一致的原因，惟一的理由就是如此。

這些國家，當時都因德國的失敗，而獲得了利益。因為列強恐懼我國的實力，所以把他們彼此的嫉妒完全置諸腦後，反而暫時團結一致。他們以為瓜分我們，就是防止我們復興的惟一上策。這種不良的居心，和對於我國實力的懼怕，實在是為他們團結一致的原動力。

自從維也納會議以後，世界的局勢完全轉變了，君主和后妃，已經不再為領土而去作孤注一擲，現在統治世界的，便是那些殘酷而沒有國籍的猶太人。

一九一四年的疆界，對於德國民族的將來，一些也沒有什麼用處。因為這種疆界，過去既不能做德國的保障，將來也不能增加德國的實力。既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內部團結。又不能使日耳曼民族的財富滿足。就軍事上來論，這種疆界，也是不適宜的，而且也難滿人意，更不能改進我國現在對於世界其他強國的地位。——與其說對於其他強國，還不如說對於真正的強國——況且，這種疆界，既不能縮短我國和英國的距離，又不能使我國成為類似美國的一個大國。再者，就是法國在世界政治上的重要地位，也並不因為這疆界而受到如何實際上的損失。

只有一件事可以斷言，就是要恢復一九一四年疆界，不論那一種計劃，就算是成功，也徒然叫我民族再度流血，使有用的國民，完全為國犧牲，不能決策勵行，而再造我民族的生命和前途。況且，「民族的光榮」已經使大家心滿意足了，我們必定惑於這種空泛的成功，去放棄一切比較遠大的目標，於是開放門戶，大興商業，不到事變發生是不休止的。民族社會主義的任務，就

是要堅持我們外交政策上的目的，保障日耳曼民族在地球上所應得的領土。萬一因這種行動而流血犧牲，對於上帝，以及日耳曼人的子孫，也可以說是理所當然的了。

在地球上，不論那一個國家，都不曾憑藉上帝的賜予，而獲得寸尺領土的佔領。一個國家疆界的決定和變更，完全是由人力造成的。一個國家，雖然已經獲得很多的領土；然而決不能據此而說他的領土應該永遠的佔有。因為領土的獲得，不過是證明征服者的強力，和喪失土地者的懦弱無能。佔有的權利，便是屬於這種強力之中。

我們的祖先，對於國土的獲得，並不是得之於上天的賞賜，實在是從奮鬥而得來的，所以將來能夠給我民族以土地和生命的，也只有武力而已。

我們現在雖然十分明白和法國應該有妥協的必要，可是，因為妥協而犧牲了我國對外政策上的大目標，那未免太不值得。有意義的妥協，必須能夠擴充我民族在歐洲的地域；因為殖民地地的取得，還不能解決居住問題，能解決這一項問題的，實際上也祇有獲得可以移民的領土，以開拓我祖國的疆域。這樣，新移居的人，不但能夠和原居的地方保持密切的聯絡，並且還可以保證新領土和祖國結合後，全國所產生的一切利益。

我民族社會主義的黨人，現在已經決心放棄我國戰前的外交政策傾向。我們現在是採取六百年前的外交政策，就是遏止日耳曼人紛紛向歐洲南部和西部去移殖，而使我們的視線向東移轉，我們已經結束戰前殖民地 and 商業政策，只是注意未來的領土政策。

我們現在一談到歐洲新領土的開闢問題，必須先想到俄國和他接壤的國家。

好像命運之神願意指示我們的發展方向。命運之神，使俄國變成布爾雪維克，就是使它喪失從前俄國所靠以立國，而保障其生存的知識階級。因為俄國成為有組織的國家，並不是爲了斯拉夫民族具有如何的政治能力，而是日耳曼份子能夠在劣等民族中組成國家的明證。現在俄國的內部，可說這種日耳曼民族的份子，已經排除淨盡，由猶太人取代的了。俄國人現在不能用他們自己的力量去擺脫猶太人的束縛，而猶太人也不能永久的去統治俄國。因為俄國人不善組織，極易分化的緣故。這個在東歐的龐大帝國，現在已經快要崩潰了，猶太人統治的末路，便是俄國國運的告終。

自然，猶太人是反對我們所採取的政策。他們引用畢士麥的主張，作爲他們唯一的理由，去擁護一種無聊而有害於日耳曼民族的政策。他們說畢士麥也極注意和俄國發生親善的關係，這句話確是不錯。不過，還有一點，他們不曾提及，就是畢士麥也極注意和意大利發生親善的關係。但是畢士麥實行和意大利聯盟，爲的是易於抵制奧國。這種聯盟的政策，爲什麼不繼續下去呢？我知道他的答案必定是：「因爲現在的意大利，已經不是從前的意大利了。」這句話實在不錯。可是，我說現在的俄國，已經不是從前的俄國了，讀者諸君也當答允的。那種能夠見機而行的畢士麥，決不會受聯俄政策的拘束的。所以這一問題，並不是「畢士麥在當時採取的政策」，而且「他於現在將採取什麼政策」上面。這一個問題，也是不難答覆的。因爲畢士麥的政治手腕，

決不致去和那些快要崩潰的國家去聯盟的。

還有畢士麥對於殖民地 and 商業的政策，在當時也是徘徊不定，因為他留意於採取極安全的方法，使他所建立的政府，能夠安全和鞏固。這就是他願意和俄國聯盟的唯一理由，因為這一理由，可以使他能自由的向西方發展了。不過這種政策，雖然在當時有利於德國，但現在反而有害於德國了。

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間，本黨受了各方面的慫恿，開始和他國的解放運動相聯合，而和宣傳十分有力的「被壓迫民族聯合會」(Association of Oppressed Nations)採取一致行動。聯合會的主要份子，便是巴爾幹各邦埃及和印度的代表。這班人給我的印象，他們祇是空談，並沒有實力來做後盾。但是也有不少德國人，尤其是相信民族主義的德國人，竟為這班嘍不休的東方人所欺騙，他們把那些偶然露面的印度或是埃及的學生，當作印度或是埃及的真正「代表」。他們從不曾仔細考查過，而且也沒有發覺這種人既沒有後盾，也沒有那一個人授給他們的權力，叫他們去締結那一種協定。所以和這種人互相周旋，結果還是等於零，徒然浪費時間而已。

我還記得，在一九二〇年到一九二二年間，民族主義的團體之中，忽然產生了一種幼稚而可笑希望，大家以為英國在印度的勢力已經崩潰。有一部分從亞洲來的江湖騙客，(他們也許確是真正為印度爭取自由的戰士，然而這不是我所認可的)他們遍訪歐洲各地，去慫恿一般明達的

人說，以印度爲樞紐的不列顛帝國將要崩潰了。他們並不知道這種思想是由他們的希望而產生的。

假使妄言英國並不把印度在不列顛帝國中的重要地位加以注意的話，這未免太幼稚了。一般人認爲英國將要放棄印度，這實在是一種不幸訛傳，這足以表明他們不會在世界大戰中獲得教訓，而且也沒有看出盎格羅撒克遜人的堅決性格。同時，這種見解，又證明了德國人完全不知道不列顛人統治他們帝國的方法。因爲英國要是不讓異族去參政，和不受強敵的武力壓迫，那是決不會喪失印度的。就是印度的叛變，也是難於成功的。照我德國人的經驗，知道要強制英國人去做他所不要做的事，那是異常困難的。就是把一切完全置之不論，均以德國人的立場來說，也寧願英國統治着印度，而不願見印度去受其他民族的統治。

還有希望埃及也有出人意外的抗英運動，這也是一種沒有根據的瞎談。

當歐洲大戰還沒有發生的時候，情形已經變壞。我們去和奧土兩國同盟，這是沒有什麼可以慶幸的。因爲正當世界軍備和工業最盛的國家，在秣馬厲兵，形成大家一致進攻陣線的時候，我們乃去聯合一兩個孱弱落伍的國家，要把這奄奄待斃的廢物，去和生氣蓬勃的聯盟抵抗，這有什麼用呢？這種外交政策的錯誤，已經使德國受到莫大的損失。

我站在民族主義者的立場，以種族爲標準而來品評人類，對於把一民族的命運繫之於所謂「被壓迫民族」的一點，我是很不以爲然的；因爲就種族來說，我早就知道這種被壓迫的民族，是

毫無價值的。

現在俄國當權的當局，他們並沒有誠意去和他國締結同盟，或是遵守盟約。我們切不可忘了他們是一種身染血污的卑鄙罪犯，是人類中的敗類，祇因他們得到了乘亂舉兵的機會，因而可以去蹂躪一個大國用了他們殘暴的手段，去屠殺無數的最有知識的同胞，並且施行他們最專制的統治，到現在已經有十年了。我們切不可忘了他們統治者所屬的民族，是兼有獸性的殘酷和說謊的特長的，並且還自以為將要去壓迫全世界的。我們尤不可忘了那些沒有國籍而完全統治着俄國的猶太人，他們並不把德國看成朋友，而把德國看成是一個應該遭受同樣命運的國家。

俄國所受到的恐怖，現在已經輪到德國的頭上了。德國是布爾雪維克主義的第二個巨大的目的地。我們必須具有青年傳道者的全副精神，才能去復興我民族，拯救使我民族脫離國際毒蛇的蹂躪，並且防止我民族內部血統的混亂，這樣，一經解放，就可以去運用我民族的力量，去保全我們的民族性。假使我們的目的是這樣，而再去和某一強國聯盟；此強國的統治者，便是我國將來不共戴天的仇敵，這豈不是我們太愚蠢了吧！

在同盟政策上，舊德意志帝國所鑄成的大錯，就是因為方針不定，並且不顧一切的利害，一味的苟且偷安，以致我國對外的一切邦交。弄得十分衰敗。但是有一件事，也是不可非議的，那就是不會和俄國繼續着維持良好的關係。

我坦白地承認：在大戰以前，我曾經設想過，德國要是放棄了他愚笨的殖民政策和海軍政策

，聯合英國去對抗俄國，並且再拋棄他支配全世界的野心，去採取一種在歐洲大陸上能夠取得領土的確定政策，那麼當時的情勢必定更好。

從前，鼓吹汎斯拉夫主義的俄國，常對德國加以一種蠻橫的威脅，這是我無法忘却的；俄國常常做一種動員演習，他的惟一目的，便是在滋擾德國，這是我也不會忘掉的；在戰前，俄國的輿論，對於我民族和帝國，常作一種念恨的攻擊，這也是我不會忘記的；而尤其不能使我忘却俄國的報紙，往往贊助法國，而不贊助德國。

但是，在大戰以前，我們尚有另一條路可走，這就是我們爲了要使俄國去對抗英國的關係，不妨去傾向俄國。

現在列強諸國的團結，差不多向我們作了一個最後的禱告，使我國去擺脫夢想，顧及事實，並且還明白昭示我們，惟一的一條途徑。照此途徑前進，這老大的國家，才會有發揚光大的一天。

民族社會主義運動，假如能夠明白他自身的重大任務，去擺脫一切的幻想，以理智作唯一一針，那麼，一九一八年的災禍，或許可以轉變而爲我民族將來的福利。從此，我們便可以得到一個「政治上的傳統政策」(Politico tradition)，這種政策，英國是有的，俄國也是有的，法國也往往爲了他本身的利益，而決定採取這種良策。

日耳曼民族，對外行動的傳統政策應如上述，德國應走的路線，是十分聰明的。在大陸方面

，德國不能容有兩大強國在歐洲崛起。凡是企圖在德國鄰近變為軍事強國的，即使略具軍國的形勢，德國也必定看作是一種侵略行為，而以各種手段去加以制止，就是用武力來解決，我們也是在所不惜的。這不但是德國的權利，而且是德國的責任。

如果和英意兩國締結同盟，在軍事上的結果，必定和聯俄的結果是相反的。最重要的，便是和這兩國「接近」，決不會引起戰爭的危險。對這同盟可以站在反對態度的唯一強國——法蘭西——沒有力量來反對，於是這種同盟，將使德國在平常的時候就從事着種種的準備工作，以便在盟約所許可的範圍之內，和法蘭西謀一解決。因為這種同盟，自己能夠去破壞使德國極感不安的三國協商（Entente），而且使我民族世仇的敵人法蘭西陷於孤立。因此，英德意三國的新同盟，將操縱一切，而法蘭西也便失去他的優勢。

另外，還有一種更重要的事實，就是這新同盟中的國家，各有可互助的專門技能，所以德國最後所獲得的同盟國，決不會像水蛭的吸取血液，而能盡了他的力量來補充我們的武裝。

我已經在前章中說過了，要把這種同盟來使之實現，確有種種困難。然而，三國協商的成立，他的困難豈有比這要少的。各國的利益，本來是互相衝突的，而英王愛德華七世（King Edward）到底完成了。倘使我們能夠明瞭這種進展的必要性，靠着巧妙的手腕，和審慎的考慮，去統一我們的行動，那麼，我們的同盟，必定可以成功。

現在，我們國內的敵人，固然對我們懷恨而加以狂吠，但是，我民族社會黨人，終不宜被這

種狂吠有所迷惑；我們應該舉內心所確信以爲重要的事，來宣示於人。狡猾的猶太人，利用我德國人思想上的缺陷，用奸詐的手段，去使輿論陷於荒謬。我們對於這種荒謬的輿論，必須用一種不屈不撓的態度來對付。我們現在雖是河中的一塊石頭，可是在幾年中，命運會將我們成爲一種擋水的堤防，一切的洪濤巨浪，將要爲這堤防所冲破，然後流入新的河床之中。

第15章 緊急的防衛權

我國在一九一八年十一月停戰的時候，就採取了一種幾乎要自趨滅亡的政策。我們現在所有的時光，和一八〇六年到一八一三年，使慘敗後的普魯士復興時所需要的時光差不多，然而，我們不能來利用這時光，反而使國勢一天一天的衰弱，這是人人所共知的。他的重大原因，就是因為在簽訂停戰條約以後，國人對於敵人屢次所提的壓制政策，並沒有能力和勇氣，去反對他們。敵人是很聰明的，不把過分的要求作一次提出。

停戰的命令，要我國解除軍備，使我國在政治上失去了憑依，成為孤立無助的狀態；而經濟的掠奪，又是層出不窮的相繼而來，這就是要使我們認識道威斯將軍（General Dawes）的調停是幸運，羅加諾條約（Locarno Treaty）是勝利。

從一九二二年的冬天到二三年，我們知道和約成立之後，法國仍是想實現他的最初參戰目的。如果說人口不多的法國，他們參加這一次空前四年半的大戰，目的僅在戰後得到賠償損失，這種話叫什麼人相信呢。如果說亞爾薩斯羅連（Alsace Lorraine），不是法國將來政策的一部分，那麼，法國的作戰，就很不容易解釋了。因為他們的政策，就是要把德國分列成許多小國，這就是法國參戰的目的。然而，法國的參戰，實在是無異於把他的民族出賣給沒有國籍的猶太人，而做他們的奴僕。

九一八年十一月，德國的政變，像迅雷閃電般的突如其來。但是，當國內在發生大變的時候，我國的軍隊，還是深入在敵國的腹地。當時，法國所首先去注意的，並不把德國來使它分裂，而是在怎樣使德國的軍隊很快的退出法比兩國邊境，因此，巴黎當局，在戰事結束的時候，他的第一要務，便是解除德國軍隊的武裝，並且使他們退回德國去。不過有待於此事完成之後，他們才能設法把最初參戰的目的來實現。就英國來說，德國既喪失了殖民地和商業的勢力，因而降為次要的國家，可是英國的參戰，已經獲得勝利了。英國並沒有毀滅德國的心思，實際上他是極希望將來的歐洲有一國能夠和法國來對抗的國家。所以，法國也不得不靜待着和平，然後再開始他已經從歐戰樹立的基礎而來工作。克里蒙梭（Clemenceau）的宣言，稱和平不過是戰爭的繼續，這句話實在有着深長的意義。

到了一九二二年冬季，法國的用意，大家便知道了。

我相信，要使法國對於我國的用意變為唯一的方法，便是使我國的政策轉變來對付敵人。我相信，如果德國能夠先使法國陷於孤立的地位，那麼第二次大戰，必定不是德國反抗世界的戰爭，而是德國自衛，以對抗法國的戰爭；因為法國常擾亂世界，破壞和平的緣故。

如果德法兩國，不斷的發生衝突，而這衝突祇是防禦法國的侵略，那麼，這種衝突，一直繼續下去，而永不會發生戰爭，而德國的國境，也難免世世被人侵略，而不斷的有所變更。

等到德國人完全能夠明瞭這一點。日耳曼民族的生氣，便不再虛擲於消極的防衛，而起來一

致對付法國，才能和法國解決這永久不快的衝突。

一九二二年十二月，德法兩國間的情況，又臨十分緊張的時候。法國正打算對德國作大規模的壓制，而且要師出有名。他希望能夠佔領魯爾（Ruhr）這地方，去破壞德國最後的國基，使我們陷於經濟貧乏而負債纍纍。

因魯爾被佔，命運倒又給日耳曼民族一個振興的機會。這件事粗看起來，好像是大禍臨頭了，可是，仔細觀察，反而有使德國脫離苦海的可能。

當時法國確是第一次和英國疏遠，特別審慎地想維持英法聯盟的英國外交家，以及大部分的英國人，大家都認為英法間的關係已經結束了。英國商業的團體，對於法國在大陸上勢力一天一天的增加，自然是十分憤慨的。法國佔領了魯爾煤區，實在是使英國喪失了他在大戰中所得的一切成功；現在的勝利者，已經不是英國靈敏而勞苦的外交家，而為福熙（General Foch）元師和他所代表的法國。

意大利也對法國有着惡感。其實，戰爭在剛結束的時候，意法兩國的友誼，已經就不大好，現在竟一變而為仇恨了。將來終有一天，會使昨天的友邦，變為明天的仇敵。但是這事件終於未發生的緣故，就是因為德國的總長，沒有恩韋元帥（Enver Pasha）的才能，而只是一個庫諾（Cuno）而已。

當一九二三年的春季，我們還不能因法國佔領魯爾，藉口重振軍備，必須先在德國的民族中

，灌輸一種新的精神，使我民族的意志益趨堅強，而且須將國內最大的惡勢力完全剷除淨盡。

一九一四年和一九一五年，不知道撲滅馬克斯主義的結果，便是一九一八年的大流血，所以一九二三年，春季可怖的懲罰，便是我們坐失良機，不會徹底消滅馬克斯主義的叛徒和暴徒的結果。那些小資產階級，他們以爲現在的馬克斯主義，已經不比從前，以爲主持一九一八年事件之「敗類」，曾經犧牲了二百萬生命，作爲奪取政權的工具而不後悔的，到一九二三年便可爲民族的正義觀念而服務，這真是不可思議的奇想！瞎希望這班叛徒來做解放德國的戰士，那真是愚不可及的傻子。這班叛徒也決沒有這種想法。馬克斯主義的人們，不能不爲叛逆，這等於野狗不能棄死屍而不食是一樣的。

一九二三年的情況，和一九一八年的情況，很是相像。不論我們來決定那一種抵抗政策，他的要點，都在使我民族脫離馬克斯主義的毒素。我十分相信，凡是真正國家主義的國民政府，他的急務，就在獲得足以撲滅馬克斯主義的力量，而且給這種力量以自由處置的權力。當國外的敵人，對我國施以一種致命打擊的時候，而國內的叛逆，又潛伏在街頭巷尾，這時的政府，千萬不應留戀於「安寧秩序」的笨策。要是最後解決我民族敵人馬克斯主義的唯一方法，而不能免於混亂，那麼，真正的國民政府，應歡迎這紛擾不安的時局。

我常常懇求民族主義的各黨，應該順應命運的支配，使我黨施行對馬克斯主義的方法，然而他們對於我的勸告，總是置之不理。他們（包括了國防軍的首領）自責聰明，終於忍受了那最可

恥的屈辱。當時，我感覺到德國小資產階級的使命已經完畢，不能使他們再負其他的什麼責任了。

在這時候，我坦白的承認，我對於阿爾卑斯山以南（South of the Alps）的偉人，發生了熱烈的欽慕。他爲了酷愛他的民族，因此不和意大利國內的敵人妥協，而且竭力用各種可能的手段和方法來撲滅敵人。莫索里尼所以能夠列於世界偉人的緣故，就是他決心和馬克斯主義平分意大利，而且能撲滅國際主義，來拯救他祖國的緣故。德國虛偽的政治家，和莫索里尼相形之下，那真是藐小得很。

我國小資產階級的態度，和那寬恕馬克斯主義的辦法，一開始就使我們在魯爾不能採取怎樣有力的抵抗。他們讓我國的世仇馬克斯主義的黨徒蟄居在國外，我們再起而和法國作戰，那真是愚妄的傻子。

不難預言的，行將發生的事變，就在一九二三年春季發生了，空喊着向法國抵抗，這是徒然的；因爲在軍事方面，是否可以得到勝利呢？要知道德國對於魯爾事件的行動，結果如能撲滅德國的馬克斯主義，那麼，我們就已穩操勝算了。如果德國一旦能夠脫離不共戴天的世仇，那日後的發展，自然是不可限量的。馬克斯主義，在德國毀滅的日子，便是加在德國身上的桎梏，也就粉碎無餘。自從有史以來，我們從來不曾被仇敵所征服過，征服我們的祇有我們本身的敗德，和那潛伏在一旁的敵人而已。

然而，上天竟賜給德國一個偉人，這偉人的名字叫做柯諾。據柯諾的推理：「法國佔領魯爾。魯爾有的是什麼？是煤。法國的佔領魯爾，不就是爲了該地的煤嗎？」柯諾的推理既是如此，所以他必深信以罷工的手段，可使法國人喪失他的煤，而且因無利可圖，早晚必定會退出魯爾的。這就是我「民族」「傑出」的「政治家」思想。

要實行罷工，就得要借助於馬克斯主義的力量，因爲罷工和工人的關係最密切。所以，使工人和其他的德國人構成一條聯合戰線（小資產政治家柯諾把工人和馬克斯主義者看作是一樣的東西），那是十分要緊的。而馬克斯主義者，他們也贊成這種意見；因爲馬克斯派的領袖，他需要柯諾的金錢，這不亞於柯諾需要他們來參加以構成一條「聯合戰線」。

如果在當時，柯諾先生不用金錢來運動總罷工，作爲結成「聯合戰線」的基礎，而令德國全國人民，大家多做兩小時的工作，那麼，「聯合戰線」的騙局，必定在三天之內就暴露了。凡是民族，決不能自己不努力而獲得自由的，只有犧牲，才能獲得自由。

說到消極抵抗，那是極難堅持久遠的，除非完全不知道戰爭是什麼東西的人以外，決不會有人去空歡喜這種荒謬可笑的方法，能夠驅逐霸佔領土的敵軍的。

像魯爾的威斯法里亞人（Westphalians）知道了有八十師或是一百師的軍隊，在準備來援助他們，那麼，法國的軍隊，自然要感到困難，像是坐在荊棘中一樣。

當工會飽受了柯諾的捐助，將要把軟弱的消極抵抗，改變而成爲積極的攻擊時候，共產黨便

立刻脫離了民族戰線，回復他們本來的面目。到了這時候，柯諾先生也只好默然的退職。從這一點，德國增加了一番經驗，但也喪失了一個希望。

犧牲了億兆的金錢，和千萬的德國青年（他們大都頭腦簡單，輕易信仰德國統制人的話。）終於也不免受到那悲慘的崩潰和可恥的屈服，人民對於這種賣國的舉動，真是怒不可遏。億兆的人民，大家都認明，唯有肅清德國現行的全部制度，才有挽救的途徑。

我在一九二四年春季，受到大審判的時候曾經說過。現在把這演詞的最後一段摘錄在這裏：「我國的法官，痛斥我們的行動，這雖屬正當，然而主持更高真理和較好法律的歷史女神，必定會來撕碎這種判決，而且還要嫣然微笑，宣布我們盡是一些無辜而受責難的可憐人。」

關於引起及決定一九二三年十一月八日事變的事實，我不想在這裏來加以敘述。因為我相信這種敘述，對於將來是毫無補益的。事已如此，批評有什麼功用？而且對這應負責的人，我也不願多言，因為他們愛護民族的心，不落人後；可是他們迷失了共同的途徑，或在選擇途徑的時候，不單是求其一致而已。

附錄一：

希特勒遺囑

一九五六年元月間，蘇俄遣返了一批德國戰俘，這批戰俘說出曾親眼看到希特勒舉槍自殺的詳情。這位蓋世太保生死之謎，便獲得了正確的解答。希魔昔日領導戰敗後的德國，發展各種工業，練軍講武，使德國成爲世界上一等強國，真乃一世之梟雄。惜乎只知窮兵黷武，逞侵略之野心。本身自取滅亡，亦使德國迄今不能統一，他實成了國家的大罪魁。

吾人從他這篇遺囑中，可以看出，這位混世魔王至死頑冥不悟的狂妄心理。

下面即是希魔遺囑全文：

三十多年前，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我就以一名自願軍的身份，參加日耳曼聯邦被逼迫的戰鬥，開始貢獻出我的綿薄之力。

三十多年來，我對人民的熱愛和忠心指導着我的思想，行爲和生活。他們給予我這位平凡的人以權力，去解決面對一些艱巨的決策。在這些歲月裡我耗盡我所有的時間，我的精力，和我的健康。

在一九三九年，我和所有的德國人，並非真正需要戰爭。需要戰爭的是那些挑撥煽動，排行

獨佔的國際政客，他們是猶太人的子孫，或是專為猶太人的利益而工作的人們。……

經過六年戰爭之後，雖然，各方面都遭受了挫折，在以後的歷史上，將會看到一個民族為了求生存而作光榮的努力，我不能放棄國家的首都（柏林）。縱然我們於此的軍事力量太弱而不能再抵抗敵人的攻擊，我們的抵抗漸漸會為那些盲目無意志力的敵軍所摧毀時，我願與堅守在此城中的數百萬民衆共同承擔此一不幸的命運。此外，我決不會為敵所俘，那些猶太人所提出的，所謂新景象的要求，只是在討得那些沒有熱情民衆的歡心。

所以，我決心留在柏林。當我認為我的元首地位和我的辦公處所已頻臨被毀的時候，我將自由地選擇我的死法。我死時內心充滿了歡愉，因為就我所知，我全國軍民的行為都有極好的表現，我們在前線的戰士們的英勇，婦女們在家庭中的貢獻，農夫們和工人們的貢獻和成就，以及用我之名組成的青年團，都會聯合地寫下光榮的歷史。

我從內心的深處，向他們表達我由衷地萬分感謝，我盼望他們在任何情況下不要放棄奮鬥，無論在任何地方都要繼續地抵抗祖國的敵人，並忠於克勞斯維茲的戰爭原則。

我的將士們和同志們用死亡所作的犧牲，已播下了光榮的種子，將來有一天，在德國的歷史上，使國家社會主義的運動重生，那時會真正建立統一的國家……。

在我死之前，我要開除空軍元帥戈林的黨籍，並廢除他所有的特權，那些我在一九三九年九月裡，第一次向國會演說時授予他的。在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九日，我已明令取消。

將他們破壞的人都驅逐掉，戈林和希姆萊違反了我的意志，未經我知道就秘密地和敵人談判，簡直使國家和整個民族蒙羞，他們同時還企圖以非法的手段佔有並控制政府。

爲了給德國人民一個由一群高貴人士所組成的政府領導者，以便繼續用全力實踐戰鬥的任務，我提議下面這些人組成內閣：

總統，杜尼茲；內閣總理；戈貝爾；黨主席，鮑曼。外交部長，柴辛克伐……………

願他們能清楚地了解，我們德國的建國工作，是要建立成一個國家社會主義，代表着未來若干世紀的工作目標，是在使每一個人經常都有爲公衆服務，謀求幸福遠超過爲自己打算的責任感。我要求所有的德國人民，全體的國社黨員，男人們和婦女們，以及所有在軍中服役的將士，都要至死不屈忠心地服從新的政府和總統。

最主要的，我訓令德國的政府和人民，要絕對地支持我倡導的種族法律，……………

希特勒簽署 一九四五年四月

附錄二：狂人的狂言

希特勒及其「我的奮鬥」

從第一次大戰到第二次大戰之間，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崛起的人物中，最富戲劇性的恐怕無過於希特勒（Adolf Hitler 1889—1945）。當他和他的情婦於一九四五年四月三十日自殺於柏林德國總理府的地下室中時，成為世界大悲劇暫時告一段落的象徵。

希特勒及其徒衆自從一九二〇年代興風作浪以來，到一九三三年，終於使戰敗喪亂之餘的德國，不能不接受由希特勒領導的納粹黨出掌政權。他們的行動引起世界的議論與驚恐。這個政權一朝當政之後，立即以冷酷無情的手段實施高壓控制；一切民主政府所應守的原則被他們澈底摧毀，蕩然無存；不同的見解更是遭到嚴酷的封鎖；社會、工會以及一般民間團體，不是被取締就是由納粹黨人出面「協調」之後喪失了原來的面目。猶太人被殘殺者不計其數。與德國毗鄰的各國，都在不斷受到德國宣傳的威脅恫嚇。納粹德國對每一個鄰邦都有領土要求。

其實，以上這些事件，並非孤立的或偶發的。人們如果肯於不憚其煩勞去讀一讀希特勒那本

厚厚的大著「我的奮鬥」(Mein Kampf)，就會發現所有上述的情節，都在書中詳細地預言過。「我的奮鬥」可以說是納粹德國為禍天下的指南寶鑑。

由於國際版權協定的規定，作者使得「我的奮鬥」這本書的全文僅限於德文版。其他文字的版本都是經過刪節的。不過，也有人認為，這部書在出版之初，縱令有了英文法文或其他語文的版本，也未必會有多少人對於這本荒唐狂誕、夢囈般的書籍會加以重視。因為，書中所顯示的野心實在太大，大得令人無以置信。

「我的奮鬥」這本書被稱為「當代宣傳界中的傑作」；同時，有一位法官從法律的觀點來批評它說：「這是二十世紀最爲罪名昭彰的一本書。」實在甚爲允當。此書到了第二次大戰爆發之前，僅在德國境內竟售出五百萬冊。

希特勒與心理學家弗洛伊德一樣，都是在維也納長大的。希特勒在少年時代，便形成了他對人生的印像，偏見與仇恨，這種種強烈的情緒，統治了他的一生。他這些想法也使一一在「我的奮鬥」中流露出來。書中開始的幾章，以簡短的文字記述他自己早歲的生涯，看似閒閒筆墨，與後文的關係却頗爲密切。

希特勒於一八八九年出生於奧地利的布勞瑙(Braunau)，正好與德國邊界一水相隔。說來奇怪，希特勒總是以德國人自居而不肯承認是奧國人，他尤其看不起逍遙放蕩的維也納人。照

他自己的說法，幼年至少年期的生活，充滿了艱難困苦，挫折打擊。他所接受的正規學校教育，到十三歲便告結束；他的父母大約就在那時候去世了。他流浪維也納，原想成爲一個藝術家或建築家，但因為教育不夠，才華不足，四處碰壁，走投無路。

在維也納的時期，希特勒自稱會博覽書籍，尤着意於歷史。有一本有關普法戰爭的史書，對他的思想影響最深；由於那本書的關係，使他深以能做日耳曼民族的一份子自豪，並且深信上帝要對日耳曼民族賦予神聖的使命。由此出發，他開始厭惡猶太人，極藐視斯拉夫人以及其他非阿利安種族的人。希特勒斷言：猶太人是一種具有國際心向的錢魔和剝削者，又常常是社會主義者或共產黨徒。而斯拉夫人則是一種劣等民族，根本沒有他們自己的文化。

由於在維也納時一度與社會民主黨份子合作，使得希特勒非常討厭社會主義與共產主義的宣傳。他一方面學到了左翼政黨糾衆謀亂的種種手段，一方面對於馬克思主義恨之刺骨。雖然他自稱讀書甚廣，但是，却沒有任何證據足以證明他翻開過馬克斯的「資本論」。他對於民主政治的理論與實際的瞭解，亦甚爲粗淺。當他參加過奧國議會之後，便認爲民主政治是「最無效率的方法」。

到了一九一二年，希特勒再也不能忍受維也納的氣氛，便遷居到慕尼黑去了——他稱之爲「完全德國式的城市」。兩年之後，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了。他興高彩烈地投身軍伍，參加巴伐利

亞軍團；戰爭尚未結束他已先負重傷，兩度受勳，並由一個普通士兵晉升為伍長。這個「階級」後來成為世人對他嘲罵時的一個名號。第一次大戰的結果，德國終於戰敗了，這使得希特勒憤懣萬分；他認為德國居然會戰敗，應由猶太人、馬克斯主義信徒，及所謂和平主義者份子負其責任。戰後，依照和約德國應該建立一個民主的政體，尤使希特勒憤怒。亦即由於這些刺激，使得希特勒決心從政。

希特勒投身政治，是以他回到慕尼黑為起點。最初，他祇是為德國軍部担任一個通風報信的人，拿一點菲薄的報酬。當時有一個規模很小的政團，名稱叫「德國工人黨」，後來又改稱為「國家社會主義德國工人黨」，也就是日後演化為「納粹黨」的核心。希特勒被邀參加工人黨，他就欣然同意了。而且，入黨之後不久，就對這個組織獲得了絕對的控制，由他自己發動，廢除了他所謂「毫無意義的」按照得票數多少來決定政綱政策的辦法。該黨的一切計劃，在希特勒的指揮策劃之下，都是以爭取工人階級的同情為最重要目標，要消滅「國際散毒者」。要取消立法機構；更要緊的是要建立起一種盲目的，不容質詢的服從性，服從黨的領袖——Führer 這個字，也譯為「元首」，成為希特勒的專有代名詞。

一九二三年，工人黨擁有黨員二萬三千名，德國名將魯登道夫所領袖的一個軍人集團予以幕後支持。當時的史屈斯曼政府政績欠佳，搖搖欲墜，希特勒認為時機成熟，可以起而攫取政權，

於是便爆發了有名的所謂「啤酒廳事件」。但是，這次起事的結果却因希特勒判斷錯誤而一敗塗地。他手下徒衆橫屍於慕尼黑街頭者有十六個人。希特勒本人於被捕後判刑五年，後來減刑爲一年。

希特勒被關在巴伐利亞的蘭斯伯要塞裏，獄中無以自遣，乃開始來寫他的自傳。事實上「我的奮鬥」這本書，與其說是寫出來的，不如說是講出來的。當時，希特勒與他忠實的弟子海斯（Rudolph Hess）按此人於大戰結束前突飛英倫被扣，戰後以戰犯受審，目前猶在（人世），同被關在一間牢房中。「我的奮鬥」的第一卷，由希特勒口授，海斯直接在打字機上打出了初稿來，這本書原來的書名稱爲「對抗謊言、愚蠢、怯懦四年半奮鬥史。」作者講明了是奉獻給在慕尼黑黑作亂時當場斃命的那「十六位先烈」的。此書的第二卷則於一九二六年始告完成。

杜里斯克斯（Otto Tolischus）曾形容「我的奮鬥」這本書說，「百分之十是自傳，百分之九十是教條，百分之百是宣傳濫調。」這是很公平的考語。到今天我們再來看這本書，實在無法相信何以像這樣一本粗率、矛盾、囁嚅、重複的書，居然竟能在德國這樣文化程度很高的國家，左右了舉國男女之心，造成了風靡一時之勢，真有些不可思議。

但是，德國當時的情勢，却正是使希特勒這一型的人物出頭，「我的奮鬥」這一類的論調得勢的時候。盧爾（Ludwig Lore）對此曾有極透澈的評論說——

「一九三三年之時，德國人民的心情就陷於極易感染法西斯主義桿狀細菌的危險狀態。他們急於尋求一種方式，能回復正常的生活與民族的自尊，但發現每一條道路都被阻於偏見和誤解，環顧當世的列強，祇對於如何壓榨德國的賠款有興趣。德國國內本來可以發生若干作用的各種勞工政黨，已分裂為五六個互相敵對的陣營。這種種情形又都是在有百年歷史的國家主義高壓色彩的背景之下逐漸惡化起來。德國人民的嚮望，無非祇是企求秩序與安全，而不敢奢望政治自由。他們痛感所謂政治自由也者，不過是聚訟紛紜，流血盈庭而已。希特勒對於這種情形瞭解得最為真切，他乃充分利用這種情勢以達到他自己的目的，再加上他驚人的組織力與宣傳力，以及當時德國各大工業領袖們財力上的支持，遂使他脫穎而出。更由於德國人生來具有崇敬權威的習性，遂使法西斯式的領袖權威很容易地建立起來了。」

「我的奮鬥」的主題曲，作者反覆強調者便是種族，種族的純潔，種族的優越——不過，希特勒從來不曾對於種族一詞加以確切的界說。照他的說法，人類區分為三大集團：第一個是「文化的創造者」，這一集團中祇有一種例證，那便是亞利安民族（Aryan）或稱北歐諾迪克人（Nordic），其實他所指的就是德國人。第二個集團是「文化的傳遞者」，希特勒舉的例子是日本人。第三個集團是「文化的毀壞者」，指的是猶太人與黑人。

希特勒在書裏一再叫囂說，大自然無意強使個人平等，因此也無意強使各種族一律平等。有

些種族較其他種族優越。德國人是全世界最優秀最健強的民族，所以應當統治全世界其他劣等民族。他對於所謂「劣等民族」的描寫，一再出現於「我的奮鬥」之中，譬如他寫到奧地利帝國時說——

「我深深厭惡在奧國首都所見各種種族雜交的情形，捷克人、波蘭人、匈牙利人、羅丹尼安人、塞布人、克羅茲人都混合在一起；尤其是到處都看到像雨後蘑菇一樣的猶太人，更多的猶太人。」

他寫到非洲人時說——

「讓成千成萬最優秀民族的人民，陷於目前這種勞苦的困境中，但却要訓練非洲土人去擔任知識性的工作，簡直是違反造物主的本意。」

希特勒的種族論，不僅毫無科學上的根據，而且即以感情出發也是十分偏狹的。他認為，波蘭人、捷克人、猶太人、黑人以及亞洲人全都不配取得德國的國籍；即令他們生於德國，長於德國，能操德國的語文，仍然不配做德國的國民。

德法兩國毗鄰而居，文化程度大致相若，希特勒對法國也表示無比的輕蔑，而其理由不是由於政治、經濟或軍事的原因，却是以種族為重點。他說——

「法國在使其本國黑人化這一方面，已有如此偉大的進步，我們甚至可以說一個非洲人的國

家正在歐洲的土地上崛起。法國當前的殖民政策，簡直還比不上德國多少年前的老辦法。如果法國目前的政策繼續不變，則三百年之後，法蘭克族最後的血液都將滲在一個新起的歐非兩洲黑白混合血統的國家之中了。」

被希特勒攻擊得最激烈的是猶太人。他指責猶太人要「使德國的勞工階級都匍匐於猶太人金融勢力的桎梏之下，先使德國布爾雪維克化，然後才能達成猶太人征服世界的目標。」又譴責猶太人「慣於作弄某一國與另一國對抗，他們却從中漁利，逐步建立起一個永恆的猶太帝國的主權來。」這些話，無論在當時乃至到今天，都是十分之誇大的說法。

爲了要保持亞利安族亦即「至高無上」的德國人民，希特勒堅決反對與「劣等民族」進行通婚以免造成血統的混合。希特勒堅稱，歷史上偉大國家的衰亡，完全是由於種族混合以至破壞了血統純潔所致。爲了要預防這種災難的發生，所以國家必須盡到責任，採取防範的措施。雖然，「懦夫們和弱者們」會爲了私權被侵犯而提出抗議，但是國家「必須盡其全力使民族的血統保持純潔，藉以使人類能達成其最高境界的發展。」

由於所謂亞利安族天生出來就是優越而至高無上的「狂想」，使得希特勒大言不慚地說，「統治民族爲了她自己的利益。去征服、剝削、掠奪乃至消滅劣等民族，乃是她無可推卸的職責與特權。」照他解釋，由於德國人口擁擠，急需更多的「生存空間」(Lebensraum)，所以，他

主張，德國人有權取得斯拉夫人的土地，將斯拉夫人遷離，使德國人移居進去。他說，這樣做的話，就長遠的觀點而言，將使全世界的人都受益。散布在世界各地的德國人，應該集結在一個統治之下。「惟有在地球上適當的廣大空間，方可保證一個國家的自由與生存。德國如果不能成爲獨霸世界的強權，則世界上便沒有德國的存在。」

希特勒心目中所籌謀的國土擴張，主要是以犧牲俄國爲目標。站在人口稠密的德國，希特勒引領東望，垂涎欲滴，他的構想是「取烏拉山區無可估量的天然資源，加上烏克蘭地帶無可計量的農田，皆納入德國版圖之中。」如是則霸業可成，天下莫予毒了。他說：「這是德國的責任，解救俄國人民免受布爾雪維克頭目們的壓迫。」他又說，「我們今日談歐洲的土地，心目中所想無非就是俄國及其邊界相鄰的各小國。在此命運似乎已經展示了朕兆。由於俄國之布爾雪維克化……使得此一在東方的巨人之國崩潰之期屈指可待。」

希特勒除了有關種族的謬論之外，並且赤裸裸地歌頌武力，可以使他的侵略行動合法化的，就是靠了武力。他說，「國家的疆界乃是由人所造成，亦可由人去改變。一個國家如果取得了適當的土地，自不能使他國負有永遠承認這種狀態的義務。充其量也祇能說這種現狀是證明了征服者的實力與其他各國的衰弱無能而已。所以，在這種情況之下，正義與實力同在。」

這些話對於在戰敗以後遭到割地賠款之痛的德國人聽起來，自然是十分入耳的。

希特勒也承認還有其他的方法，可能解決德國擴張領土以適應人口疾遽增加的問題。

第一個辦法，是提倡節育，減少人口的出生率。但是，這與希特勒的「統治種族」的理論積不相容；自然爲他所拒絕了。

第二種辦法，是第一次大戰前德國當政者走過的老路，就是增建大的工廠，鼓勵商品外銷，以有易無，來解決德國的民生問題。希特勒對這一方式也表拒絕。他反對大工廠制度，因爲這種制度將創造更多的都市藍領無產階級。

第三種辦法，是增加現有可耕地的農產品產量，希特勒說，這祇是局部的暫時的答案。可耕地所能增加的農產品畢竟是有限的。

因此，希特勒對這個問題所做的結論說，惟一真正的解決之道，乃是使德國獲得現存疆界之外的土地，使更多的德國人可以在那些新得的土地上謀生。

希特勒對於德國的領土與人口的主張，都歸納在下面這一段話之中——

「我們現有八千萬德國人在歐洲！今後的外交政策，必須考慮到下列的條件方能被承認是正確的。在不到一百年之後，在這個大洲上即將有兩億五千萬德國人；他們不能像生活在監牢中一樣，爲世界上其他人口去做苦工，而是做農民和工人，憑他們自己的勞力解決了他們彼此的生存問題。」

簡言之，希特勒預見了德國人口在一百年之內可能增加到三倍之多。而國民每年所得就當時的估計，多者不過能增加兩倍。所以他希望有更多的「生存空間」。同時，他受了麥金德以至浩斯霍弗的地緣政治學理論影響，對於軍事地理甚為看重。國土的縱深幅度越大，越可免於敵人的攻擊。

爲了要達成他自己野心勃勃之下所設定的目標，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提出了三種手段：即宣傳、外交與武力。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裏面，對他自己的宣傳技術，炫示最多；他自認爲宣傳乃是納粹黨最有力而且幾乎是無可抵禦的重要武器。美國作家洛納（Max Lerner）曾稱希特勒「乃是現代史上最偉大的宣傳家與組織家。」又說，「如果要在歷史上找足以與他相頡頏的人，那便要回溯到羅耀拉與耶穌會去了。」羅耀拉（Loyola）乃是天主教最大的修會耶穌會會祖，是使教會振衰起弊的一大功臣。洛納這種譬喻，在某些方面確有其真實性。希特勒爲了增進對宣傳術的瞭解，他曾研究馬克斯主義者的宣傳技術，天主教會的組織系統，英國在第一次大戰時的戰時宣傳，美國的廣告宣傳術，以及弗洛伊德心理學的理論。

他在書中對於宣傳曾有如下的「高論」——

「宣傳的作用……不是在於衡量和考慮不同的人所持有的不同的道理，而祇應去強調它所要

去辯護的道理。宣傳的任務不是對真理作客觀的研究，那樣做無非有利於敵人；也不是按照學院派的所謂公平原則把事實陳示於羣衆之前；宣傳的任務應該是永無休止地爲我們自己的『道理』服務。譬如戰禍之起，非德國所能單獨負責的；如果我們討論戰爭的罪惡，那便是絕對的錯誤。宣傳應該是將一切的罪名都放在敵人的肩頭，即使與事實有所不符，亦不應顧及……宣傳的目的不是爲那些酒色過度的少年紳士們提供有趣味的消遣，而是在能夠令人深信——我所說的人，乃是指廣大的羣衆。」

希特勒的宣傳「理論」中特別強調「集中」與「重覆」這兩個觀念。他說——

「廣大羣衆的感受性極爲有限，他們的才智極微，但又極爲健忘。由於這種情況，所以，有效的宣傳都必需集中在特別重要的某兩三點上，而且要將這兩三點反反覆覆表現在標語口號之中，務必要使廣大羣衆中的最後一人也能瞭解你在標語口號中要他所瞭解的道理。如果你不用簡單明瞭的標語口號而要求面面俱到，宣傳效果就無法達成，因爲羣衆既不能消化亦不能記憶你所提供的材料。如果用這種方法去宣傳，效果必趨減弱，最後是一事無成。」

希特勒對於宣傳的信賴，可以用他自己的話來說明。他曾說過，「藉了銳利機敏，堅忍不輟的宣傳，足可以使人們相信天堂是地獄，而地獄是天堂。」爲了使宣傳發揮充分的效力，所以設計時必需要適應才智最低的人，「經常而主要的目標，應該是人們的感情，儘可能不必訴諸人們

警覺的理智。」宣傳，「與科學的精確性無關，正如同街頭的招貼與真正的藝術毫無關係……：你所要接觸到的羣衆人數越多，則你所需要的知識水準便愈要低淺。」

在以上的原則之外，希特勒認爲，宣傳者應該善於運用某些有用的心理學上的小花樣。譬如說，你要說服一個與你意見相反的羣衆，在早晨就不適當。暮色蒼茫之時要好得多，天黑之後大家都都很疲倦，他們的抵抗力也必隨之減弱，這當兒便最容易「完全受情感所操縱」。另一個有力的工具是用大規模的激發，在納粹政權統治之下，這種戰法常常使用，使得本來無組織的羣衆參加遊行示威，間接接受了宣傳，如希特勒所說的——

「……這些陣容浩大的羣衆示威，成千成萬的人在一起遊行，遂使得渺小卑鄙的人也都傲然自得，燃燒着無窮信心。儘管他自己不過是一文也不值的蟲蟻，但却自認爲是巨龍的一部份；在巨龍噴吐的火焰之下，可憎的布爾喬亞世界終有一天在熊熊烈火之中一炬而盡，無產階級專政必可慶祝其最後的勝利。」

希特勒對於所謂廣大羣衆的蔑視，一再形諸筆墨，他所用的詞句如，「頭腦空空的羊羣」，如「愚蠢的化身」等皆是。他又表示，人類在集體活動之時，都是懶惰、怯懦、娘娘腔調，感情用事，而且不能從事理智考慮。

在希特勒的宣傳理論中，其最後的一招便是漫天謊言，謊言越扯得大越好。他說「謊言扯得

大，正是可以取信於人的一個因素；這說法是完全正確的。……因為羣衆們的頭腦簡單到極點，所以越是大言炎炎，越是比扯一些小說更有宣傳效果。羣衆也常常扯一些小說，不過限於羞惡之心使他們不願意扯太大的謊言。因此，即使有人起而指摘的話，羣衆也絕不會相信竟有人敢如此無法無天，顛倒是非的。」簡言之，謊言越大越容易被羣衆相信，而且越不容易被人拆穿。

希特勒理論中還有一條，可以稱之爲「單一魔鬼論」，就是說，不要在同一個時候舉出太多的敵人來讓羣衆去恨，以免得他們會弄錯了目標。一次應該集中於一個標的，羣衆的仇恨應該集中於這個仇敵身上。對希特勒來說，猶太人是一切罪惡的代罪之羊。雖然他也反對民主政治，反對馬克斯主義，反對凡爾賽和約，反對法國以及其他目標，可是，猶太人却總是「一切罪惡的真正原因」，「要澈底毀滅德國以及亞利安民族的文化」。在「我的奮鬥」中，他聲嘶力竭地叫囂說——

「到目前爲止，法國仍是我們最危險的敵手。法國已是越來越黑人化了，而且與猶太人征服世界的陰謀相勾結，形成了一種持續性的危險，威脅着全歐洲的白種人。」

關於宣傳的進行，希特勒看得很簡單，他主張由國家全面控制教育就行了。讀書太多是錯誤的。體育與衛生健康應該居於最重要的地位。其次是發展品格，尤其是像軍人們所擁有的美德，如服從、忠誠、意志力、自制、自我犧牲，以及對於職責的榮譽感等。學識的重要性則列爲第三

等。爲女學生們而言，最要緊的是訓練她們做賢妻良母。對於「全民教育」的觀念希特勒深致厭惡。他認爲那是自由主義份子發明的毒藥，足以使他們自行分裂而趨毀滅。他認爲，每一個階級乃至一個階級之下的每一個分支都祇能有一種教育。對於廣大羣衆來說，他們應該安心「享受」做文盲的福氣。

至於那能有資格受教育的集團，他們所受的教育也僅限於「一般觀念」，這些觀念要靠週而復始的重覆，銘刻在他們的心版上永誌不忘。其主要的原則永遠是「兒童屬於國家」，教育惟一的目的「是爲國家訓練工具」。



希特勒對於全民教育的觀念，正是他反對民主政治整個理論體系中的一環。他從不放過任何一個機會對民主政治加以嘲諷，他說民主政治乃是最無效率的制度。他指出——

「今日西方的民主政體，乃是馬克斯主義的先驅，如果沒有民主這一套，馬克斯主義是不可想像的。民主政治爲禍世界，使得馬克斯主義的病菌得以傳播。就其極端的形式而言，議會主義創造了一種由排洩物與火鋸合成的怪物；我很傷心的指出：其中的火鋸已燒得將成灰燼了……。」

對於民主政體，有一個道理我們求遠不可忘記：所謂大多數永遠不能取代一個人。代議士不僅代

表了大多數人的愚蠢，更也代表了他們的怯懦。一百個頭腦空乏的人抵不了一個聰明才智之士；一百個懦夫也做不出一個英勇的決定來。」

希特勒痛詆民主政制乃是「猶太人慢慢散佈出來的詭辯謬論」，譬如像「世人皆生而平等」的話，就是爲猶太人自解之辭。又如「普遍選舉權」、「平等權」等，非僅有害，而且足以招致亡國滅種之禍。

希特勒提出了領袖至上的理論來代替民主政制。照他的說法，羣衆應該毫無疑問地聽命於他。一切事之成敗利鈍，由他自己負其全責。



希特勒在「我的奮鬥」中描繪出他統治德國，征服世界的藍圖之後，便一步一步照本宣科，忠實地去執行。其中祇有一項重要的不過也是很短暫的改變，那便是一九三九年簽訂的所謂「德蘇互不侵犯條約」。這個條約的簽訂，原非希特勒本意，他在「我的奮鬥」中曾說——

「我們切不可忘記，目前俄國的統治者都是渾身是血的罪犯，人類中的糟粕，他們利用時機成事，在一個悲劇性的時刻徬徨盤踞一個大國，他們將俄國千千萬萬第一流的知識份子或殺戮，或驅逐，弄得猩猩遍地……」

其實，希特勒殺人的成績，恐怕也不遜於史達林的。「德蘇互不侵犯條約」不旋踵而即告撕毀，純然是利害關係決定，納粹德國與共產黨蘇俄，在「道德境界」上同樣是無可一提的。



不過，現在我們討論「我的奮鬥」這本書，有一點是值得強調的。希特勒寫這本書，坦率地將他日後的「雄圖」公之於世；又過了好多年他才真正跨上了德國總理的寶座；此書之出版，與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的時間相隔十年，何以全世界的軍政領袖們對於他的猖獗狂吠，事前竟無一人予以注意？一部份理由是因為當時國際間充滿了綏靖主義的空氣，列強都在各自打自己的如意算盤，政客們又有「不惜任何代價祈求和平」的高調，於是，使得人們「陶醉」於追求和平的美夢之中，漠視了希特勒的叫囂。

另一個原因，則是由於國際圖書檢查制度所得到的「驚人」結果。由於希特勒拒絕授權將此書全文譯為其他外國文字，所以，在一九三九年以前，還祇有一種大加刪節過的英文譯本，內容與原本相去甚遠。到了一九三九年，也即大戰爆發的前夕，才有兩家美國出版公司（一家得到希特勒授權，一家則沒有），出版了兩種未經檢查未經刪節的英譯本。在法國，一九三六年曾有一個法文的全譯本，但經希特勒提出控制後未得發行。倫敦後來又出了一個刪節後的法文版，其中

將希特勒攻擊法國的語句全予刪除，又將他解釋德國何以必需一戰的那一章省略，於是不但使得全書語調軟化，而且連原來的主旨也曖昧難明了。以上這種種情形，皆可見當時西方民主國家政界人士的醉生夢死，同時也可看出當時的知識界、出版界的怠惰冬烘。後來希特勒的鐵騎，能以長蛇封豕之勢席捲歐陸，亦不能謂爲完全是偶然倖致的。

「我的奮鬥」在德國境內，幾乎成了人人必讀之書。每一對新婚夫婦必受贈一冊；納粹黨每一個黨員，政府機構的每一個公務員，人人必備此書。不過，後來出版的版本中，刪去了對俄法兩國的攻訐之詞，據說是爲了掩飾希特勒的真正企圖，「好讓我們的潛在敵人們高枕無憂，安然睡覺。」



現在，再來看「我的奮鬥」這本書，歷史學者一定說希特勒根本不懂歷史；人類學者一定說他的種族論完全是一派胡言；教育學家則會指出他的教育理論乃是「中古式的反動理論」；政治學家要譴斥他那種極權政治的觀念以及他對民主政制的妄加歪曲；乃至文學家們也要指出，希特勒這個人根本搞不清段落章節，他如何能寫得成一本書來？

儘管如此，「我的奮鬥」却仍是一本曾經轟動一時而且的確影響過歷史發展的書。譬如對此

書批評得最痛快的房龍（Hendrik Willem van Loon）曾說，「此書乃人類有史以來特殊的歷史文件之一，其天真爛漫之處有如盧騷，其赫然震怒的語氣又好像舊約中的預言。」當然的這是極挖苦的说法。

另一位著名批評家庫辛斯（Norman Cousins）的說法則更為具體，他說，「我的奮鬥」乃是「二十世紀中最有影響力的一本書……爲了這本書中的每一個字，有一百二十五個人喪失了生命；每一頁，四千七百人；每一章，死亡的人數在一百二十萬以上。」因爲，「我的奮鬥」既然是納粹德國的政治聖經，自一九三三年直到二次大戰結束爲止，在第三帝國內部以及歐非戰場上所毀滅的生靈，推本溯源，莫不由此書而起。

極不幸的是，希特勒式的思想並未隨着他的死亡而死亡。強凌弱，衆暴寡，用暴力和滲透顛覆交互運用，以達到侵略顛覆目標的手段，比希特勒時代更為高明了。譬如說，以毛澤東爲首的中國共產黨種種包藏禍心的陰謀，多年之前不僅見諸文字而且見諸行動，可惜世人不加深察，甚至有些人仍一廂情願做其綏靖主義、和平共存的美夢，未免太不能記取歷史的教訓了。

封面

书名

版权

前言

目录

第1部 奋斗的回顾

第一章 我的家庭

第二章 在维也纳苦学

第三章 在维也纳所得的政见

第四章 在慕尼黑

第五章 世界大战

第六章 战争宣传

第七章 革命

第八章 政治生活的开始

第九章 德国工人党

第十章 旧帝国的崩溃征兆

第十一章 民族与种族

第十二章 民族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

第2部 民族社会主义运动

第一章 世界观与政党

第二章 国家

第三章 公民与国民

第四章 人格与民族国家的观念

第五章 世界与组织

第六章 初期的奋闘—演说的功效

第七章 同共产党的争斗

第八章 强者独裁便成为最强者

第九章 挺进队的意义和组织

第十章 虚伪的联邦主义

第十一章 宣传与组织

第十二章 工会问题

第十三章 德国在大战后的联盟政策

第十四章 东方政策

第十五章 紧急的防卫权

附录一

希特勒遗嘱

附录二 狂人的狂言

希特勒及其「我的奮鬥」